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三辑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生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本辑编辑 王胜利、卓武山、童方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连日报印刷厂印刷

1987年12月底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1092X787 1/32 印数 字数：101,000

印数：1-3,000册 工本费：1.50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No：0005381

目 录

冯玉祥收复东北志未酬.....	3
大连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斗争.....	17
国民党统治时期庄河县小学教师的一次罢教.....	26
《萤光》事件始末.....	31
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	43
谷次亨印象记.....	55
升允给恭亲王阴谋复辟的私信.....	57
王永江二三事.....	60
大连地方人士及往来书画名家轶事.....	61
瓦房店市瓜尔佳氏关姓宗谱.....	66
王永江轶事三则.....	69
大连市早期足球运动的回顾.....	72
一个当铺伙计的见闻.....	81

大连历史大事年表（古代）86

冯玉祥收复东北志未酬

余华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冯玉祥正隐居在山西汾阳。事变后，他接到许多敦促他出山共赴国难的函电。他亦致电国民党政府，主张应在政府统一组织下，成立强有力的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局，划分国防区域，统一兵工厂，领导全国军队抵抗侵略，并团结全国民俗众一致对外。但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忍辱求和，一再退让，致使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变本加厉。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军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冯玉祥适在南京，遂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军事委员会提出三项议案：一、以十万军队援助上海，并须于三日内开到，支援浴血抗敌的十九路军。要在万国视线之下，与日本人作殊死战；二、沿海各口岸海口，同时向日舰开炮，造成全国皆战局面，使日本人应接不暇；三、集中北方军队，开赴东三省，收复失地。但是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在会上公开表示，“对日问题，绝对不能以武力抵抗，抵抗就非亡国不可。”百般设法破坏一切抵抗计划。冯玉祥坚持己见，又写了一个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并积极筹设钢铁“三酸”等厂的提案：“现在上海战事，日益扩大，而东北伪国，又已成立。此时无论为军事上之策应，及为领土主权之保全，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此已不容再缓，且为当然应取之坚决态度，而不许稍有迟疑者。应请大会决定此方针，以示坚决。对外军事，既经决定，同时即应积极筹设大规模制钢制铁厂，及“三酸”等厂，以为军事上之长期的供给。盖非下此最大的决心，则外交决无胜利之可望，而东北失地，将永沦异国。言念及此，不寒而慄。所提是否有当，敬候公决施行。“除此提案外，他还提出“援助东北义勇军以武力收复失地案”，具体办法是：一、统一各路义勇军；二、

实行以饷械援助；三、派国军策应，选拔精锐出关作战；四、厚恤义勇军之死难烈士及伤残者。

这些提案，全都如石沉大海，当局没有一点反响。

当国家面临危急的关头，全国许多民众团体，以及各抗日义勇军等，纷纷致电致函要求冯玉祥以在野身份来领导抗日。于是，冯玉祥离泰山到张垣，毅然担负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之职，高举抗日大旗，展开民族正义之战。在 1933 年 6、7 月间短短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指挥抗日同盟军官司兵以血肉之躯与日伪军的飞机大炮进行拼搏，一举收复了察东全部失地。

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冯玉祥的夙愿是武力收复东北。在察东战事结束的当天晚上，他立即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黄郛等，敦促他们念东北亡国之痛，兴收复失地之师。电文曰：

“南昌蒋介石先生、南京汪精卫先生、北平何敬之先生、黄膺白先生钧鉴：顷接前方捷电，我军自阳午围攻多伦以来，血战五昼夜，官兵死亡者千六百余人，兹已于文晨克复多伦，敌人向东溃窜等语。祥久疏戎马，伏处山林，前只以东北沦亡，溧热继陷，多沽为四省之续，平津订城下之盟，一时为血性所驱，民众所迫，不得不奋然而起，振臂一呼，以武装保卫察区，收复失地自任。惟自上月号晨出发以来，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阴雨则鞍马尽湿，昏夜则席地幕天。且际兹酷暑气候，多有著皮衣皮帽以杀贼者。辛酸惨苦，困难万分。兹幸托全国民众之助，总理在天之灵，虽以饥寒疲敝之师，挟腐锈羸列之械，而气凌霄汉，志雪国仇，旬日之间，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今又继续收复多伦。察省地区，可告完整。维何察之任务虽尽，而东北四省之失地未收。瞻望河山，犹深惨恻。公等执国家大政，掌百万雄师，兵械之精，何啻霄壤；饷糈之富，更不待言。如蒙慨念东北同胞亡国之痛，废停战协定之约，兴收东四省之师，则祥虽庸愚，敢辞鞭箠。否则，惟有自率此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成败利钝，之死靡他。谨电闻，诸维亮察。冯玉祥叩申。”

为积极收复东北失地，冯玉祥曾做了周密的考虑。他深知此举事关重大，

非一人一夕可为，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乃于 7 月 20 日在张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内设四局：

秘书局 主任余心清
政治局 主任温晋城
军事局 主任阮玄武
经济局 主任张允荣

在抗日同盟军中凡官阶在师长、处长以上者，都是当然委员，并级力招请全国名流学者参加，集思广益，作为抗日同盟军总部出兵收复东北的设计机关。另外，东北各义勇军官司兵以及前来张垣投效的东北籍热血军人和爱国青年，抱着打回老家去的共同誓愿，也在张垣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从各方面协助开展军事行动。

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成立后，向全国通电如下：

“慨自东北覆亡，普天同愤，因循苟且，失地貽羞。肆彼凶残，波及察省，多沽康保，惨被沦胥。幸我同盟军将士有命，席凋敝之边隅，驱饥疲而抗战，旌麾所指，次第收复。保弹丸之境土，虽已完成；瞻破釜於山河，应图恢复。一息尚存，须臾难忍。惟兹事体大，断非薄力能胜。爰于 7 月 20 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凡我全国同胞，爱国志士，希多方赞助，共图进行如有何高策宏谋，源源惠示，尤所欢迎。忍看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目的如此，之死靡他，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谨电闻，尚希鉴察。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全体委员叩东。（八月一日）”

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组织大纲如下：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计划收复失地一切事项，促进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第三项之实现。

第二条 本会隶属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

第三条 本会设委员若干人，由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聘请政治、经济、军事等专家充任之。凡热心抗日，具有专门常识或实际经验者，经本会委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由军事委员会聘任为委员。

第四条 本会设委员长一人，付委员长二人，由军事委员会于本会委员中指定之。

第五条 本会级别设以下各局：

1. 秘书局 设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人。内设总务、情报、交际三处，各设处长一人，处员若干人，处理各该处一切事项。
2. 政治局 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计划一切政治事项。
3. 军事局 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计划一切军事事项。
4. 经济局 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人，计划一切经济事项。

第六条 各局组织由各局主任拟议草案，经本会委员会通过后施行，并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

第七条 各局主任秘书长，委员长于委员中指定之。各局人员，由各局主任及秘书长遴选相当人员，呈请委员长任用之。但均须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

第八条 本会全体委员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之，政治局设政治会议，军事局设军事会议，经济局设经济会议，秘书局设局务会议，均由各该局主任及秘书长召集之，各局相互间设联席会议，由秘书长召集之。各种会议章程及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本会特设顾问团，指导一切事宜，凡国内外耆英硕热心抗日者，由军事委员会聘请为本会顾问团顾问。

第十条 本会大纲由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备委员会议决定执行。

为了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同心协力复国兴邦，冯玉祥派员四出联络，并亲自电请各方合作，他致电庞炳勋等请率部协力收复东北曰：

“北平庞军长更陈兄，冯军长钦哉兄，何军长立足兄，关军长麟征兄钧鉴：顷接吉总指挥鸿昌文日电称，我军自阳午围攻多伦以来，血战昼夜，共死亡官兵千六百余人。兹于今晨指晓，攻克多伦，敌向东溃窜，详情另报等语。祥自维衰朽，久伏山林。前只以东北亡，滦热继陷，多沽失守，全察震惊。一时为良心血性所驱，不得不调集义师，为武装保卫察省收复失地之举。今幸赖民众之多方援助，总理在天这灵，将士之奋不顾身，克复多分伦，完成察土。惟保察之志愿虽达，而东北之失地未收，自当一贯初衷，再接再厉，挥师东时进，挥师东进，复我河山。兄等皆国内贤豪，一时俊杰，爱国之心，当更切于弟。深盼即日率部，一致向滦热推进，俾得早期光复四省，解东北同胞于倒悬。届时与兄等作黄龙共饮，何快如之。谨电奉闻，伫侯明教。冯玉祥文申（七月十二日）”

为了收复东北，冯玉祥于军事准备的同时，极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早出操，都有一次例行的朝会问答，由他发问，士兵同声回答，内容是：

问：日本人占了我们的辽宁省，你们忘了没有？

答：我们不敢忘！

问：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吉林省，你们忘了没有？

答：我们不敢忘！

问：日本人占了我们的黑龙江省，你们忘了没有？

答：我们不敢忘！

问：你们知道日本人数有多少？

答：有七千万。

问：你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人数有多少？

答：有四万万七千万。

问：你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土地比日本大多少倍？

答：大三十倍。

采用这种问答方式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是冯玉祥一贯的办法，主要为使士兵能够理解作战的意义，并容易记忆，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杀敌报国的决心。

冯玉祥要夺回失地的誓愿，却为蒋介石所不容。蒋介石命他的亲信部队关麟征、刘兴、刘戡几个师配合日本军队夹击冯玉祥抗日军，又私下向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许愿，只要他肯带兵打垮冯玉祥，就让他当察哈尔省主席（后任河北省主席）。庞炳勋曾是冯玉祥的属下，中原大战后为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为避免同室操戈，再致函庞炳勋对之晓以大义，请他率部相助收复东北。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再陈我弟如握。杨君来，又展惠书，并叙雅意，忠厚诚恳，气节凛然，企首旌，且感且佩。祥之集合义师，崛起抗日，完全激于四省土地之丧失，停战协定之误国，良心所使，不得不然。故就职之始，即日枪口对外不对内之表示，虽嫉我者中伤造谣，无微不至，然我弟兄多年患难生死之交，度必能深信我也。枪口既非对内，和平自无问题，但今日之事，阴谋陷害者直视吾人毫无知识之老蒙古，肆意离间，欲使我北兄自相残杀，而彼则坐收渔人之利，且藉以造成清一色之梦想。我弟兄如能洞烛其奸，一致立于抗日战线上，共同抱定枪口对外不对内决心，则和平自然实现，团结更属必然。盖今日国内形势，非急起对外，不能一致，不能团结。否则，愈对内愈纠纷，吾弟明达，必不河汉斯言也。至此种对外不对内之风气，则惟赖有力者主持。吾弟兹更首当其冲也，多伦已复，深盼当局悟于不抵抗主义之失，废弃断送四省永危华北之“塘沽协定”，迅速出兵，以谋收复东北失地。但无论如何，我弟兄不可不努力为祖宗基业及数千万人民之生命一拚，此则尤盼我弟能共同动作也。专复布臆，余词托杨君面尽不赘。专此，祇颂大安。小兄冯玉祥。”

遗憾的是，冯玉祥一番苦口婆心并未使庞炳勋以国家民族为重。他利欲熏心，助纣为虐，并于 1942 年投敌叛国，任伪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目睹此情，东北民众大同盟向军事当局的东北籍将领发出了急电：“于主席孝候、万军长寿山、何军长柱国、王军长鼎芳、冯军长占海、王司令亭午、刘师长多荃、鲍局长书征、邵司令凯暨各师旅团长钧鉴：慨自九一八以还，诸公与吾侪将安归乎？行将两载，同为丧家之犬；遥瞻四省，尽成亡国之奴。嗟谁致之，竟至之斯！原夫沈变起后，首误于不抵抗之谬论，继失于日内瓦之乞怜，费时穷年累月，徒得共管瓜分。乃寇欲难盈，鲸吞不已，业经据我东省，犹欲肆其西讨。寇热河，陷榆关，噩耗频传，军民共愤。同胞呼号于后，诸公奋发之前，统率各将士，舍血肉之躯，抗坚利之器，喋血长城，暴骨滦水。当时战士糗粮，惟赖同胞挹注，以疲惫之力，御方张之敌，终于饷尽援绝，刃折势摧。乃当局复倡安内之论，藉掩奸宄之心。及兵压平津，约签塘沽，伪国伊同默认，长城已作鸿沟。一纸契约，失地永沦异类；诸公故乡，毕生岂有还期。忆诸公入关时，虽云已携妻孥，然而祖宗尸骸，仍埋故土，瞻拜无日，祭扫何期？清明水之夕，黑水白山之间，能不东望洒泣，北首兴嗟。且乡中父老，空殷话旧，邻里亲族，徒思谈心。人非木石，能无父母；谁是家鹿，能弃戚族。良辰扪心，何堪回首。夫富贵利达。因常人之恒情；舍逆效顺，亦英雄之本色。诸公既欲驹于小朝廷之下，螻屈于南政府之门，试思今日之宝贵，能保毕生乎？现在之袍泽，能随终生乎？刘珍年之被逮，张卯湘之查办，前车覆辙，殷鉴匪遥。用则利诱威胁，否则消灭分化。纵横 阖，尽鬼蜮之能事；风云诡譎，极 之长技。诸公若恋栈于一时，忍金瓯之永缺，匪特乡心难遂，犹恐董笔貽羞。顷者冯总司令受民众之爱戴，起抗日之师干，迭复失地，屡克名城，反镇以威力，派军入察，司马昭居心叵测，李完用卖国情殷，诸公岂囿于名利，甘为爪牙，致蹈张初之辙，遗消灭之祸。如念祖宗坟墓，亲族沦陷，应即反旗来归，共策勋名。叨属同乡之谊，共感亡国之悲，特披之情，曷胜延伫。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叩世。”

除此电外，东北大同盟又致电东北各将请参加抗日。电文如下：

“上海朱子桥将军、南京马秀芳将军、苏翰章将军、北平邹岳楼督办、万寿山督办、鲍志一主任、张蘅若先生、王鼎芳军长、杨安铭军长、黄师长警钟兄、刘师长芳波兄，缪师长开源兄，张师长立衡兄，何师长立中兄、范敏则先生、谭旅长恩波兄、高旅长翔铭兄、杨村何柱国军长、牛葆奇先生、柏桂林先生、蔚县冯军长寿山并转东北军全体将士及东北同胞同学、暨各报馆各团体钧鉴：慨自倭奴西侵，东省沦陷，政府始终以不抵抗之政策，而置我三千万人民于不顾。我东北同胞，遂不得不自起组织义勇军、救国抗日军，以与暴日相死拼。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即流亡关内之数十天同胞，亦莫不竞事奔走，志切救亡。民气激昂，足证人心未死，是政府应如何因势利导，雪耻复仇。顾反倒行逆施，摧残备至，冀以达其对日投降之卑策。如最近监委邵鸿基呈文有去：‘最近调查河北各机关公务员，率非东北人莫属，……如此政治，焉得不坏’等语。又如平绥路局长沈昌，就任伊始，既遍查东北籍之职员而罢免之。嗟乎嗟乎！何政府仇视东北同胞至于此极也。且政府前既授意张汉卿先生，以不抵抗主义而失去东北国土；今东北民众复以省籍关系，而不见容于而道，天地虽宽，几无我人立足之地。狐埋狐搯，已足痛心，忌嫉排斥，更所不解。典戎不每，敢忠告我惨苦无告之东北同胞曰：东北失地，本吾辈之故乡；还我故乡，亦吾辈之专责。应一致奋起团结，否认政府断送东北之塘沽协定及一切卖国条约。其有助我辈收复此乡土者，即吾辈之友，而卖我欺我者，即吾辈之敌。今幸我冯总司令见义勇为，领导抗日，且对我东北同胞如手足，凡来此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者，任用维护，仁爱备至，一切公开，不分界域。现多伦已于文辰为我抗日同盟军完全克复。至盼诸同仁闻风依归，救国自救。并须认定塘沽协定系政府予日方以占领东省之保障，亦即政府为我人代写之卖身契约。果我人稍存羞耻，不甘屈服，必当及早觉悟，奋起图存。否则东北人之前途，势将日趋黑暗，不堪设想矣！典戎与诸公，或则素所崇拜，或为同学至友，或为总角之交，或共生死现场。爰进忠告，请速猛省，勿再受人愚，以自陷于死路。更勿偷安目下，以遗祸于子孙。事实俱存，敢淆视听。复兴国祚，端在今

兹。倘怀观望至心，终有被排除消灭之日。利害切身，至希自救。掬诚电告，诸维亮察。”

时值初夏，而转战千里退入察哈尔境内的东北各义军，多数还穿着皮衣皮帽，疾惫不堪。冯玉祥为之更换衣帽，并烹大锅肉饷之，官兵感而泣，争愿效死。冯玉祥对东北数万为国捐躯的健儿，怀无限之敬意。他慨叹道：“有民气如此，不知运用，不禁为以革命相号召的政府诸公感到可怜！”

此其时，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给李济深、陈铭枢发了个电报曰：“数旬以来，冯焕章（冯玉祥字）兄在察哈尔一切布置，其心固可念，而其事则至危。盖守边而不秉命于中央，则其结果必为丧失领土。……至于守边之策，在严治防守工具，并整顿纪律，不在多招散兵，以致内溃……”云云。在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汪精卫眼里，冯玉祥竟成了一个误国害民、不知进退的人。他这番言论一传出，触犯众怒，舆论哗然。东北民从大同盟通电痛斥道：

“溯自沈变迄今，南京卖国政府首则以不抵抗主义断送东北，继则以塘沽协定拍卖东北。丧地辱国，认贼作父，拥护其独裁之政权，镇压全国民众抗日运动，甘心尽其帝国主义清道夫之任务，齷齪伎俩，实为我民族留下污点。冯总司令徇民众之情，奋起义师，塞外喋血，边荒转战，克复各城，保我国土，功高日月，气壮山河。凡我族类，罔不兴奋。汪兆铭者亦以国家民族为立场，联合同志，屡次倒蒋。如昔之汉口武汉政府，北平之扩大会议，文州之非常会议，其最著者也。孰意迩来为富贵所淫，威武所屈，中途变节。竟甘迟钝堂堂之责任行政院长，惟仆仆奔走于蒋氏之门，如庐山之会议朝开，汪氏即漂然夕至。寡廉鲜耻，俨同臣妾。近复与蒋氏联合宣言，一则曰勿使察省为第二傀儡政府也，再则曰勿使察省为热河之续也，三则曰勿滥收散军土匪也，四则曰勿引用共匪头目也。揆此四项原则，无非欲包办民意，蒙蔽国人，捏造蜚语，以

惑听闻。似此丧心病狂，血口喷人，狺狺之声，在彼司空见惯，已不值识者一哂也。冯总司令自树义旗，督师奋斗，战绩俱在，事实固胜于雄辩。公等海内贤豪，国家柱石，务请主持正义，来此国贼，时代任务，只此之图，国家存亡，实利赖之。临电悲愤，不各所云。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率东北军政学工交通航空商民各团体叩歌（八月五日）。”

抗日同盟军声威远扬，民心所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因嫉生恨，加紧迫害破坏，调集铁甲列车六列为先锋，动员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十一个整师共十二万余人，由南向北压迫，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夹攻局面，并派人潜入张垣暗杀了东北军抗日英雄、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左副指挥邓文将军，致使敌人气焰复又嚣张，在察战中失败溃退至热河边境的日伪各军，也蠢蠢欲动，图谋重新夺取多伦，沽源……。

面临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冯玉祥坚持枪口对外不对内的原则，绝不让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他一面下令不得对蒋军开枪，一面沉痛电告各省市，各报馆，各团体，各机关并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其中有这样一段：“乃六日以来，舆论之封锁如故，交通之封锁如故，而军事压迫亦如故。既向未参加者对外御侮之南京飞机队，顷亦飞抵来，准备攻察。窃以为内战之在今日，不惟玉祥所不愿见，抑亦国人所不忍闻。连天烽火，遍地灾，寄感慨于河山，懔危亡之国祚，正国人同舟风雨，生死相恤时也。纵无曲突徙薪之计，宁不解于扬汤止汤上沸之非。祥爱国，决不忍以救国者而反以误国；祥爱民，亦断不肯以弟民者而反以殃民。曲直出之国人，是非裁诸万世，唯悯豆萁之泣，实羞蚌之争。且如此而徒为外人造机会，不特智者所不肯为，亦仁人之所不屑道。爰再作世电不示，自即日起，完全收束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

就这样，威扬中外一时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仅仅三个月，被近解散。冯玉祥收复东北的壮志未酬，含悲解甲前，他在张垣建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牺牲官司兵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塔上竖着五尺长的指向牌，歪着指向东北，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

冯玉祥离开张垣归隐泰山后，在五贤祠洗心亭的内壁四周题字：“你忘了

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拚命夺回来”，并在亭子上方刻下东北三省的纵横距离、面积和人口数字。日军入侵泰安时，当地人民用泥灰把刻字盖死，保存下来，至今犹在。

附一：冯玉祥为赠抗日官司兵皮背心一万件致张学良函

汉卿世兄勋鉴：榆关陷落，东北垂亡，暴日野心，方张未艾。足下于艰难困苦之时，谋捍御撑持之计，远道闻之，不胜佩慰。祥僻居边塞，懔怀国忧，悲愤之情，不能自解。近见报前方杀敌将士，冒弹雨，犯奇寒，不死于陷阵冲锋，亦死于厉风惨雪，此其可痛，蔑以加矣。刻大战当前，不克与前敌将士共苦辛，内省神明，明用惭疚，兹特募集微款，赶制长皮北背心一万件，托邓仲芝、李时甫两同志送上三千件，即请查收，酌发前方士兵，聊备御寒之用。其余七千余件，分赠殿英、明轩、更陈、培五诸同志所率各部。此区区之数，诚不免杯水车薪之感。然倘能再募巨款，当陆续以筹之，斯亦万不得已之中尽心力之所能及而已。再，此次榆关受伤官兵，皆为极惨烈光荣之牺牲，未能亲政慰问，时抱弛慕之忱。爰置赠品数事，一并 去，并希代赠诸壮士，不腆之物，藉表敬意耳。现寇患益深，国仇待雪，维足下为前途珍重。书不宣意，敬祝努力。冯玉祥拜启。二十二年元月十九日。

● 附二：张作相（注一）等四十余将领响应通电

冯总司令钧鉴：自东北事变发生以来，举国汹汹，危亡是惧，呼号奔走，力竭声嘶。政府既负军事外交重责，或战或和，应有贯彻主张，始足以资应付。果出于战，则必简精锐，应怀周旋；果出于和，当日本于日内瓦提出满州撤兵条件五项时，即应相继接受，以免扩大范围。当兵作相奉派接收满州各地，东北民众，方殷企望，而政府忽令叫拒绝直接交涉，停止和议。窃谓政府已有备战之决心，纵不 马励兵，以决胜负，亦必深沟严防。而锦州一役，（国联）授意撤兵，政府即授意撤入关内，千里膏腴，弃而弗顾。作相等待罪

行间，以为政府措施，自有成见，忍痛服从。乃朝中之议论未定，而同 疆之警讯频来，而榆关失守矣；未几而热河告警矣；未几而长城各口相继陷矣。我忠勇将士，面临前敌，死亡狼籍，肝脑涂地，犹复前驱，以抵抗到底之决心，以冀争最后之胜利也。乃政府日倡长期抵抗之说，而空军不遗，坦克不拨，甚至军饷不发，给养不继。文电呼吁，空言支吾。论者谓中央新战术之器具，悉留为内战之需；罗掘我民众之脂膏，皆充入私人之橐囊。凡我军人血肉之躯，供敌摧残，不言利器之牺牲，作相等目击颠连，刻骨痛心，似此孤注之谋，无异伏剑之计。即谓政府欲假手敌人以剪锄异己，诛心之论，岂谓无因？凡我同胞，久深愤慨，徒以国难当前，不得不力为隐忍。今则图穷匕见，忽于前线激战之时，始而渐作游移之计，继有制亡之语。自黄郛（注二）北来，无日不在妥协停战奔走接洽之中，究竟妥协内容，系何条件，丧失国权，至何程度，严秘密，毫不公开。外间纷传政府假借外人强权，消灭国内异派将领，与日政府法西斯蒂主义联合，把持兵柄，以遂其一党专横之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计果遂，则我神明华胄，沦胥以亡，其祸不仅失地丧师而止。且国府数年以来，武断政权，为植党营私之具。秕政百出，罄竹难书。因内政之腐败，召外侮之纷乘。今已政策失败，既不自引咎以谢国民，又不惜辱国丧权，阴谋盘踞，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作相等饱经患难，与我东北士卒，久共生死。今我将士，国破家亡，犹复支持苦战，所冀者，惟有收复失地，还我版图，何能以此辈暮四朝三，任意愚弄，使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之域。顷读粤东唐绍仪等，福建蒋光*****等反对妥协通电，张家口冯焕章将军等，抗日到底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奸谋。足见天下耳，一手岂能尽掩？总之政府之不和不战，忽和忽战，无非以和战之奸计，供一党贪敛之私图。坐致数千万将士，作无谓之牺牲，数百万人民，遭流离之痛苦，清夜扪心，将何以对已死亡之忠魂，何以抗流离之民众。今更欲作城下之盟，为刘豫石敬瑭而不耻。似此营私误国之政府，何可任其贻祸蒸民？作相等谨率数十万健儿，从我国各员勋及名流硕彦之后，能真抗日，重奠山河，戮力同心，应付国难。以期外防强邻，内安黎庶，起沉疴于膏肓，救危亡于瞬息。迫在眉睫，敢布腹心，挥泪陈词，伫候明教！

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刘翼飞，孙魁元，何柱国，王以哲，黄显声，刘多荃，冯占海，董英斑，李振唐，陈贯群，杜继武，张诚德，白风翔，高桂滋，黄光华，高伧秋，李杏村，姚东藩，常经武，王奇峰，郭希鹏，刘世荣，李福和，陈春棠，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杨正治，缪徵流，孙德荃，沈克，张廷枢，铁虎易，姚勋，张政何，何立中，翁明垣，丁绶庭，刘月亭，邵海亭，乔方，王和秋，刘署东世（三十一日）。

（注一） 张作相，辽宁义县人，出身绿林，是张作霖的主要骨干。历任军政要职。“九一八”事变后，避居天津。1931年初，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同年二月任华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军团总指挥。热河失陷后，张学良下野，张作相也辞去本痕各职，闲居天津。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特派他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1948年东北解放，张作相在锦州被俘。经人民解放军宽大释放，护送回津，不久病故。

（注二） 黄郛，国民党外交部长。

附三：东北各将领为邓文被刺事通电

各省市各报馆钧鉴：本军邓前第五五总指挥（文）宪章同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追随马秀芳将军，举义龙江，精忠抗日，身经百战，卓著勋劳。此次多伦克服，宪章同志之功为最多。不料竟为国民党人所仇忌，蓄意暗杀，已非一日。宪章同志亦特加戒备。惟张垣国党，侵入甚伙，即忠义新委参谋长古松年，亦竟于上月三十日，现有国党确实证据，未经忠义立予枪决。距宪章同志之死仅十六小时，线索可寻，不难破案。缘宪章同志于上月马日回张报告防务，此后恒夜宿本埠福寿十六号友人家，竟为国党侦悉，于世日早二时许，结伙十余人，冒充找人，径入砍杀，身中六刀，护兵古代亦同被难。连日侦察，

确系国党所为。现正由冯总司令悬赏缉捕凶犯中。吾人于悲愤之余，究不知宪章同志身犯何罪，竟为该党策动者仇忌，而必置之于死。是非颠倒，手段卑污，天理良心，泯灭已尽。焕公总司令，精诚爱国，慈祥待人，自新等誓追随到底，而与外寇内贼，一拼死活也。谨闻。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五路总指挥檀自新，第六路总指挥刘桂棠，第十六军军长兼北路军右副总指挥李忠义、师长宋敬诚、马冠军、富春、旅长马金良、李海山、刘振玉同叩江（八月三日）。

（本文作者系大连政协驻会委员）

大连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斗争

市委党史工委征编一室

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大连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组成“沪案后援会”，领导旅大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斗争。

一、“沪案后援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大连人民便开始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大连的劳动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为此，大连的工人阶级曾不断地同日寇进行了斗争。但在当时，这些斗争多属自发的经济斗争，既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因此，斗争多以失败而告终。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轰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对大连人民，特别是大连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此，工人运动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日寇统治的殖民地里——“关东洲”显示出伟大的政治力量。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需要，在1923年组成了大连工人阶级的最初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实际上是工会组织）。后又相继成立了“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大连店员协会”等组织。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大连工人运动的领导，于1923年曾派李震瀛、陈为人来连与工学会联系，了解工学会的工作情况和宣传革命思想。1924年又派邓中夏同志来连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春，铁总又派秦茂轩来连帮助工学会工作。为加强大连地区的工作，在1925年一、二月间正式建立了团的组织，成

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1926年1月，又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大连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25年5月上海工人的反英反日大罢工所掀起的席卷全国的大革命风暴，使大连工人运动和全国反帝斗争汇成一股不可抑制的革命怒涛。大连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与各阶层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投入了这一伟大的爱国反帝斗争。

二、事件的起因

1.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大连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大连地区控制得很严，他们竭力封锁革命消息，不给中国人以丝毫自由，但革命的真理是不能被禁锢的，“五卅”惨案的消息终于传到大连，并在大连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回响。

1925年6月6日《泰东日报》为沪案在第一版发表社论：“……而我神州禹域黄帝之子孙，反以主人资格被统治者之民族。试问公共租界何人土地，非我中国土地耶？何处人居多，非我国人居多耶？纳税又何人居最，亦非我中国人居最耶？以我之土地，以我之人民居多，我之人民纳税居最，而反被人摈诸门外，任人宰割，此无论如何弱稚民族，亦不能漠然无动于衷……。”

“……吾人非仅痛心于今日，莘莘学子之横遭无辜，尸横原野，而实痛心，夫列强之得望蜀，宰割日甚，压迫我民族，虐待我同胞，深耻大辱，不能不雪。抑又非仅国人不能坐视，即吾亚洲立国有各族之关系者，亦当予以同情，攘臂代争。夫如东邻日本，今次虽在旋涡之中，不克自拔……。”

在第七版又以“举国愤激之上海，外人无理枪杀华人大事件，各界议决最低提出七项要求，北京学界亦群起作运动示威”为标题，在消息前面用镶边专栏登载了如下评语：“此次上海激烈变动，有关系之外人，纯粹含有威吓压迫屈服种种性质。若在二十年前清朝末叶，以至民国初元，政纲不举，民智不开之时发生，同胞纵遭惨杀，亦得付诸无可奈何，忍辱含冤作罢。十四年来，政纲虽未全举，然民智确已渐开，故在痛恨军阀扰攘、政客捣乱之中，从未或忘外人之欺侮。无事之间，犹加意防范；有事之间岂敢再忍，于是对讎伊，时予排斥。然往者排斥风潮，旋起旋灭，且多限于一地，初未有若此次，惹起举国

之愤慨也。仔细调查始知大有原因。肇事当时虽是英人在沪枪杀华人，然不数日间，而青岛日人纱厂之华工，亦有遭枪决者。不前不后，两两相映，是以举国人土，既衔英国，复恨日本，惨声所至，各地响应。沪滨混扰，京国奋起，宁垣忽亦变态，厦门顿然恶化，此外汉口天津等各大埠，虽未急起直追，然闻形势亦渐不稳。故将来之推移，果至如何程度，此间正未可以逆料，要之事起于英，事成于日，以地理种族论之，英人犹有可说，日人断不应当……。”

“五卅”消息传出后，日寇警察当局严重警戒，刑事四处探查。因《泰东日报》登载了有关“五卅”的消息，强令《泰东日报》禁止发卖当日报纸。6月7日《泰东日报》第一版又镶以显眼的花边登载“本报禁止发卖一日”的消息：“昨日本报为刊载沪上暴动风潮，曾不惜据事直书，唤起阅者同情。而乃突被官署禁止当日发卖。在本报向以正义人道为依旧，不加隐讳。于国际关系则尤不能袒此抑彼，不问直曲。区区此意，谅为阅者所同情也。”

2. “沪案后援会”成立

“五卅”事件传到大连后，身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与压榨的大连人民极为愤慨，革命情绪倍加激昂。在党的领导下，大连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于6月15日，大连中华工学会、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中华青年会、中华增智学校、中华觉民学校五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发起组织“沪案后援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开追悼会；募集捐款支援上海工人。会上推行阎仲荣、林升亭、王世平、傅景阳、张洪五、赵晋如、李虹桥、杨志云为委员。接着大连商业学堂学生会、大连中华学校学生联合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也加入沪案后援会（《泰东日报》、《满洲报》、《盛京时报》均有记载）。从此，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援沪反帝爱国运动。

三、斗争经过、规模及其结果

1. 日寇加紧干涉

“沪案后援会”成立后，定于6月21日午前10时于奥町永善大戏院召开“五卅”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并在各报刊登募集捐款广告。对于“五卅”事件举市愤激，革命风潮奔腾澎湃。日寇对这一伟大的革命浪潮甚为震惊，并百般刁难，多方干涉。日寇报刊《大连新闻》于6月21日为威胁和恐吓大连人民的反帝斗争，曾以“必须避免发生不稳的言行和会场以外的运动”为题，提出“警察当局对二十一日追悼会的方针”；“当局为了警备发生万一，大连警察署曾召集小岗子、沙河口支署全体人员，提出了下列管理条例，对不稳者将毫不留情地给以处分。①不准做出涉及会场以外的运动。学生其它团体列队在市内游行，往往会触到会场以外的运动，必须严加注意。②不论在会场内和会场外，都不准有不稳的言行和宣传。不论挽联和悼文或讲演，不但不要使用不稳的语气，特别注意这次的讲演内容与带煽动的意味，所以必须保持会场内的肃静。”又提出“沪案后援会”会名不当，应即改名。不得示威游行和散发传单等。并于各地严加警戒，警察、刑事四处搜查，遇有可疑者即监视之，甚或传至署内训戒。“沪案后援会”明里应允了改名的要求，会名改称“沪案救济会”，但群众的革命情绪激昂，已形成一股不可压抑的反帝怒潮，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2. 斗争的更高潮——“五卅”殉难烈士追悼大会

自沪案消息传至大连后，大连人民的革命怒火愈烧愈旺，工人不断罢工，学生亦相继罢课。按“沪案后援会”决议，6月21日上午在永善茶园（人民剧场）举行了“追悼‘五卅’的死难同胞大会”。会上，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为死难同胞致哀，唱国歌，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群情激昂，气势感人，与会者泣不成声。对此，日寇的《中国の劳工运动》一书作了如下叙述：“他们利用6月21日星期天，在大连中国剧场永善茶园不顾警察当局的严密监视，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发出浩大的排外声势。”又据当时的《泰东日报》记载二十一日追悼大会的情况：“在永善茶园开‘五卅’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市民自行参加者约万余人，整齐严肃，静穆无哗。先唱中国国歌，声震霄汉，次由在场人士向诸烈士灵位行三鞠躬礼，次由傅立渔主席报告烈士殉难情况，

风俗由赵晋如、林升亭宣读吊词，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于严肃中，遂宣告闭会焉。”另据杨志云回忆：上海南京路‘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发动了反英帝国主义的运动，大连组织对这一运动也做了工作，各群众团体联合在奥町永善戏院举行了“五卅”惨案反英集会，在会上各团体代表以发表反英演说，读祭文叙述中国民族沦为异族殖民奴隶地位所遭受的虐待摧残时，闻声下泪者不乏其人。会后分路游行，沿街散发传单“为殉难同胞复仇”，“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在繁华的大街——浪速町（现天津街）、西岗子、沙河口等地进行了以募捐为中心的宣传活动，大连各界人民踊跃资助。

3. 大连工人阶级在大连各界人民支援沪案反帝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

1925年2月7日傅景阳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4月又去上海考察了上海工人运动情况，5月21日由沪返连，并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派干部分头去各地厂矿发动与组织工人群众，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故在沪案发生后，大连工人阶级便应声而起，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界联合的反帝战线。反帝风潮汹涌奔腾，革命气象万千。日警察当局唯恐发生不测事件，在各大工厂严加警备，并派出大批刑事、腿子监视工人活动，遇有可疑者当即逮捕查办。但敌人的高压政策阻挡不了工人的反帝斗争，罢工事件仍然不断发生。6月21日“五卅”殉难烈士追悼大会的第二天（22日），傅景阳代表大连一千三百多名中国工人向满铁沙河口工场长正式提出四项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①要跟日本职工一样，恢复发给免费火车票；②要求跟日本一样，解决宿舍问题；③发给中国工人的工资，要求换算成银洋；④要求场长说明，前些日子报纸上登载要降低华工工资的消息是否准确。经工人的坚决斗争，日本资本家被迫应允，上述条件基本实现。对此，《南满洲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有如下记载：1925年“关东州”小岗子满州制陶株式会

社、普兰店盐场、周水子福纺工厂、旅顺双岛湾盐场、满洲新报社印刷厂、大连皮革会社、大连机械制造所等处工人先后共举行十一次罢工，参加人数为1818人，规模最大的六百人（双岛湾盐场），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五人（福纺罢工），多数罢工都取得胜利。在日寇残酷剥削与压榨下的大连工人阶级，处于饥寒交迫之境地，生活贫苦不堪。但是，为了援助上海阶级弟兄，不惜“典卖铺盖，节约食用，以充义款”。对此，《泰东日报》于6月24日曾有如下报道：“因官厅不许，不能逐户劝捐……结果竟出意料外，日本商家伙计和劳动阶级多自动的亲至伏见台中华青年会（沪案后援会设此）……甚至有典卖铺盖，节约食用以充义款者。可见爱国之心……非高压所能制止者也。”大连工人阶级在这场反帝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

4. 学生罢课，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在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先锋作用影响下，大连学生也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团体纷纷加入沪案后援会，到处举行集会讲演；日本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也冲破了校方的阻挠和压制，进行罢课游行示威，开追悼会，募捐，散发传单以及为沪案后援会做通讯联络等工作。学潮遍及大连、旅顺、金县、熊岳城等地。6月16日旅顺工科大学64名中国学生和旅顺第二中学90名中国学生罢课。根据《大连新闻》等报记述，为被枪杀的学生所感动，工大和第二中学的中国学生行动起来，十六日早晨上述两校学生160名一齐罢课，向他们的校长要求准许为上海被杀学生募送慰问金，并召开联合追悼演讲会。因校方只准募捐慰问金而不准举办联合演讲，引起学生愤激，集会于工大体育场，每人手持“快救同胞”的白旗，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列队在市内游行，在中国街（支那町）冲破了日寇派出所的阻拦，拒绝了校长的“劝戒”，学生非常强硬，坚决不听，并直奔当时日寇统治大连的最高行政机关——关东厅门前示威，高呼口号，唱着悲愤慷慨的歌子。日寇大庭保安课长和武井主任向学生进行威胁，“训戒”长达两小时；校长也声言：“如果闹出不稳的行动，则采取最后的措施。”但学生仍然不听，坚持斗争。很多学生陆续离校返乡，在校学生则进行召集追悼会，募集义金、散发传单等活动。于此同时，旅顺师范学堂中国学生

和旅顺师范学堂附属公学堂和旅顺公学堂（公学堂就是小学）都相继罢课。日寇为之无策可施。旅顺师范学堂中国学生全部回家。当事者被他们这种执拗弄得蒙头转向，结果被迫停课。当时不仅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有些小学受了反帝斗争的影响，也进行了罢课斗争，表现坚决，行动感人。据《大连新闻》6月20日记载：“旅顺师范学堂附属公学堂和旅顺公学堂两校的小学生，于6月18日向校长提出停课要求，理由是愿回家营商务农，以便挣钱作义捐金送上海被害者和失业工人。两校校长训戒无效。照常上课的学生，大约不足半数，使得当局狼狈不堪。

在旅顺学生罢课的同时，大连学生也起而呼应。大连商业学堂，伏见台公学堂学校的学生，都断然实行停课。据《大连新闻》报导，十六日夜以来，大连商业学堂，全校学生起哄，不听堂长训戒，而主张自由行动，并做出决议：

（一）加入并援助沪案后援会，募集义捐金；（二）以学生为主，举行追悼会。本日（指6月18日）早晨八点，全体学生集合于校庭，派了12名代表见堂长仓岛氏，请求准许上述两项决议，校方不准，学生态度十分昂扬强硬，并在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学生代表进行演讲，还一致举手表示赞成采取自由行动，意志很顽强。仓岛赶至礼堂向学生训戒无效，便退出礼堂做了急报。大连警察小野，民政署地方课长藤田。小岗子支署长石井，高等主任未光与全校教职员共同商讨，断然实行停课，封闭宿舍，让学生全部回家。而学生仍然坚持斗争，答复是“回不回家由我们自己”，并四出进行募捐宣传活动。小岗子警察高等课的几个刑事曾在16日乘学生不在宿舍时，搜查了学生宿舍，被几个学生发现后告诉了全体学生，一致提出严重抗议，申斥“官宪方面横暴无理”。自从西岗子商业学堂学会罢课后，于6月22日伏见台公学堂高等科一、二年级的女学生也讲行了罢课斗争，迫使日寇不得不让步，最后只得解除对学生的停课处分。

5. 买办资产阶级对沪案的反动立场

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帝斗争，迅速地形成了反帝统一战线，不仅学生、教职员卷入了斗争，中小商人也在革命高潮的影响与推动下，由消极观望转达入斗争，并对与日寇狼狈为奸的买办资产阶级不参加沪案运动的行为表示愤慨。

沪案发生后，引起大连各个阶层对帝国主义的愤慨与反抗，并热心捐助义款，支援上海受难同胞。6月24日《泰东日报》读者之声栏登载两个读者关于节约过端午节（第二天是端午节）的建议，充分地表达了大连各阶层的心情，建议要求大家节约筵宴，热心捐款，要求大家勿猜拳行令，勿敲锣打鼓，并悬挂半旗以志哀。与此同时，以李子明、张本政等人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忠于日寇为其效劳的“华商公议会”，不仅不参与沪案后援会的活动，反与日寇勾结排挤沪案捐款活动，并积极地为日寇国内震灾捐款。为讨好日本主子，他们竟捐五百元大钞，而对沪案却分文不捐。《工人之路》记载：“商人方面亦极多热心帮助，唯有商务会长拍日本帝国主义马屁，要他捐钱则一毛不拔。”此举引起大连各个阶层以及中小商人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泰东日报》曾登载许多大连公议会和大连华商公议会（大连中国资本家团体）大遭责难的消息，就连中小商人对他们不参加沪案后援会活动的立场也极为愤慨，并斥之为“没有心肝”、“冷血动物”。对此，《泰东日报》有如下记叙：6月25日华南一分子“为救济沪上失业同胞事泣告大连全体华商启”，……惟我大连商人自沪案发生以来，视若秦越，置若罔闻。即大连有数机关之堂堂两公议会当局，亦缄默无一表示，岂亦所谓有先见之明乎，不然抑何无血气无热忱乃尔也？因沪案二方之是非曲直，中外人士多有公允评议，即肇祸之工部局自身，亦已坦白自认，吾大连商人不为沪上无辜惨死诸同胞呼屈计，不为殉难诸烈士身后计，即就数十万失业同胞言，岂忍坐视其饥饿垂毙而不一为援手乎？吾忆前年及今春，东邻二次震灾，吾连地华商中之慷慨捐助者，颇不乏人。而对目下沪上失业之数十万同胞，反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抑何厚于彼而薄于此乎？其理安在，颇难解释，岂吾大连华商之无热忱无血气耶？然吾意所谓无热忱无

血气者，未必全体类此，故吾愿有血气有热忱之亲爱商界同胞们奋起图之。”

该报 6 月 28 日一商人“忠告大连华商公议会议长李子明”，“自五卅惨剧发生，少具人心者，少秉人道者莫不同情而哭，力抗外人屠杀我们同胞，痛斥罪魁蔑视人道。……乃我堂堂华商公议会，代表华人十数万之机关暨一精明强干会长李子明，何意不参加此会（指沪案后援会）……吾辈商人独非中国人乎？岂俱凉血乎？观于近有许多商家怨会长之不提倡，以致商人落后，被人所不齿之言，可见商人之血未尽凉也。”并警告说：“若永抱袖手主义，吾恐会长先生，将被人蔑视，不齿排斥矣。呜呼！光天化日，血肉横飞，冻馁饥寒，哀声载道，我公议会长李子明先生，其速起而援之！其速起而援之！”

在这次运动中，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用尽各种卑劣手段封锁消息，阻止运动，但由于党的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大连各界人民反帝斗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共募集 11468 元捐款，支援了上海被难同胞，斗争取得胜利。

国民党统治时期庄河县小学教师的一次罢教

于志龙

国民党统治时期，庄河县广大小学教师倍受欺压、虐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掀起了以反饥饿斗争为起点波及全县的小学教师罢教活动，有力地冲击了庄河的国民党军政当局。

（一）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庄河后，竭尽贪污、劫掠、腐化、暴虐之能事，百姓遭殃，民怨沸腾。广大学生教师同全县人民一样，也深受其害。当时的庄河县长关印忱等人动辄指斥小学教师在伪满时期为日寇推行奴化教育，在民主政府时期为共产党推行“赤化教育”，甚至指责教师本身也奴化、赤化了。关印忱伙同国民党四十一师采取了杀鸡吓猴的卑鄙手段，先后把高阳乡的韩廷盛和徐岭乡的孔广玲两名小学教师逮捕。县教育科长李树春出于正义感，亲自出面担保，但只有韩得到保释，而孔终因“亲共分子”的罪名，在徐岭乡被枪杀。石山乡鲍家码头国民小学校产被警察杜某强占，教师申玉邦出来争辨，竟被杜打一顿耳光；一位女教师被驻扎在老道口的国民党守卡士兵欺侮调戏，其师部不加过问，弄得县内的一些进步教师人人自危。

1947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安东省教育厅拨给庄河县一笔教育复员费。县长关印忱将其一部分挪作别用，一部分贪污肥己，教育界未得毫厘。国民党在庄河的党政党政军警人员无不及时得到薪水，中学教师由国民党安东教育厅发了薪水，唯有小学教师枵腹从公，连续四、五个月分文未得。徐岭乡的丛殿陞、张述敏、徐明道等教师，到中心小学开会经常无饭可拿，有时竟怀揣一把炒豆，借以充饥。该乡中心小学校长姜悦鹏再三向乡长寇春堂要求，希望他能

同情教师，设法筹发薪水。国民党庄河县教育科也多次督促，寇却一味支搪。此情此景激发了教育科长李树春和礼教股科员荐维成、学务股科员王振东等对小学教师的同情，他们曾以拒绝领取自己的薪水，借此向庄河县政府关印忱等人施加压力，但关等毫不在意，这就越发激起了教育界主持正义人员的公愤。同时期，国民党庄河县党部与三青团庄河县分团筹备处组织了游行，意在粉饰“太平”，宣传反共。参加者有县城各中小学师生和各部门职员数百人。当游行队伍走到县政府门口时，李树春同一名男教师响亮地喊出了“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接着游行队伍里“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代表广大教师意志的声音震动了整个县城，迅速传到全县各个角落。青堆国民小学校长杨维嶂，大孤山国民小学校长邵树棠，也相继发动了青、孤两镇各校师生，举行了游行示威。李树春还乘国民党东北行辕来庄河检查风纪，在国民党庄河县政府礼堂召开所谓“绅士会议”之机，揭露了国民党军政人员贪污掠夺的罪行，指出群众已发出“九师不如八路”的呼声，从而激怒了军政人员头目，直到后来想把李树春除掉。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教育界先后出现一系列的斗争，为小学教师罢教活动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

以反饥饿斗争为起点的小学教师罢教，开始时形式上目标是对着徐岭乡长寇春堂，实则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庄河县政府及其军政头目。

徐岭乡沙岗子国民小学校长姜悦鹏对当庄河县教育科以李树春为首几名科员的正义活动坚决支持。他首先动员全乡 42 名小学教师联名向国民党庄河县政府请愿，一则控诉寇春堂迫害教师，殴打群众，公开索贿，设赌抽头等十大

罪状，要求政府给予惩处；二则申斥小学教师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困难处境，要求政府立即给予公平待遇，解决生活困难，保障人身安全；与此同时还向全县中小学和机关团体发出呼吁书，吁请全县各界正直人士给予声援，向寇春堂发出书面谴责。李树春等人代将呼吁书分发到全县，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全县教育界的共鸣。各地小学教师纷纷集会声援，书面声讨寇春堂，同时举行罢教，予以响应。

庄河街三所小学（国民中心小学、老爷庙国民小学，南大院国民小学）几次写报告给关印忱，强烈要求解决教师的薪水，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为此，庄河街三所国民小学分别选出孙克全等三人为教师代表，前去县政府请愿。严正声明，我们不能饿着肚子教学，如三天内不发放工资，全街小学教员都不上课。关印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打电话催促庄河街长韩秉惠（外号“韩大肚子”）给教师发放工资。三天后，教师工资还是没发。教师代表又到庄河街找韩大肚子，提出再延三天，如到期还是不发工资，全体教师决心离校回家，并声明因此造成学校关门，街长要承担全部责任。迫使韩大肚子答应说：

“我想法借钱发工资……”然而，时过三天，工资仍然没发，教师们气愤已极。老爷庙国民小学和南大院国民小学全体教师真的罢了教。罢教活动虽然只搞了一天，但庄河街三所国民小学教师的薪水得到了解决，特别是给徐岭乡沙岗国民中心小学以有力的声援。接着青、孤两镇国民学校在杨、邵两位校长的带动下纷纷响应。杨维嶂并向庄河县教育科提出辞职，以示抗争。有的学校谴责书像一把锋利匕首刺向寇春堂“寇春堂你原系小学教师出身，后充当汉奸村长，效忠日寇。冰山已倒，回到祖国怀抱，本应忠于职守，关心教育，改邪归正，以赎前愆。可是你竟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明阳乡国民小学教师李毓久接到徐岭乡沙岗子国民中心小学的呼吁书后，立即发动全校教师联名痛斥寇春忠。呼吁书传到了高岭乡，该乡国民中心小学校长王德麟组织全乡小学教师讨论，在教师中产生极大的反响。县长关印忱等慑于小学教师罢教活动，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对策。一方面派其爪牙秘书吴学琳出面调停，一方面进行恫吓。还把他的的小舅子孙某安插在国民党庄河县教育科任学务股长，以控制教育

界。

后来，关印忱还勾结国民党五十二军副军长，在原庄河中学后院召开县城中小学全体师生和城郊学校教师大会，在会上，这个反动透顶的副军长气势汹汹地点名斥责庄河街南大院国民小学、老爷庙国民小学和徐岭乡沙岗国民中心小学的教师，说什么“你们游行示威，呼喊打倒贪官司污吏，还搞什么罢教，一定有共产党分子从中煽动。是谁，给我站出来！”还包庇袒护关印忱公开散布贪污有理论，说：“你们学生不好好的求学，成天闹闹这个贪污啦，那个也贪污啦。你们的关县长是我手下的官，我手下的官绝不会贪污，如果他贪污了，怨你们地方士绅，他缺少的东西，你们不供给，不贪污那里去弄！……”，真是无耻之尤。

（三）

小学教师对当时国民党庄河县政府的强烈谴责和揭露，尽管受到官方的恫吓甚至欺压，但没有就此中断，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来自全县各小学的声援书接连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的罢教活动日趋酝酿成熟，随时都会爆发。关印忱老羞成怒，于是便给徐岭乡沙岗国民中心小学校长姜悦鹏等人加上“鼓动学潮，大有八路之嫌”的罪名，欲将他们逮捕。李树春知道后，立即通知姜悦鹏隐蔽起来。接着，四十一师又扬言对李树春下毒手，在这紧急关头，李先把鞠连荷、白富卿、王道权、宋佐成等四位县督学和他的学生荐维城打发走，继而他自己也辞了职，隐藏于会友商店，蒙经理邵德茂掩护了一个时期，后来前往青岛。

1947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国民党军被迫撤离庄河，罢教斗争也告结束。这

次以反饥饿斗争为起点的小学教师罢教的结果，不但使一部分小学教师的薪水得到了解决，而且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窜占庄河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庄河的统治基础。

[本文根据姜悦鹏、李斐（李树春）、孙克全、李毓久，张玉亭等口述书面材料整理，整理者现在庄河县政协工作]

《萤光》事件始末

徐攻玉 马群

编者按：本文作者在来信中说：“读《瓦房店文史资料》总第二期《张逸秋与萤光社》一文，觉得很好。人们对旧社会和敌伪统治下的大学‘学运’、‘学潮’向来较为重视，而对当时中学生的思想状况，却很少谈及和加以研究。《张逸秋与萤光社》一文作者王连维同志注意及此，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但，王文在记叙上尚有缺失，做为萤光社的发起人与组织者、《萤光》的编辑、‘《萤光》事件’的亲历者，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其始末写出，以期待研究我市日伪时期中学生思想状况的参考。”我们觉得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严肃的。现特将全文刊出，以飨读者。当然正如作者所指出：“马齿徒增，记忆力渐减，对往事的回忆，仍难免有误漏。”因此，希望知情者批评指正。

继侵占大连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他们在政治上实行血腥的镇压，在经济上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而在文化教育上，则实行奴化政策。仅就教育而言，当时的复县，地跨今瓦房店市和新金县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几十万，而中学却只有奉天省立瓦房店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均为四年制中学）两所。瓦房店国民高等学校每个年级仅有两个班，全校八个班有三百多名学生。日伪当局把日语和汉语同列为国语，把农业“勤劳奉仕”做为主要实践，反“体罚”学生，上级生打下级生说成是“国民精神训练”。敌伪的如意算盘是既想扼杀中国青年一代的民族意识，以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抗，又培养将来可以为日寇效劳的后备力量。但是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既有地下党员张逸秋那

样具有民族气节、坚持不懈地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的老师，也有一批追求真理和正义，力图冲破黑暗社会牢笼的学生。1943年徐攻玉、马长恩等四十多名学生，终于行动起来，怀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壮志，组织了以揭露社会黑暗、追求光明为宗旨的团体——萤光社，并出版了刊物《萤光》。这在日寇严密统治了十二年的东北辽南，称得上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它好似一颗炮弹在敌人营垒中炸响了。显示出中国人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

日伪警方发现《萤光》后，惊慌万状，把它列为思想政治要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勒令《萤光》停刊、没收并销毁已出版的《萤光》的同时，警、特如穿梭般地进出学校，侦讯学生，监视学生们的行动。一时间，黑云压城，人心惶惶，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因为“思想犯”的遭遇是人们所熟知的。只是由于当时学校的特殊环境，并有张逸秋老师的指导，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利用敌伪内部的矛盾，才终于使这一来势汹汹的“《萤光》事件”得以不了了之。《萤光》虽被勒令停刊，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重温了一下当年“《萤光》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对于研究日伪统治时期中学生的思想状况，不是没有意义的。

萤光社成立与《萤光》出刊的背景

萤光社之所以会在1943年诞生于瓦房店国民高等学校内，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特定条件的。

日寇对东北的统治，是以“关东洲”（日俄战争后被侵占的我国领土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那里有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为其主要据点和支柱的。瓦房店紧邻“关东洲”并位于南满铁路线上，因此，日伪对这里的统治与压迫，也就更为残酷。日本人虽担任副县长，却掌握全县生杀予夺之大权，挑“国兵”，抓劳工，强制农民粮食“出荷”，以“思想犯”、

“经济犯”的罪名残害不屈的人民，使人们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徐攻玉、马长恩等这些发起和参加萤光社的青年学生，多生在农村，出身贫苦家庭，亲身受到日伪统治者的欺凌和农村破产的痛苦。徐攻玉的父亲为了糊口，到“关东洲”貔子窝（今皮口）的东老滩挑了点盐，被日伪的什么“辑私局”捉去，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又被抓了劳工，发配到黑龙江边，几乎丢掉性命；弟弟徐功瑞也被抓了劳工，送进抚顺煤洞，终于抛尸万人坑中。徐功玉无钱上学，幸得亲友资助才入国高就读。马长恩的父亲，虽是一方名医，却因平日嫉恶如仇，横遭官绅警宪迫害，只好躲在乡间开小诊所，生活也很困难。所以，他们同日寇是有刻骨之仇的。至于其他一些参加萤光社的同学，也都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具有一定的仇日思想。当然这些自发的仇日思想在当时日寇严密的思想统治下，还是十分幼稚的，在许多问题上也还是朦胧的。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程度的提高，阅历的增广，特别是秘密地阅读了一些鲁迅、巴金、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之后，民族的意识，解放的要求就逐渐地萌发出来了。徐攻玉，马长恩等人在国民优级（高小）学校读书时，就曾在同学中尝试组织过读书会、演讲会，到了中学（国高），凑巧遇到了地下共产党员张逸秋老师，从他那里接受了反帝的思想，这对我们后来办起《萤光》是有直接因缘的。

张逸秋老师是辽中县人，他在北京读书时，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潜回东北，1942年在瓦房店国高任教。他当时虽因故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进行活动。他在讲课之余，向我们进行反帝反资本主义反封建教育，讲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怒斥日本侵略者霸占中国国土、欺压中国人的暴行。给学生介绍“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和揭露南京政

府镇压学运的罪行。他教育同学们要有民族气节，骂那些为虎作伥的人是“忘了祖宗”。在当时日伪的严酷统治下他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去启迪学生的觉悟，培养学生的反帝爱国思想，这是何等的胆识！我们对这样一位教师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老师的引导，我们才在后来办起《萤光》。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既对日伪统治的黑暗社会不满，就想寻求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以便推心置腹地交谈思想抱负。求得相互理解与支持。首先在校内通过日常学习活动，同爱好文学又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同学经常聚会谈心，发泄心中不平。进一步又通过各种渠道与外校志同道合的青年师生挂上钩。如和盖平（今盖县）国高学生臧永昌、周建涛以及海城城关小学教师曲洪涛，都是通过书信往来而后晤面结成好友的。徐攻玉于 1942 年冬曾去海城，曲洪涛把埋藏在坟中的描写日寇统治镇压东北人民之暴行的散文集挖出来交给徐攻玉带回，转交给马长恩等密友传看。我们又在 1943 年春，邀请盖平的臧永昌、周建涛来瓦房店聚晤。那是在一个星期天，徐攻玉、马长恩、沙裕珍三人接待了他们，并在瓦房店的西山沟，蹲在苹果树坑里畅谈了一整天。大家坚信日寇的“大东亚战争”注定要失败，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大家谈得十分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在暮色中下山，到旭英照相馆合影而别。臧永昌等的到来，对《萤光》的创刊，无疑是起到推动作用。这以前，我们在报刊上偶有诗歌、散文等发表，如徐攻玉写过《诤谏》、《咏史》和《槐花树下》等，马长恩和张寅治发表过一些作品。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是发扬友情、鼓舞青年向上的，从而，为《萤光》的创办铺垫了道路。

《萤光》的诞生

由于我们从多方面受到反日爱国思想的熏陶，想通过文学结交和团结

更多的同学，一扫当时那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唤起更多同学的觉醒，做一个能向黑暗势力抗争、去争取光明的人。显然，过去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作品，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因经过编辑的删改，实难直抒胸臆，表达真实的情怀。于是，由徐攻玉、马长恩筹划、倡议，得到一些“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同学齐声响应，结社、出版便成为决计了。

我们把这个意图，兴致冲冲地去告诉张逸秋老师，请求他的指导。我们认为，此举一定会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谁知他听了我们的倾诉后，先是默默无言地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不时地叹气、摇头，最后狠心地向我们泼了冷水，提出了八个字：“此时此际，大可不必！”这太出乎我们意料了。我们由惊愕以至于愤慨。徐攻玉、马长恩回来后，立即召集骨干磋商以后的行止。同学们认为张逸秋老师是一个光说不做的胆小的人，一时性发，拍案而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他不支持，我们自己干！”

激情犹如喷吐岩浆的火山，一发便不能自扼，我们义无反顾，把结社和办刊的活动更积极地进行下去。决定以高年级为重点，徐攻玉联络了三年级同学；马长恩则在四年级同学中进行活动。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吸收了三十多名社员。我们商定，凡是入社的人，都要注意民族气节，每人都要拿起笔来，写当前的黑暗与苦难，写对光明的明天的向往，不做无声的奴隶，要做呼唤暴风雨的海燕！

在研究社名和刊名的时候，大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名字，如“火花”、“火炬”、“光明”、“星光”、“曙光”等等。最后考虑到当时是处在日寇统治的黑暗社会中，我们是一群追求光明的学生，我们的光和热是微弱的，还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我们所能发出的光，恰似萤光虫的微光，萤的光虽只有那么一点点，它却象征着处在黑夜中的人们的一点希望。于是“萤光”这个名称，经徐攻玉、马长恩提出，大家一致赞同，也

就成为社名和刊名了。

我们规定每个入社的同学都要拿一元钱入社费，做为办刊物的经费。接着，我们便具体筹备出刊。大家推举徐攻玉为总编辑，对《萤光》的征稿、印行负总责；马长恩负责小说编辑工作，兼为刊物插图；张俊喜负责散文的编辑工作；张寅治负责编辑新诗。我们的刊物征稿体裁范围较为广泛，举凡小说、散文、诗歌、寓言、书信等形式一概不限，但在内容上必须符合本社的宗旨，凡有亲日、媚日倾向和谄颂什么“王道乐土”之类思想的文字则一律拒收。在纪年上，我们大胆地应用当时少见的公元，而不使用当时通用的伪满“康德”年号。这在当时无疑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日趋巩固，日寇所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已经面临失败。但是敌人决不会自己放下屠刀，为了垂死挣扎，因而对占领区的思想统治愈加严酷，对“反满抗日”行为的镇压越发狠毒。我们在筹办《萤光》刊物时，已虑及了后果，因而也就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对付敌人的灵活措施。一是在《萤光》上发表的文章中，不露出“反满抗日”字样，对敌人的不满只用“黑暗势力”、“黑夜”、“险风恶浪”等诅咒字句替代。二是力争以半办公开的合法外衣做保护，如请三年级班主任，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并精通日语的穆方良老师抄录一首《游龙沙公园》的七言绝句刊在《萤光》第一期的封二上；公开借用校方的誉写、油印设备刻印刊物；第一期《萤光》出版后，首先送给校长熊志仁一本，借以造成校方认可并支持的既成事实。三是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就说是学生为练习作文而办刊，力避政治牵连。

《萤光》这个刊物，经过组稿、编辑、刻写、油印、装订，终于问世了。（十六开本，约四十页）。创刊号“萤光特辑”，封面是马长恩设计并绘制的萤火虫在茫茫黑夜不惮前驱、用它的光引导后进者的精神；有马长恩写的寓言《萤与蝇》，热情地歌颂了给黑夜以光明的萤而鄙夷那些趋腐附臭的苍蝇；还有邹维儒写的《祖母》，表述了一位农村妇女的苦难生活；徐攻玉写的长篇散文《悼瑞弟》，是用被抓劳工惨死抚顺煤矿，抛尸

肆人坑的二弟徐功瑞之丧的哀痛事实，给敌伪统治者所粉饰的“王道乐土”以无情的揭露与鞭笞……。《萤光》一出，全校振奋，我们一些办《萤光》的骨干自然分外高兴，不啻若怀胎十月的母亲，一朝见婴儿呱呱坠地的心情。由于《萤光》印数较少，只有百本左右，还向盖平等外地寄出了一些，在校内，只是社员和爱好文学、思想表现较进步的同学才能得到。所以大家奔走相告，辗转传阅，莫不以先睹为快。有些同志看了《萤光》，受到鼓舞，相继要求入社，所以又发展了十多人，共达四十三人。

《萤光》，这种完全靠学生自己的力量印行的刊物，不但在辽南地区开学堂历史以来所未有，而且在日伪统治下发表不带任何亲日媚日的文字，更不能不使人面目一新，叹为少见与大胆！后来张逸秋老师也不禁放开审视的目光，赞赏《萤光》的内容，认为写的是“人话”。送给校长熊志仁的一本，也起了很好作用，在一次朝会上，他公开向全校师生说：

“《萤光》，大可以做为我们瓦房店国民高等学校的曙光！”

出师胜利，我们又一鼓作气编印了第二期，以“新诗之页”作为特辑，责任编辑为张寅治，并决定第三期为“外稿特辑”，责成马长恩为责任编辑，向盖平国高、瓦房店女国高和复州城国民优级学校征稿。我们计划基本上保持每月一期，并准备将来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改为铅印。今天回忆起来，那时为了《萤光》，我们真是夜以继日，倾注了所有心力，是我们用心血浇灌的！

《萤光》的遭遇

就在《萤光》第二期刚刚出版，我们还没有把完全部分发出去，第三期正在征集外稿时，大祸突然降临了。一天，学校中突然来了几个复县伪

警务科的便衣警察和特务。他们首先找校长询及《萤光》事，那位善于向日本人卑躬屈膝、吃花生、苹果成癖的校长熊志仁（学生在背地里都叫他“熊死人”），竟说他从来不知道有此等事情！曾几何时把《萤光》夸赞为“全校的曙光”，这时却卑鄙到如此地步，勿怪平日为学生所不齿了！校方既然“不知道”，当然就是秘密刊物了，于是，心怀鬼胎的“熊死人”和老奸巨猾的日本人副校长增永公政在警特的陪同下，先将《萤光》主要负责人徐攻玉传唤到校长室，斥学生不安分，出版秘密刊物，责令交待政治背景和意图。徐攻玉告诉他们，《萤光》完全是学生自己为练习作文而办的写作园地，不仅级任教师穆方良同意，校长也是知情的，因为每一期都呈送给校长和有关老师审阅，同时它又是使用学校的设备在校内公开刻字与印刷的，因而它决不什么地下秘密刊物。经这一答对，在场的警特和两位校长眼看是再也审不下去了，于是他们不容徐攻玉辩解下去，蛮横地叫徐攻玉以后再听传讯，勒令《萤光》立即停刊，并将已出版的两期已发和未发的刊物全部查禁，收缴烧毁。警特还搜去萤光社社员名单和为《萤光》撰稿人名单，逐个进行审查。诸如这篇文章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如果用了笔名，则又要你讲出为什么用假名，这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刊物为什么偏要取名为“萤光”，为什么不用“康德”纪年而用公元，等等。编辑们常被传讯，总编辑徐攻玉更是首当其冲，主要目的是要追出组织萤光社和出版刊物和政治背景。据说，警方还特地请来精通日语的中国人，把已出版的两期中的所有文章全译成日文，供日本人做细致的研究。刊物的文章内容不少是真人真事，如重要文章《悼瑞弟》完全是写实材料，至于“黑暗”、“光明”又都是抽象的词语。日伪警特这群猎狗虽围绕《萤光》打转转，对编辑反复侦讯，然而却抓不到“反满抗日”的把柄。自然，因为发生了《萤光》事件，警特不断来往学校，闹得校园乌烟瘴气，师生人人自危，往日宁静的校园，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我们想起了张逸秋老师。张逸秋教师早已是敌人所注意的目标，但这回他根本没插手。深感他在我们办《萤光》的冲动情绪下，持冷静的态度是对的，因

为，其时也，稍有差池，便会有不必要的牺牲！他那八个字，原是经过审时度势才提出来的。

在情况最紧张的时刻，为了寻求应付这一局面的办法，徐攻玉和马长恩在极隐密的情况下到了张逸秋老师家。他见了我们，不但没有责备，反说《萤光》的出版是值得称赞的。他告诉我们，你越慌张、越怕，敌人越会觉得你有问题，要沉着、冷静、对警特的调查，只说是为了练习作文，不要急于雄辩以求得解脱，使气氛缓和下来之后，再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对张老师那里得了这颗“定心丸”，心里平静多了，警特侦讯时，我们把事情说得很简单，很单纯，时间一久，警特的侦讯也就不象原先那么起劲了。

经过了几个月，不仅案子仍未了结，就连事件的性质也始终未能定一来，可见敌人尚无把柄。我们认为到了以攻为守的时候了。

事有凑巧，那个掌握学校大权的日本人副校长增永公政喜爱汉诗，却苦于不懂格律，他在审阅《萤光》和审讯徐攻玉时，发现徐攻玉谙于此术，于是主动向徐攻玉请教起这方面的学问来。徐攻玉就势对他指导，时间长了，也就便于说话。徐攻玉和马长恩商量，认为只有利用增永，才能顶住警务科的猎犬。为此，我们向增永坚持说，一、我们是在校长要求学生把日语、“满语”学生好的情况下才办起《萤光》的，目的是练习作文；二、《萤光》第一期出版后，我们已呈送给熊校长审阅，可见并非秘密刊物；三、校长曾在一次朝会上赞扬说：《萤光》大可以做为全校的曙光”，而遭到警务科追查时竟然推说不知，有失为人师表的品格；四、由于校长推说不知，致使警方将《萤光》视为秘密刊物，认为学生有“越轨”行动，这对瓦房店国高的声誉大有妨碍。

那时，国民高等学校的日本人副校长，是日寇高层统治者派到学校中

推选文化侵略政策和统治师生思想的责任者，省立中学副校长的官阶同日本人副县长不相上下，而增永又是一个老谋深算、自视甚高的人，他当然会考虑：《萤光》事件如果被认为是学生的“反满抗日”活动，他这个学校总管不是没有责任的。况且，萤光社的组织 and 《萤光》的出版，在学校公开活动了几个月，学校从教师到校长都与闻其事，而他竟然完全无知，直到警务科来校追查，才得悉此事，这对一个职位不算不高，且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学副校长，与其说是很不光彩的，倒不如说是狠狠地挨了一记耳光。但要说是“反满抗日”，却又没有得到可以抓得住的把柄，警方要定“罪”并不那么容易，他自己也没有新的发现，既然如此，还能再容许在他眼中不如一条狗的警特在学校出出进进吗！他自身存在着的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在新的情况下，已逐渐被他为保存自身而同警方构成不可明言的矛盾所代表，终于使这个位高自负的人，在同徐攻玉多次谈诗的高兴之余，对徐说：“《萤光》的事，不要害怕！”。就这样，由于我们采取了处变不惊、有理有节的斗争，日伪警特的一场兴师动众、声势汹汹地迫害进步学生的进攻，到底被我们挫败了，警特只好对《萤光》事件不了了之。

《萤光》事件，使学生和社会上的人们对敌伪统治的残暴和恶毒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实际上使《萤光》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它使人们认识到：在日伪多年的黑暗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并没有泯灭；在日寇实行奴化教育的核心场所，觉醒的青年还是大有人在的！这不就是当初办《萤光》的希冀和意图吗？

余谈

《萤光》事件已不了了之，那么，它是怎样被敌伪发现的呢？《萤光》构成一个事件，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必然性是：这样一种半秘密半公开出版的东西，被发现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其时，敌人一

旦发现了它，是决不肯放过的；但这次事件的发生，却是偶然的。我们有个社员中赵泮林，是三年级学生，他的哥哥在大连因其它案件被捕，株连了他，敌伪警宪法去逮捕他时，他早已闻风而逃，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萤光》。《萤光》本身就是犯“禁”的东西，又是在一个逃犯的住处搜出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就不用说了。于是便被交到复县伪警务科查究，事件就这样构成了。恰好，同我们有密切联系的盖平国高学生臧永昌、周建涛因反日活动被捕，据说，敌伪警宪在他们那里也抄出了《萤光》，送到了复县伪警务科。这样，敌人朝我们掀起了一股股摧楫倾橈的恶浪，也就是很自然了（臧永昌、周建涛等直到日寇投降才得出狱）。

经过《萤光》事件的战斗洗礼，我们学到一些东西，事实的教训，使我们不能不接受张逸秋老师的教诲：在敌伪严密的思想统治下，大张旗鼓地组织团体，创办反日的刊物，是不现实的，即使能侥幸存在于一时，也不可能大有作为，而且往往会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要传播抗日爱国思想，只能用隐蔽的方式而不能用狂热的方式进行。为了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还应多读些书以武装自己的头脑。此后，徐攻玉、马长恩等除自己找些进步文学作品来读，又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保持同张逸秋老师的联系，到他家去聆听他的有益教诲。张逸秋老师把自己珍藏的《社会科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大纲》等革命书籍再次交给我们阅读。经受过一次教训，我们读书就更认真了，从这些书中吸取了很多营养，使我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对我们一生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这样一个题外的实例：马长恩的父亲马焕章，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老医生，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943年冬，他从马长恩和徐攻玉中借来张逸秋老师的这些书，经过阅读，他高兴地称之为现代的“圣经”，从此再也不向人们宣传基督教的教义，而在

亲邻中宣传起“社会主义”来了。解放后亲邻们都说：“马焕章若是活着（他在1944年冬病逝），非当共产党干部不可。”可见这些革命的书籍影响非常深广。而我们大批学生在“八一五”日寇投降，八路军刚进驻瓦房店时就参军、参政、参教，成了当地首批革命事业的知识青年，这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之，《萤光》是在当时由一些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社会斗争经验又十分浅薄的一部分中学生在反日爱国的激情下搞出来的，还没有同社会上广大群众结合，也不会动摇敌伪的根本统治，其对革命历史作用是不应估计过高的。但青年学生们在地下共产党员张逸秋（尽管曾暂时与组织失掉过联系）的影响下，敢于在敌伪的严密思想统治的地方学府中，搞出令敌人震惊的这个貌似公开、实是地下的反日刊物来，这对团结进步同学，唤醒同学们的民族觉悟，还是有一定政治影响的，这段历史也值得回顾的。最后让我们用几句短诗来做结束吧：

半世将过亿《萤光》，
豪情犹有旧时狂。
写来阵阵心潮涌，
应记当年血一腔！

千秋功罪待评章，
鸿爪应留旧校场。
白首傲霜人未死，
还将余热付春光。

（作者徐攻玉系大连金光化工厂厂长，党委付书记，现已离休；马群系新金县六中教师，现已退休）

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

——记辛亥革命关外军与顾人宜

马群

写在前面的话：近年来一些近代史著（包括近代史资料）、报章以及大专院校学报有关辛亥革命在辽宁的文章，其中无不谈及其复州民军（或有称关外军第一军）及其司令顾人宜；而今在其桑梓，提起“老司令”，凡年长者，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不论史著、论文，俱在于论述整个辽宁的革命斗争，对顾人宜及其民军，均有语焉未详以及与史实未合之处。笔者曾以《对论述辛亥革命复州民军一些问题的质疑》为题，从五个方面略述浅见（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 年第 3 期），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谈及。年湮岁久，即使当年与顾氏一同举事者所写的回忆录，亦难免有失记之虞，何况后人！当时，辽宁各地举义风起云涌，而形成正式军旅者，唯有顾氏之民军，且一直战斗到清帝宣统退位为止。笔者觉得在地方史的研究上，实有比较详述之必要。为求无违于史实，尽量稽诸旧档（如《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参考顾氏墓碑碑文以及有关史著、论文，佐以笔者早些年对与顾氏举事有联系的人氏的专访。虽然如此，乌焉马之处也在所难免，敬待识者教正。

东北地区从 1894 年到 1904 年仅十年间，便经受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役与甲辰日俄战争的涂炭，城乡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清廷复将多种捐税强加于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以致民不聊生。农民痛呼“无论丰欠如何，嗣后种地皆须赔死”②；工商业者则哀叹“商情甚为窒塞，百行株守，萧条已甚”③。城乡居民尤以农民生活最苦，原有身负之赋税成倍增加，新税目又日渐其繁，税额日见其增，除“正税”（如地亩税等）外，什么“豆捐”、“盐捐”、“牲畜捐”、“警捐”、“学

捐”、“过境牲畜捐”、连烟突、灶坑和使用的斗、秤也在纳捐之数，诚可谓“无事不捐、无物不税”了。

辽东半岛诸州、县，如复州、庄河等地，本来就山高石厚，土瘠地薄，平常岁月，好地一天（六亩）能打三石粮，瘠薄的山地则只收几斗，一到灾荒岁月，往往颗粒不收。然而官府盘剥，不因稍宽，地方摊派，莫之几减。许多穷人家为求存活，有的拖儿带女，到东丰、西丰、沟帮子或北满逃荒；有的因“故土难舍”则以乞讨糊口；有些有田有土者，则被迫聚众反抗了。各庙会首④纷纷联庄自卫，一会有警，邻近各会立即出援。

“联庄会”之成立，名义上防匪徒滋扰，实则以领导群众抗捐拒税为其要务。在“联庄会”的领导下，抗捐拒税斗争此伏彼起，规模日见其大。辽东半岛，在庄河，以隋守真、潘永忠领导之会斗争最频最力；在复州，则有高丕儒、顾人宜之会行动最为活跃。迨至宣统三年（1911年），复州顾人宜与庄河隋守真、潘永忠联合起来，组织民军，响应南省革命，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

顾人宜，字风彬（有的文章称“风宾”，今据顾人宜神主牌⑤勘），祖籍山东蓬莱。其先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迁来奉天府复州东部顾家屯（在今新金县星台镇），至顾人宜一代，顾家已成为复州东部顾家岭（距顾家约二里）一带的望门巨族。

顾人宜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所得口碑资料称同治八年生，民国二十三年卒，今据神主牌勘）。

顾氏幼读私塾，及长，在家务农，兼习针灸医术。为人忠诚朴实，乐善好施，急人之所急，贫苦亲邻若有所求，凡所能为，无不慨然相助，因而在闾里间享有盛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各地奉旨办练，经地方绅耆推举，顾人宜、高丕儒等身膺其职；顾人宜经地方官司保养，清廷赐以蓝翎五品顶戴侯补外委⑥衔，任团总（或有称为“团首”）。光绪三十年（1904年）复州置十二社，顾人宜复被派充聚社（在

今新金县星台镇)社长⑦。举凡警局方面事务,均由其族弟顾人邦、顾人寿等襄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改斗卖盐为秤卖盐、盐价倍涨,盐税猛增,商户、盐贩、民众均受其害。庄河高丽城庙会首滕云吉与玉皇庙会首滕云吉与玉皇庙会首潘永忠,动员千万之众,砸烂盐税机构,驱走税吏,分光盐滩存盐;复州顾人宜、高丕儒遥相呼应,采取了统一的行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在东北正式建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一到任便要加捐增税。徐世昌下令清丈山林荒地,激起民众强烈反对,复州、庄河及凤凰城、岫岩、安东、宽甸的顾人宜、潘永忠、刘雍、鲍化南、王云峰等,于各地自地区集众三万余人,拒绝官吏入境清丈,声振全省各地。徐世昌被迫急令东边道张锡銮向民众首领宣布清丈停止。宣统元年(1909年),庄河地区在潘永忠的领导下,组织了两千人,声势浩大地攻打“城税局”,进行了抗捐抢粮斗争,复州顾、高积极声援。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不顾农民饥寒之苦,旧税不减,新捐又增,甚至鸡鸭猫狗也在纳税之列,还搞了“伍田发照”,加上地方官吏的榨取勒索,使民无生计。庄河潘永忠、隋守真领导民众开展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抗税斗争。这次事件,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给皇上的奏折⑧中可以看出大致情况。奏折称,“地方匪徒”“时有聚众抗官情事。尤以庄河之潘永忠,及复州之高丕儒,稔恶最著”。在其围剿中,“匪众勾结愈广,大股二三千人,小股亦数十百人,势甚汹汹。凤凰城、岫岩各属,人心亦均动摇”。可见会众战斗之勇。前后战斗达二十余日,后潘永忠受伤,不幸被捕,于农历八月初一(公历9月22日),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同时殉难的还有隋云朋、刘中林、宋国忠等。这次斗争,复州会对潘、隋在武器上曾予以支援。潘永忠等被处死后,其弟潘苏忠(人称潘老四)、隋守真等避于复州顾人宜、高丕儒处。赵尔巽令庄、复防营务

将“逸匪”根绝。巡防右路管李万胜驻防复州四年，贪污、收刮，同地方劣绅过从甚密，而与顾人宜、高丕儒等则素来有隙，自然乐除。但李万胜深知顾人宜等之实力，不肯轻易发兵，便采取卑劣的诱杀手段。高丕儒时为四区区官，顾人宜、顾人邦这年在复州东部地区操办预警。李万胜在碧流河东岸营次，召请人顾人宜、高丕儒等至李营商谈警务与治安事宜，顾人宜、顾人邦等已识破其阴谋而未赴会，高丕儒带两名警兵前往，入李营即被逮捕杀害。继而李万胜又派兵乘夜渡河，捕杀了徐吉庆、曲学升。一些人家中之银元、金银首饰及珠宝、衣物等也被抢掠一空。

高丕儒之被诱杀，巡防营兵之抢掠，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清军与地方官吏的仇恨，加速了顾人宜组织民军举义的行动步伐。庄河事件之后，庄、复官员秉承赵尔巽的旨意，曾“三次遣士绅等往招传谕”^⑨，顾人宜等决不为其所动。

上述庄、复地区的这些斗争，为顾人宜等参加辛亥革命打下思想基础和积累了斗争经验，但还有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政治基础。

1907年春，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吴昆、白逾桓等来奉天省城（今沈阳）以办实业为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后机关迁于大连）。当时，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委在清北洋新军中任职的吴禄贞（第六镇统制）、张绍曾（第十二镇统制）、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协统）以及前任奉天营务处提调，后升任总督麻军事参赞的张榕，还有奉天实业学校教员徐镜心等，都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骨干。顾人宜其人其行，蓝天蔚、张榕等已早有耳闻。顾人宜的族弟顾人敏时在办理复州砬子窑煤矿（今瓦房店市东）的矿务，常到省城奉天，结识了蓝天蔚、张榕等。经蓝、张介绍，顾人宜、顾人邦、顾人敏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参加了同盟会，其所领导的联庄会，由自卫迈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顾人宜组织民军参加辛亥革命还靠两个族兄弟鼎力相助。一是族弟顾人邦，英勇善战，处变不惊，颇具军事指挥才能；一是族弟顾人敏（顾人邦之亲兄弟），为人豁达，长于谈吐，交游颇广，因办矿务，常来往于

京、津与奉天之间，接触方方面面人物，见多识广，有新思想，对当时的时局与未来的政治形势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两兄弟，为顾人宜的左膀右臂：军事倚重顾人邦，外交悉委顾人敏。时称三人为“顾氏三杰”。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至奉天，在奉天省城之革命党骨干张榕、徐境心、左雨农、陈干、商震等人于蓝天蔚协统部（在奉天北大营）集会，商讨为响应南省革命在奉省各地迅速举义事宜，会上决定推举蓝天蔚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公推顾人宜为革命军南路协领，西路为祁耿寰、东路邵兆中、北路朱霁青、中路宁武。准备随时树起革命旗帜，发动武装起义^⑩。

顾人宜以顾家岭一带为根据地，将自家与顾人敏、高丕祥以及大娘娘庙的房地产为抵押，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购买枪械，招募民军一千余众（复州东部三、四区巡官、巡警、预警等俱参加民军），准备起义。举事正在筹备，为李万胜侦知，谋划对顾家岭一带进行扫荡。顾人宜获悉清防营之企图后，当机立断，决定先发制人，提前举义，于11月20日率民军进攻李家卧龙（在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巡防队，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战斗结果，清巡防队大败，向瓦房店方向逃窜，民军初战告捷。此战通长江之为“庄复之役”^⑪。它揭开了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的序幕，是东三省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11月24日，联合急进会杨大实（前复州警务长，时为联合急进会总务股长）、张璧至顾人宜革命根据地，与顾人宜面商“起义及与南省革命军联络事宜”^⑫。11月27日，顾人宜于李家卧龙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并以中华民国征清满洲第一军司令官^⑬名义发表宣言，指出起义目的在于响应南方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除莠党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⑭。同时，对外向日本关东都督府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发出通告，要

日本“严守中立”⁽¹⁵⁾；对内则向驻守盖平、凤凰城、安东、海城、熊岳、营口等地清军官兵送招降状，号召清军与巡警“无分旗汉回蒙，均可献军械以投诚，并赏银六两，以示鼓励”⁽¹⁶⁾。在顾军的声威下，许多清军官兵来投诚。民军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不数日，参加起义人数由千人迅速扩至四千余人，势力范围也由顾家岭、李家卧龙扩大至大娘娘庙、东磴（今均属新金县城子坦镇）和刘屯（今属新金县星台镇）等地。庄、复地区居民均准备响应革命。

自顾军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并获全胜后，赵尔巽一边叫嚷“务要根绝”，一面又妄想把军民收编为巡防队以为己用。庄、复官员们因而急忙派员如走马灯似地至顾军与顾人宜、高丕相（高丕儒之弟）、隋守真、潘苏忠商谈“和解”。先是“选派与顾人宜素好之孟传文、鲍桂枝、梅景山”⁽¹⁷⁾等地方士绅，企图以私人感情进行所谓“劝谕”，继而派出宫玉璋（复州勤学总董）、牟维新、王志潜（议事会议员）⁽¹⁸⁾与之交涉，复州水门子（今新金县莲山镇）巡检（光绪三十二年始置，佐知州署理州境东部之政、教、军、警、学诸方面事务）刘文翔还只身见顾人宜“陈说利害”⁽¹⁹⁾……这些人在致赵尔巽等电、函中，绝口不谈顾为响应南方革命而举义，把这次举义称为“滋事”，并把原因尽量揽到官军身上，说“因前次剿捕，官家实有办理不善，兵弁实有淫虐人民之处，激而出此”⁽²⁰⁾；“剿抚后复借端索诈，以致激成此次之变”^[21]。自欺欺人地说：“伊等已有了结之心”，约定“官军不剿捕，伊等决不出为侵犯”^[22]。老奸巨猾的赵尔巽岂不知顾举兵的真正目的！就在地方官员说这些假话时，他在致电清廷内阁袁世凯时称：“……蓝天蔚在大连自称关东临时都督府，散布伪扎招兵，已勾起事者有复州、庄河、凤凰城、辽中等处……”^[23]。

真的是“官军不剿捕，伊等决不出为侵犯”吗？11月28日，牟维新、宫玉璋、王志清再次到顾人宜处的当晚，顾军已做好准备，由顾人邦率民军百余名进攻水门子，29日凌晨4时出发，早六、七点钟接仗，进攻“緝

私局”及“驻水门子步四营中左两哨”。《盛京时报》载：“顾司令亲率大队长四人，晚四点出发，四路而进，明晨初九（按公历 29 日）早七时接仗，革命军奋不顾身，至十点钟，巡防队大败，死伤一百余名，被革命军所获者二十余名，哨官奎裕庭亦被革命军所擒，革命军只伤四人。”就在这一天，庄河厅同知樊宝青于致赵尔巽禀文中，报告了顾军开仗的理由，双方伤亡情况，并转述了前去谈判的三人回来后的报告。赵尔巽次日复樊宝青电文[24]称：“顾人宜本无大罪，概予宽免”，谎称“所以未列名者（按指前时之“宽免”名单中无顾人宜之名）以其罪轻也，可告知此意”。同时在给驻瓦房店的巡防前路帮统李蓬瀛的电报[25]称：“退兵本应伊等先退，不然亦须同时并退，我退至瓦房店，彼退回顾家岭，至两边齐退后，即谕潘、顾等或亲身或遣人到瓦房店面陈办法。彼此均不准多带人，不携枪械。如不肯至瓦房店，即在水门子见面亦可”。赵尔巽之所以如此容忍，是因为在顾人宜民军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各地纷纷起事，使他感到极大威胁，为了消灭奉天省城的革命力量，在辽东则要集中力量消灭凤凰城等地的革命武装，于是对顾人宜采取剿抚兼施的反革命策略。

12 月 3 日，赵尔巽指令庄、复官员亲自出面向顾人宜提出议和建议。次日官方派出奉天咨议员王子万、复州议事会议长张乐民、庄河厅同知樊蕴珊（按即樊宝青）以及梅东乔（按盖为梅景山）、顾晓亭为代表，赴已约好谈判地点大娘娘庙（在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同顾人宜的代表谈判，历时共八日。民军代表提出的条件，据 12 月 5 日《盛京时报》所载共有三条：“一、清军必须全部发还本年夏季掳掠当地人民的枪械和财物；二、将现在编成队伍的义勇数知名改为义军，保卫地面，由公家发饷；三、现在驻在庄、复之巡防营全部撤出境外。”而《民报》第 29 号（1911 年 12 月 9 日）载，则为四条：一、须退还在复、庄地方所没收的浪军（按

指抗捐斗争的武装群众)的财产;二、顾人宜于复州、庄河境内训练二千人,并具有指挥权,除知县外,无论任何人不得干涉;三、目前所用兵费用公家赔偿支给;四、复州巡防队队长李万胜须放逐于东三省外。第一次谈判,因对第二条有分歧意见,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第一次谈判后,庄、复官员曾派商务分会理事王舜臣到顾人宜处做过试探,顾人宜表示:“此番义举官逼民变,决意改革政治,造新国家,私愤二字,早已消除净尽。对罪恶严重的民贼亦断不加害。倘若辈不知自爱,统兵搦战,势不能不痛击”[26]。从此按兵不动。赵尔巽得以有喘息之机,镇压了奉天城内的革命党人,旋即派刘恩鸿(按当即刘锡三)马、步、炮队前往庄河,对顾人宜施加压力,后又经谈判,顾人宜终于接受了赵尔巽赔偿起义所耗之军费一万两,将民军改编为保护地面的巡防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支援东北革命,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陆军总长黄兴授蓝天蔚以北伐令。1月16日,蓝天蔚率领以上海学生为主体而组成的北伐军,乘“海容”、“海琛”和“南琛”三舰到山东烟台。顾人宜在听到北伐军北上的消息时,将赵尔巽赔偿的一万两军费和关外都督府拨给的万元经费用来购买大炮十余门,步枪三千支,准备再举义旗(此项武器由大连机关支部于1月下旬运往庄、复)。

北伐军到烟台后,蓝天蔚即以关外都督名义委商震为关外军总司令,顾人宜为关外军第一镇镇统,顾人邦、邵兆中为第一镇协统,顾人敏、杨大坚、张君玉(按即张璧)为参谋,李文海、顾崇志、尹锡五、张暇臣为标统,李祥海为炮队营官,孙天发为民政部长[27]。

北伐军舰艇于1月下旬已开赴庄河境海口。北伐军登陆后,民军分成两路,一路由东路协统邵兆中指挥,向庄河、凤凰城、岫岩挺进;一路由顾人宜率领,向瓦房店进攻,尔后拟北进熊岳、盖平。

2月4日,顾军向水门子发起进攻,巡防队败退,适有南路巡防营帮统

李子敬、管带陈宝珊所部前往庄、凤，二人只带八名兵弁，歇足于水门子巡检衙门，被顾军捕获。赵尔巽于当日得到消息后，迅即急电驻瓦房店水师营炮队王、张两管带[28]，声称得此消息“殊堪骇异”，令其“速转告马统领、张从云等，设法救援该统领”。

2月6日，顾人宜民军攻占了瓦房店（后做战略撤离）。2月10日，东部邵兆中所部攻占了庄河厅。庄、复前线清兵士气沮丧。这时，赵尔巽已手忙脚乱，一日数电马龙潭、冯德麟、令其调集军队围剿。

2月11日，清军防营由复州由复州城倾巢而出。2月14日，顾人宜民军与清巡防左路所部激战于水门子北曲家店（今属新金县沙包子镇）、坡子店（今属新金县沙包子镇）、坡子店（今属莲山镇）。这次战斗，清军的指挥官为代理前路巡防帮统官孙烈臣（此人于1917年由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瑞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所率有炮队管带王永峰、强守贵，马队管带张作相、陈九芝，步队管带鲍德山、牛永福，步队哨官齐恩铭、殷宝山等所部。接仗的激烈程度当过于瓦房店一役。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协议，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电令蓝天蔚停止进攻。命令传至顾人宜民军前线，于是，相持两日之酣战，遂告停止。

2月14日，孙中山去参议院辞职，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5日，蓝天蔚接到南京陆军部电报[29]称：“南北对峙已合成一体，无复有滥事残杀之理”，军队“仍驻原地，听候善后指示”。而在同日，赵尔巽致冯德麟等电[30]则称：“所谓停战，专指登陆之革军，非指顾、隋之土匪也……”。3月9日，段祺瑞致赵尔巽电，又进一步叫嚣：“蓝已由在总统设法招致，俟其离奉，则所有土匪可以放手清办矣”。3月13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至赵尔巽电[32]，内称：“南方人携资派人，议将在奉民军安置

解散”。次日，赵尔巽致袁世凯电[33]，则胡说：“查奉省并无真正民军，只有胡匪到处滋扰”，认为“安置解散”是“反中其术矣”，又无可奈何地说：“现维复州之顾人宜自称民军第一军司令官第一镇统制……似此项沿可用解散”。从中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挫败和为之浴血奋战的民军所处的地位与所受的待遇了。

此后不久，北伐军撤回关内，而顾人宜的关外军并未解散，也开赴山东烟台。北京政府也只好任命顾人宜为关外革命军第一军司令官。袁世凯以给资蓝天蔚出洋游历为手段，使蓝天蔚出洋。商震为得到关外革命军的领导职位而大事活动由蓝天蔚的旧部下和商震的同学程起陆等人推举商震为关外革命军总司令后因袁世凯歧视关外民军，合北京之曲同丰至烟台将其必编为第一步兵旅，任商震为旅长，从此，关外革命军为商震所出卖。顾人宜时值母病告归奉养，母死“殡葬后，只意老守坟墓，绝口不谈兵事，及政府累次聘请，度情视事，墨衰赴京，为陆军部中将咨议，受四等嘉禾勋章[34]”。

顾人宜有职无权，在京数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又一次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公然取消国会与建国之初所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是南北公开分裂。孙中山以恢复民元编印法和国会为目的，举起护法旗帜，1917年8月在广州召开由南下议员组成的非常国会，决议成立军政府，9月，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民国七年（1918年），顾人宜南下广州，“耿孙大帅府参军，兼政府咨议”[35]。迨至民国十年（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于广州就职。10月8日，广州非常国公通过北伐案，尔后开始北伐。民国十一年（1922年），张作霖在直奉战败后，广用人才，奉民重振，与在上海的孙中山结成孙、段、张三角同盟。民国十二年（1923年）孙中山结成孙、段、张三角同盟。民国十二年（1923年）孙中山于沪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直、奉、皖与西南各省四派和平统一。是年，顾人宜返奉天，

不知是否为孙中山授意。当时，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顾人宜“充阅使署中将咨议”[36]。民国十三年（1924年）“充奉天第一军参议”[37]。是年，奉军进关，与倒吴佩孚（直系）的冯玉祥联合，将曹锟（直系）打下台，共推举段祺瑞（皖系）为北京临时执政。张作霖请段祺瑞任命其部下李景林为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张宗昌为山东省（鲁）军务督办兼省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作霖拥有奉、吉、黑、直、鲁、皖、苏、热八省地盘，各省军队亦有扩张。因奉民军势力扩充到长江流域，冯玉祥、孙传芳不满，下令讨奉。这时，郭松龄于11月下旬公开反奉。乘郭松龄反奉之机，冯玉祥，孙岳等打着“国民党”旗号，击溃在直之李景林，并与在鲁之张宗昌对峙。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人宜“为鲁直联军督战司令”[38]。民国十六年（1927年）顾人宜因“积劳成疾，告假就医，不意一卧弗起。二十年（1931年）三月丙辰奄奄告终”[39]。

注：

①顾人宜墓碑毁于“文化大革命”中，碑文抄件存在东北烈士纪念馆。

②《盛京时报》1907年1月5日。

③《盛京时报》1907年1月8日、29日。

④旧时各寺、庙修缮殿宇、祭神唱戏之筹款，维持庙会秩序以及应付官吏军警等，均由地方人推举德高望重的人为会首来主持。后来，乡里纠纷、公私琐事也求会首解决，会首实际成了一方的主事人。

⑤顾人宜神主牌位，现保存于东北烈士纪念馆。

⑥⑦《顾人宜呈状》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 96-98页。以下凡见于该《丛编》之电、函、均用“※”表示。

⑧《辛亥革命》（七）419页。

⑨《复州知州何展采致赵尔巽函》见“※”39页。

⑩据宁武《辛亥革命前后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辽宁日报》1961年10月11日）并参加其他有关资料。

(11)据《辛亥革命》（七）390页并参考其他史料。

(12)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历史研究》1951年第四期）一文所引起文句。

(13)系为顾人宜自取之名，见于注(12)及《旅大史略》等史志著。

(14)(15)(16)分别见于《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17)同⑨。

(18)(19)《帮统李蓬瀛致赵尔巽函》见※29页。

(20)《王志潜致金袁铠函》见※29页。

[21][22]见※40页《牟维新等致赵尔巽函》。

[23]《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袁世凯电》见※31页。

[24][25]均见※47页。

[26]《盛京时报》1911年12月5日。

[27]《满州国地方事情·奉天省复县》（日文，大同学院编）。

[28]见※153-154页。

[29]转引自关捷《辛亥革命时辽宁革命党人的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六期）。

[30]见※187页。

[31]见※227页。

[32][33]见230页。

[34]——[39]见顾人宜墓碑文。

谷次亨印象记

高允川

笔者四十年代曾流寓长春，供职于伪满民生部。大约在 1940 年秋冬之交，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伪《政府公报》发表了一批高层人事更动的政令。其中有一项大意为：

“民生部大臣吕荣寰特任全权大使，派驻中华民国”。

“总务厅次长谷次亨特任民生部大臣”。

公报发表的当天下午，伪民生部就在大礼堂召开了全体伪职官员迎送大会。这一天下午似乎外出办事的人很多，所以大礼堂内并未站满，显得稀稀拉拉的。

会上，首先由吕荣寰致告别辞。接着，新任伪大臣谷次亨向全体僚属训话。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但他与大家初次见面却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他的讲话翻译方式与其他高级伪官有所不同。不是先说汉语，再由译员口译成日语，而是先看了他那不懂汉语的日本秘书给他起草的日文讲稿，在会上按照日文讲稿的大意用汉语讲一遍后，再由日籍译员按书就的日文稿照本宣读。这样一来，与其说译员给谷作翻译，还不如说是谷给译员作翻译。谷在以后其他场合讲话也一律按此程序进行。

谷来伪部履新引起了一些知情者的物议，说他太厉害，把伪大臣室大加改装，地毯、沙发焕然一新。又说他在三十年代接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时，正是日本人对安东（今丹东）一带教育界大逮捕之后，“救国会事件”引起了人心惶惶，尤其是教师不安心上课。谷到任伊始就召集教育界训话，收揽人心，发誓以身相保。教育界受其欺骗宣传，逐渐稳定下来。日籍人员就他名字很象日本人，背地里都称这为“たに样”（山谷的“谷”日语たに，“样”是

先生的意思)。

谷着“协和装”，佩戴日本皇室徽菊证章，颇引人注目。在伪官员高层中仅有极少数人持有此种关东军入门证章。据说持证者可随时与关东军接触，或应召汇报高层华人的思想动态，给人们以十分憎恶鄙夷的感觉。

据说有一次某人与谷谈话，问原籍。谷感慨地说，本来是复县（今瓦房店市）复州湾，但叫人家赖去了。他说的地方就是今天交流岛的五岛，这个地方原属复县管辖，清末旅大先后为俄日所据，这里正处在交界处，后终于被划入租界隶属伪“关东州”，故谷作如此回答。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升允给恭亲王阴谋复辟的秘信

于植元

一九五六年，我在收集旅大方志史料的过程中，在罗振玉的大弟子孙玉良先生手里发现了清末的顽固官吏升允给恭亲王的一封秘信。升允在辛亥革命后曾多次阴谋复辟。一九一六年，他在东京与日本大臣勾结，上书日本天皇，请求日本政府支持他的复辟活动。他和日本的田中义一密谋，准备在国内掀起武装暴乱后，请日本政府出兵协助。密谋决定之后，升允即写此信派人送至当时寓居青岛的末代恭亲王溥伟，让溥伟在山东筹措兵力。阴谋未能得逞，一九三一年恭亲王来到旅大，寓居于星海公园西侧的“星浦山庄”，此信即带至身边。孙玉良当时常到恭亲王家，恭亲王死后，孙玉良从他家得到一批书籍和文物，这封秘信即在其中。

我发现这封信后，即找到升允的其它手稿相对照，确认此信为升允亲笔。后来又请升允孙罗英先生仔细看过，他熟悉乃祖的字迹，认定无误。因为这封信反映了一个近代史上不曾被人得知和揭露的大阴谋，便征得孙玉良的同意，借出请《旅大日报》社拍照并制成锌版，我把原信返还孙玉良，锌版也已不在，幸赖《旅大日报》还保留了这封信的原来的面目和全文。我现在将此信流传及丢失经过写出如上，并按原格式把信抄录于下，再把信中涉及到的人物作一说明。

王爷钧鉴

手谕敬悉正月中旬与山县约期会晤托田中为介

田中名义一现任参谋次长前者山县答

尊处书即其手笔也据称山县患病俟两三礼

拜再商诂至今未愈迄未得见允有上大正书钞
稿呈

览此稿孟贤曾见之刘潜楼兄可令一阅余人幸
勿见示日政府諄属秘密倘漏泄恐致败事彼亦
将有责言也

钧议辽沈齐鲁二策自可并行允亦径往东蒙号召
秦陇顾东邻不能经明助仍须自己兵力未审齐鲁间
有无线索耳

来书又以

贵介弟姻事过示

搆谦允已寄书家中俾内子作主

尊处如不见弃可令孟贤函告小儿就近商议允行

将从事军旅驻足靡定也此复敬请

崇安伏惟

垂察

升允谨启丙辰二月初八日

信末所记年月为丙辰，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当时升允在日本东京。写这封秘信的背景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后，清统治虽被推翻，但由于这个革命的不彻底，顽固的封建统治势力并没有真正被铲除。失去政权的清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总是在寻找时机企图复辟，升允便是这类人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升允，字吉甫，蒙古镶黄旗人，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死时，溥仪还曾给他以“文忠”的谥号。早在宣统元年（一九〇九），他在陕甘总督任上，即因极力反对当时的点滴改革而被近辞职家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秋，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起义于武昌，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升允，任陕西巡抚，督办军务，以与革命军对抗。他曾带兵向革命军反扑，先后攻陷长武、永寿、分州、醴泉、咸阳等九县。甚至在清政府已被推翻，溥仪退位之后，他仍带兵顽抗，不肯停兵。最后由光绪皇帝的孝定景皇后降“懿旨”，他才被迫于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三月停战。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出奔库伦，筹组兵力，

密谋起事，不成，又逃至日本。第二年，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他又暗中串联清朝旧臣，阴谋起事，又不成。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袁世凯称帝，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和升允共同策划，欲借机倒袁复辟。升允即在日本通过当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的介绍认识了元老山县有朋，并借机上书日本天皇，请求出兵协助他们起事。当他和田中义一合谋之后，即将此事写一秘信派专人送至青岛的恭亲王溥伟。

信中提到的孟贤，姓高，名起元，清朝举人，先世驻防广州，曾随肃亲王善耆来旅顺，任旅顺工大与二中两校教师。所提到的刘潜楼，名廷琛，光绪时翰林，官司至侍郎，当时亦寓居青岛，与恭亲王溥伟过从甚密。信中提到的“贵介弟姻事”，是指恭亲王的弟弟、著名书画家溥心田的婚事，他后来娶了升允的女儿。

信中暴露了被推翻的清统治阶级阴谋勾结国外反动武装搞军事叛乱的复辟野心，这个罪恶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却是近代史上不曾为人所知的特大阴谋之一。由于原件已佚，我是最早将它公之于世的，所以将整个过程叙述如上。

（本文作者是市政协常委、大连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王永江二三事

尚允川

笔者籍贯辽宁，少年时代正是旧中国军阀混战、张氏父子执政东北时期。王永江初任奉天省警处长，1917年任财政厅长，后擢省长仍兼财政职。因其有一定的政绩，传闻亦多。今天回忆往事已隔半个世纪。现在把言事可靠而自己记忆清晰的聊举数条，以为治近代史者的参与。

笔者家乡有虎獐屯村（旧属海城县。解放后政区调整析归营口县），该村民聚讼，呈文送达省长公署。王氏批曰：“地名虎獐，人无善类。”遂不受理。村人因地名不祥且不雅，乃改称“虎庄”，沿用至今。

笔者曾见到王氏民国高级警官服装的半身照片，并有题诗：

马上题诗又十年，几经沧海变桑田。

而今无复封侯志，注到孙吴第几篇。

很可能是王氏晚年蜚居家中无聊读书时的漫笔。

闻知情者言：王氏任奉天省长时，曾收藏宋文天祥《正气歌》，原来手迹于财政厅档案室保险柜。财政厅失火，档案室付之一炬，稀世文物亦随这毁来。王氏为此异常痛惜。

王氏第二子名贤韦，1943年担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此职原为日籍编制。伪“总务长佐”为日籍，实为伪满后期改任中国人，王贤韦是最后一任。

大连地方人士及往来书画名家轶事

孙宝田

金州义士刘心田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清廷派陆军提督刘盛休带领马步十二营驻扎金州城南大连湾（即柳树屯）一带，占地安营，农民惶惶，恐碍耕种。邑人刘心田，字伯良，晚号一粟老人，王书善画，为当时不慕荣利之逸士。面谒盛休，愿以自己家土地供军队驻扎之用，幸勿占用他人田亩，盛休欣然允之，并保举心田为把总（武职之末级，正七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俄人强迫清廷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初议只租旅顺、大连湾两海口，及划界时，仅存金州一城。越二年，八国联军入京师，俄人趁此机会，将金州城内中国官吏拘而流之库页岛，作重劳役。翌年，辛丑条约签订，始放回，有病死示归者。俄人复疑金州城内匿有清兵，架巨炮于城南山，将轰金州城。心田闻之，立见俄将，保无其事。遂质心田于俄营，派兵入城搜查，果无伏兵，始释心田，全城数万生灵得免于炮火浩劫。乡人至今德之。民国十三年（1924年），心田病卒，邑绅李在旃孝廉（名义田，光绪己丑科举人）挽以诗云：

昔闻谈笑保孤城，九鼎一言敌亦惊。
始信经纶为陷逸，真教韦丑陋公卿。
花间时寄琴书趣，海外争传字画名，
七十精神犹矍烁，不应一疾骑长鲸。

金州天后宫戏楼楹联的来历

清乾隆年，山东船户龔资在金州城内西南隅建修天后宫，因戏楼前面悬有山东会馆匾额，故亦称会馆庙，规模宏敞。戏楼落成时，请人写匾，皆不称意。时有工人王丕纯自荐，监工者姑试之。丕纯振笔大书“省观世迹”四个大字，气象雄伟，为全县寺观匾额之冠。又撰楹联云：“优孟衣冠假笑啼中真面目，骚人游戏小风流处大文章”。款署乾隆乙亥长至日（即 1755 年夏至），即墨王丕纯题。丕纯为山左儒士，渡海来辽，川资告罄，杂于佣保中，监工者厚备川资，送其回里。

沈阳盐官张之汉诗赞金州奇士阎世开

张之汉，字仙舫，沈阳人，光绪优贡，民国时官东三省盐运使，诗书画皆工。《题阎生笔歌并序》云：生名世开，字梅一，籍金州，振奇士也。甲午中东之役，州城陷，民咸避兵去，生独落落戎马间，怀奇蓄愤，欲有所伸，敌军方窥旅顺，募向导，谓生可赂以金，不从胁以刃，益怒骂，敌不解华语文同，辄抽笔伸纸，所书皆忠愤之词，剑槊齐鸣，笔走不辍，敌怒，遽拥出山麓剖心肝以死撑天地泣鬼神矣，因为作歌。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用正气歌句）。

奋椎难击博浪沙，抗节直比胡天雪。

菲椎非节三寸毫，竟凭兔颖探虎穴。

千军直扫风雨惊，坡肝沥血凝成铁。

饮刃宁惜将军头，振笔直代常山舌。

头可断，舌可抉，刃可蹈，笔可折，

凛凛生气终不来。吁嗟阎生古义烈。

阎生著籍辽海军，系心家国身蒿蓬。

策卫喜读剑侠传，斩蛇恨无隆准公。
海国无端起战雾，天堑鸭江竟飞渡。
席卷已下金州城，毡缒更觅阴平路。
识途老马用阎生，冲冠义气岂能平。
直将易水悲歌气，激作渔阳挝鼓声。
阎生发冲敌目笑，不通重译舌空掉。
抽笔愤书忠义词，义雪刀光迸出鞘。
刀边骂敌努裂眦，掷笔甘就刀头死。
心肝攫出泣鬼神，淋漓血染山凹紫。
呜呼皇朝圣武开神皋，鼓鞞将帅思贤劳。
九连城头将星落，颓军断后谁盘槩。
东南铜柱沉江涛，太阿倒柄凭人操。
十万横磨岂不利，一割无用同铅刀。
胡为乎刀围大帐笋锋密，挺然独立阎生笔。

上稿脱于光绪乙未（1895年）岁首，去阎生遇难数月耳。客窗薄暮，某友踏雪来访，拨炉煮茗，剪烛清谈，话阎生事，索原稿就灯下观之，观未半鼻也翕张，气虎虎绕室走，走已复观，瞠目直视，遽起而设诸火，曰“已矣，勿再令已者痛心！”而此稿遂亡，忽忽三十余年矣。丙寅因事赴金州，询其人鲜有知者，归忆旧稿，强半在胸，度岁稍暇，因书出之。

辛亥革命时梁启超过大连的诗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维新之士，著有《饮

冰室合集》。启超年三十九岁时，自日本返国，舟抵大连，闻武昌起义，知清室瓦解，遂次大连不进。有诗云：

虎牢天险今谁主，马角生时我却来。
醉抚危舷望灯火，商风狼藉暮潮哀。

由大连夜乘车至奉天诗云：

蒙蒙印沙月死，瑟瑟摇风草黄。
一夜似梦非梦，眼前千前战场。

由奉天却至大连道中诗云：

穷秋朔雪动征非，知为美游为恶归。
时人颇惊辽鹤返，长路终羞宋鷁飞。
水赤磨刀判伤手，月明绕树怨无枝。
横流满地见龙穴，欲障泥丸力恐微。

辛亥革命后清皇室肃亲王避居旅顺时诗

肃亲王，名善耆，字艾堂，号偶遂亭主。宣统辛亥后，避地旅顺太阳沟，赋诗云：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恭亲王溥伟移居大连时的诗

恭亲王，名溥伟，号锡晋斋主。王戌（1922年）秋日，自青岛移居大连，筑室星浦山庄，临池赋诗以遣怀。

《和白乐天宫城早秋韵》：

天心不厌乱，四方多战争。白露惊秋早，游人百感生。
西风大雁至，夜雨草虫鸣。世乱桑麻少，岁荒人命轻。
江郎恨何亟，屈子怨难平。缅邈龟山操，弦歌望鲁城。

《星浦山庄闻雁》：

露下青槐陌，秋深白豆腐。寇氛兴未艾，游子怅何之。
仆仆将焉获，劳劳多所思。独伶一行雁，不爽去年期。

《春日》：

卦进新秧绿四周，余寒未解旧棉衣。
年年海角愁春去，日日矶头看鸟飞。
客舍松萝经宿雨，渔家烟水静朝晖。
东风处处皆芳草，惆怅天涯恨未归。

瓦房店市瓜尔佳氏关姓宗谱

瀛云平

我们从瓦房店各乡村得到了很多锡伯族的宗谱，其中以关姓（瓜尔佳氏）为最多。经过整理研究，得到了一份系统完备的瓜尔佳氏宗谱。这份宗谱世系十八代，纵贯六百年。它是锡伯族史的一个纵断面，清楚地说明了当今大连地区锡伯族的族属源流与世次，是一份罕见的历史文物和原始资料。

这些原始资料是一位锡伯族离休干部那启明同志亲自从乡村采访得来提供给笔者的。

清朝前朝，国人对锡伯族源的认识是很清楚的，都知道锡伯出于女真，与满族同源。例如天聪九年（1635年）太宗皇太极谕旨中明言：“夫诸申（女真、肃慎）乃席北（锡伯）绰墨尔根之裔。”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满族研究资料》第三辑中的《乃济陀音二世传》，引康熙皇帝对活佛（指乃济）的话说：“科尔沁十旗乃是尔等檀越，也是朕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族的锡伯、呼勒沁部。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赉其诺颜，把他们招收过来。”这里更明确指锡伯与满族同源。清史学家杨宾的《柳边纪略》里也明言锡伯自言与满州同源。

后来何秋涛（1824-1862）在《朔方备乘》中说，“臣秋涛谨案，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认定锡伯族是鲜卑的后人。此后很多学者附从何说，写了不少类似的文章，对清太完的谕旨及杨宾的调查记实都置若罔闻。还有人把太宗皇太极说的“绰墨尔根”解释成绰尔河和墨尔根（嫩江）城。并有人把锡伯亦作锡 **𡗗** 的“**𡗗**”字讹成“**𡗗**”或“**𡗗**”字，又在两个汉字的结构上去找锡伯族的族源，真是离题万里。

“绰”，是人名，全称是“瓜尔佳绰”。但锡伯人的习惯称名而不冠姓，所以只称“绰”。“墨尔根”，意为“善射者”或“善猎者”，只赐号事赠号。它与绰尔河的嫩江城根本不相关联。至于把“ ”字讹成“ ”或

“ ”，由是书写印刷上的差误造成的。“ ”这个字有很多人认识。

我们这份“瓜尔佳六百年的宗谱表”是从两份原始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一份是瓦房店市东岗乡喇嘛亩村关明乙家所藏的《锡伯族瓜尔佳氏被拨往各地驻防兵员名单》（以下简称为《调兵录》），仔细看来，这份名单是一部瓜尔佳氏的原始宗谱；一份是在许多关姓宗谱中查出来的东岗乡达子营关世明的宗谱，把两者接上头，就完成了这部“锡伯族瓜尔佳氏六百年十八世的完整宗谱”。《调兵录》的开头说：

“原兄弟三位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觐河札汉多宽地方。一户另户瓜尔佳氏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名超，莫勒根衙，之子名奇拉汗……”这一段，与日本岛田好的《清前史的研究》及《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一帙二卷宗里所说的：原在苏完刷觐河（今吉林省双阳省流贯县城之河）地方的女真瓜尔佳氏兄弟三人分离。长兄佛尔和仍居原地，次兄尼雅哈齐向西北迁于溪泊地方——后为锡伯挂勒察祖，三弟珠察迁往瓦尔喀……等内容相符。其“超，莫勒根衙”一句，与清太宗天聪九年所说的：“夫诸申乃席北绰墨尔根之裔”一句全符。

这简短的对照，就证明了：绰墨尔根之裔的锡伯族，系出于女真，与满族同祖无疑。清太宗的谕旨，杨宾的调查记实，康熙帝对活佛说的“那里有我们满洲的锡伯、呼勒沁尔佳氏一段的记录等，都完全正确，都合乎历史的客观实际。

今天我们大连地区的锡伯瓜尔佳氏（关）氏，正是太宗所说的“绰墨尔根之裔”，是绰墨尔根六代孙图们的后裔，是女真族的一支。（作者系市民革成员、黄埔同学会会员）

附：御玉军汗之子绰墨尔根后世谱系表
御玉军汗（尼雅哈齐？）

绰（超）墨尔根

奇拉胡巴图鲁

达吉伦都督

卜克蝉贝勒

包本贝勒

扎拉胡七贝勒

图们

吠拉马

张一图

衣车那

三七格

撒伦太

宁保

吉平

关希会

关文堂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乙 庆 亚 廷 龙 兴

关 关

世 世

明 千

（按：关文堂后世谱上的父子关系不明）

王永江轶事三则

孙宝田

编者按：王永江（1872-1927），字岷源，号铁龛，奉天金州（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国初年，官司至奉天省省长，素称“理财能手”，以“干练”知名，是张作霖手下智囊团成员，“文治派”首领。后在张作霖屡开战端，角逐中原；连年用兵，财源耗竭；民生日蹙，根本动摇，王永江痛感难以为继，被迫呈请辞职。晚年从事笔耕，有著作问世。最后病逝故里，享年五十六岁。社会上对王评价，毁誉参半，迄未论定。下面三则轶事，系王永江长子王贤泌的亲家孙宝田老人写的回忆。

孙中山给王永江的七封信

三十年代，予在永江老宅亲眼看到孙中山送给王永江的六寸免冠服西装的照片，悬挂在客厅的墙上。上款写“岷源先生惠存”，下款烈军属“孙文，民国十二年菊月于广州。”

日本投降后，与王永江共事多年的前奉天省公署顾问日本人岩间德也的儿子，曾将孙中山写给王永江的七封信的照像底片交给王贤泌。因为底片太小，字迹看不清楚。亲家见我对这七封信颇感兴趣，就主动把收藏了二十二年的原信拿出来给我看。第一封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写的，信中大意是：“去年仲冬，派季新（汪精卫）抵奉，会晤雨亭将军。张将军同意资助粤军五十万元。但至今尚未收到，岷源兄身为省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说话影响之大莫过于兄，请能以助之否？……”

缘 1922 年 4 月直奉战争，奉张失败，北京政府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在这种情况下，张感到孤立，又急于向直系复仇，同年 9 月派人赴广州联络孙中山。孙中山于 11 月 20 日派汪精卫到奉天与张商讨共同反直问题，张同意资助粤军 50 万元。

后面六封信内容大致相同，每次收到奉张接济后，除了感谢张作霖，还要另书感激永江。这六封信时间是在 1923 年至 1924 年间，从信中看，奉张资助孙中山的军费已超过百万元。“1923 年 11 月 25 日，孙中山托叶恭绰带信张作霖，对张的多次接济表示感谢，‘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见《辽宁大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

1951 年王贤泌因事被抄家，许多文物被搜出抛在大街上焚毁，其中便有孙中山给王永江的七封信。

要求收回“关东州”领事裁判权

民国十二年，永江回故里过春节时对亲朋和儿子说：“金州地本属民国奉省，租期二十五年已到，外长要求日本政府交还‘关东州’，至今不果。我这个省长的家乡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实感惭愧。”

民国十三年（1924 年）二月，王永江以奉天省长名义，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关东州”领事裁判权。日本总领事强词夺理，陈述了不同意的所谓“理由”，永江都一一予以驳回，双方争论激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谴责王永江“要求收回关东州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中日两国政府已经直接解决了。”关于永江要求收回“关东州”领事裁判权一事，日本文献也有记载（注）。这是王永江与日本关系恶化之始。

王永江病死之“谜”

1927年春，王永江因病住进日本满铁大连医院治疗。出院后，日本医生定期去金州老宅为王复查。同年11月1日晨王永江病重，家属去金州民政支署向大连医院挂长途电话，一时半左右，日本医生和一名日本护士由大连直到永江老宅。日本医生进入永江卧室后，遂将永江父亲王克谦等人请出，不准一个亲属留在屋内。约半小时，永江父亲敲门要求进去看看儿子，仍被拒绝，说影响治疗。但又过一刻钟，日本医生出来说，“经抢救无效，省长归天了，进去看看吧！”永江你闻说十分气愤，说道：“活着不让我看，死了让我看还有何用！”愤而摔不进。贤泌等进屋看时，见永江嘴唇和脸色发紫，便自然怀疑是中毒身死。但是家住日本统治下的金州，敢怒不敢言。当家人正在痛哭悲伤之际，日本医生和护士悄悄地溜走了。后来家人给永江穿衣服时，发现胳膊上有针眼，这使他们更加怀疑。据当时本地的老中医说，“省长虽然病重，但还不至于一天也过不去……”而永江却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中猝然逝去，这实在不能不让人心疑。

注：日本人浅野虎三郎《满州年表》第390页，外事关系年表中记载：“大正十三年（1924年）二月，以奉天省长王永江的名义，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关东州租借地裁判权的要求……”

大连市早期足球运动的回顾

——记大连隆华足球队

罗仙樵

大连隆华足球队是大连市早期足球运动发展时期的一支由小职员、工人和学生自发组成的足球队。二、三十年代，隆华队人才济济，战绩斐然，曾称雄大连足坛，多次战胜外国球队，对推动大连足球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作为隆华队的组织者，有责任将他的历史记录下来，供关心体育运动史，特别是足球运动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隆华队成立的背景

大连足球运动兴起得比较早，但早期足球运动多是自发性的。没有人组织，也没有足球场，哪有空地就在哪踢球。踢球的人不分彼此，猜拳分伙；既无边线，也无裁判，成群地乱踢一气，后来，一些常在一起踢球的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找人比赛。这种自发组成的队常常是赛几场就散伙了，队员很不固定。一九二二年，大连中华青年会成立了大连最早的一支足球队——中华青年会足球队（简称中青队）。中青队的成立，是大连足球运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的一个转折点。

我那时在大连华商夜校学英文，业余时间非常爱好足球，常在老虎花园（今劳动公园）搭伙踢球。我们的校长傅先生也很好足球，学校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华商队，常和中青队进行比赛，但难得胜一场。久而久之，我就想单独组队和中青队比试比试。一九二五年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把常在中央公园（老虎花园改名为中央公园）一起踢球的同伴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队（以公园命名），约中青队进行一场比赛，但结果仍是一败涂地。

比赛失败以后，我开始认识到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是不能有所成就的。于

是就想组织一支象样的足球队。

二、隆华队的建立

我当时对于足球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如何组队和比赛，知道得并不多，想找本书看也没有。那时大连只有一个启华书局，武侠小说挺多，就是没有体育书刊。后来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汇报上，发现有英国人麦克乐写的一本小书《足球》，我函购了一本，初步掌握了一些足球知识，接着又从中华体育协进会买了一本《足球规则》，以后又订阅了一份日本体育杂志《朝日体育运动》。在一次同英国人的比赛时，一位英国队员送给我一本《足球年鉴》，这些书籍对提高我的足球知识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掌握了一定的足球常识后，我即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球友们几经商量，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队员多是洋行的小职员，工厂的学徒工和学校学生，年龄都在十八、九岁左右。球队建立了，但起个什么名好呢？当时大连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因此，想要起个既要保持中华民族尊严，同时又不致引起日本人注意和名称是都很不容易的。队员中正好有六、七个人是正隆银行的职员，于是我们就商定以正隆银行华人球队做为招牌，定名为隆华足球队。实为兴隆中华的意思。

三、宗旨和章程

建队后，我们把互相团结，锻炼队伍做为足球队的宗旨。

根据当时足球界的混乱状态，我们约法三章：

（一），凡是参加隆华足球队的队员，不得再参加其它的足球队。

(二)，比赛中不得有粗野的动作。

(三)，尊重裁判。

当时的一些球队，临时组成的很多，一些球迷今天参加甲队，明天又参加乙队；今天是队友，明天又是对手。所谓的球队，也只是十来个人凑和到一起，起个名就算是个队，赛几场就散伙，然后又重新组队。队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参加比赛的也总是那么几个人。所以有人说：“赛来赛去还是那二十八宿”。名队比赛时，粗野动作很多，为了取胜，不择手段，打架斗殴，殴打裁判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时比赛，没有正式裁判，一般都是在赛球时现请。被请来当裁判的人对足球规则也是一知半解，有的任意胡判，队员提出意见时又拒不接受，反而说：“我是裁判，我说了算。”因此，常发生裁判被打的事情。我们约法三章就是为了杜绝这种状况，以树立良好的队风和赛风，服从裁判。

四、积极探索，努力提高技术

隆华队建立后，为了检验一下实力，就向当时最强的中青队提出了挑战。赛前我向队员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要怕输，二是团结一致，奋战到底。记得一九二五年夏天，我们隆华队和中青队连续比赛了四场，前三场虽然以0:6, 0:3, 0:1 的比分输给中青队，但每场都得到了锻炼，缩短差距。在第四场比赛中，还以1:1踢成平局。

我们足球队没有教练，也不懂什么身体素质训练。技术的提高，都是在踢球中摸索出来的。最初的技术，说来也很简单，按现在的说法，可以说是区域责任制吧。比赛的时候，前锋只管进攻，不管回防，前场完全交给了五个前锋，前卫只进到中线附近就不再前走了，后场被围攻时，前锋也不回球，队员各踢各的，前后卫则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出去就算没事了。后来与日本人比赛时，学到两个内锋前后接应的打法，也就是战术吧。嗣后在外国杂志上，看到英国已在用三后卫制的战术，我们在遇到强队时，也采用了这种战术。在同英国海军“沙佛克”队比赛时，学到了三角短传向前推进的方法。

那时国内足球实力比较强的队有：上海李惠堂所在的“乐华队”（后改为东华队），东北“北宁路队”。国家队则更是历届远东运动会冠军。而大连由于处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被剥夺了参加国内比赛的资格，无法和国内各强队进行较量，也就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可以说大连足球发展的道路，是一些青年人自己摸索出来的。

五、冯庸杯足球赛

一九二〇年大连中华青年会成立以后，每年都举办一次中华陆上运动会。一九二六年中华青年会鉴于大连足球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决定在中华陆上运动会加进一场足球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青队对隆华队。

奉天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先生得知此信后，特为这场比赛捐赠一座刻有“勇冠三军”字样的大银杯，规定每年都在中华陆上运动会上举行一次足球比赛，连胜三次者，可永久保存这座银杯。因此，比赛也就被定为冯庸杯赛。

那时中青队是大连唯一的一支强队，拥有名将周维璞、祁福祥、马成美、蔡寿山、刘仁秀、刘文廷等。而隆华队则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足球队，成立之初，就被中青队连败三场。此次比赛，中青队满以为稳操胜券，但没有想到隆华队超水平发挥。以 2:0 战胜了中青队。夺得冯庸杯。隆华队顿时声誉鹊起。

这场比赛吸引了两万多观众，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足球比赛。这对于大连地区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冯庸杯赛只举行了一次，以后再没举行过。

六、中日足球赛

一九二七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结束后，日本足球队（早稻田大学队）来到大连，要与大连中国足球队进行两场比赛。中华青年会接此通知后，邀请隆华队商讨对策。经过几番周折，决定由两队合组为中华足球队应战。在中华队中有隆华队队员十一人：耿恩华、刘义昌、罗仙樵、张文焕、王鸿去、李成平、陈英凯、王鸿林、战风台、孙福建、郭义德；中青队员有十人：张柏生、毕文金、蔡寿山、宋发身、刘仁秀、孙广琛、王铭章、李宪章、马成美、刘文廷。罗仙樵任队长，刘文廷任副队长。

队虽然组成了，但因时间紧迫，赛前没有进行一次共同训练就仓促应战了。比赛在大连运动场（今大连人民体育场）进行。第一场中华队由于配合不好，漏洞百出，加上守门员失常，结果以 0:6 惨败。第二场虽然更换了一些队员，但由于部分队员只图个人得分，盘带过多，贻误战机，结果又以 0:4 败北。第一次中日足球赛就这样输掉了。记得当时《泰东日报》记者王兰（中青队队员）写文章，讥笑这场比赛是“大开门进”。

这次比赛的结果使我认识到，光有个人技术，没有集体意识，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自此以后，无论遇有什么样的大赛，隆华队都决定单独应战，以免再出现配合不协调的现象。后来在同日本关西学院队，拓殖大学队，汤线蓄电队等进行的一系列比赛中，隆华队都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特别使人难忘的是一九二九年对日本冠军队拓殖大学队的一战，拓殖大学队在大连共进行了三场比赛、他们首战以 6: 0 大败工华队，再战又以 4: 0 轻取中青队，大连观众憋了一肚子气。第三场比赛由隆华队上场应战，拓殖大学队被打得丢盔弃甲，大门连连被破，虽然换了三个守门员，但仍守不住城池，终以 0: 7 的悬殊比分败给隆华队，使在场的中国观众欢欣鼓舞，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七、向外国队挑战

隆华队成立之初，都是接受外国队的挑战，随着发展壮大，也开始直接向外国队挑战了。二十年代末，正是大连港的繁荣时期，港口停泊有许多外国船只。那时我在日本邮船会社当小职员，听说英国的船上都有足球队，就萌发了

向他们挑战的念头，和同伙商量后，就写了一封足球比赛的邀请信，送到太古洋行所属的英国船上。船员们正好有许多空闲时间，于是就接受了我们隆华队的邀请，并约定好了比赛时间。英国人身躯高大，体力强，头球好，我们最初不适应同他们比赛，有点怯阵，赢的不多，后来积累了经验，适应了，赢的也就多了。隆华队几乎每月都要同外国队进行比赛。大连足球爱好者对能经常看到同外国人的比赛而感兴趣，球迷不断增加。这对我们隆华队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

二十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驻有军队，其中就有一支英国舰队。这支舰队有一支较强的足球队，队员中有不少人参加过英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球王李惠堂率领的东华队也不敢轻视他们。这支舰队每年夏天一般都到大连避暑，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隆华队和他们先后比赛三场：隆华队一九二八年以 0：3 败给他们，一九二九年又以 0：1 失利，但一九三〇年却以 2：2 战平。这对英国人震动很大，英国报纸也刊登了比赛消息，他们将隆华队译成“龙花”（Dragon Flower）队，由此可见当时大连足球盛况之一斑。

八、大连足球联盟

二十年代初期，在大连的日本人，对足球运动是不很热心的。自一九二七年日本冠军队来大连比赛以后，大连的日本人才开始重视了足球运动。他们除在学校开展足球运动以外，还组织了满铁足球队。鉴于大连足球界的混乱状况，他们决定成立大连足球联盟。当时大连只有一个标准的体育场，我们是无权进入这个场内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正门马路两侧的西面是橄榄球场，东面另有一个足球场，我们的一些比赛，都只能在这里进行。场地没有护栏，有时观众跑进场内造成混乱，遇有点球的时候，观众就会把罚球区围个水泄不通，常

常造成比赛中断。若能组织成足球联盟，就有权在体育场内比赛。基于此种基因，中青、隆华两队与满铁几经洽谈之后，同意参加联盟。一九二九年大连足球联盟正式成立，理事会由中青，隆华，满铁代表组成，聘请了电车公司总经理山岗任理事长。足球联盟制定了章程，并规定每年春秋各进行一次单循环联赛。同时决定比赛时出售门票。收入按一定比例分给各队。

九、艰苦的一战

自举办大连足球联赛以来，隆华队多次获得冠军。一九三〇年隆华队在联赛中连连取得胜利。未参加联赛的新华、商华、电车公司、旅顺二中、旅顺工大等队纷纷向隆华队挑战。使我记忆犹新的一仗是对旅顺二中。旅顺二中足球运动开展得较好，拥有众多好手，但二中的“尖子”大多加入隆华和中青两队。这次为了向隆华队挑战，将已加入隆华队的原二中队员全部退回，这些队员在隆华队都是主力，他们一走，隆华队实力大减。但隆华队不甘示弱，接受了挑战。谁知比赛开始时，隆华队又有几名队员因故未到场，无奈我们只好以在场的九人迎战。由于力量悬殊，隆华队只得采取防守战术，只留左锋张文焕一人在中线附近，伺机反攻。一开球，二中就对隆华队展开了强大的攻势，隆华队门前险象环生，但隆华队员采取人盯人战术，不让二中队员起脚射门，因此，二中队员始终无法破门。而隆华队则乘二中队全部压上之机，打了两次漂亮的快速反击，左锋张焕文不负众望，得球后直奔球门，二中队返球不及，被张文焕连续进两球，隆华队全场比赛只有这两次机会，但都破门得分，结果以2：0战胜了二中队。自此以后，再无人敢向隆华队挑战了。这一年可以说是隆华队的顶峰时期，全年二十余场比赛，除与日本关西院队和英国海军队战平外，其余全部获胜。

十、满铁总裁杯

一九三六年大连的足球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球队不断增多，足球联盟

又吸收了工华足球队加入联盟，成员增加到四个队，联赛比以往更加激烈。满铁总裁特为联赛捐赠银杯一座，定名为满铁总裁杯，奖给联赛冠军。足球联盟决定每年两次的联赛改为每年一次，三次夺得总裁杯可永久保存。在本年度联赛中，满铁队（由日本人组成）连连败给中国队，他们为了夺得首届满铁总裁杯，特从日本国内调来许多名将，如参加对奥运会的守门员^文须藤八郎（庆应大学）和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中锋本田长康（早稻田大学）等六、七人，充实了该队。虽然如此，但他们不是隆华队的对手，首届满铁总裁杯赛冠军由隆华队夺得。

一九三七年联赛中，隆华队又夺得满铁总裁杯。在三八年的第三次联赛中，初赛时，隆华队一路顺风，到决赛阶段时，因隆华队大部分主力队员转到伪满国家队，实力大减，战绩不理想，最后决赛阶段，虽然一部分队员归队参战，但因离队时间长，与原有队员配合欠佳，因此败给了工华队，连获三次满铁总裁杯的愿望成了泡影。

工华队是一支以工人为主组成的队伍，拥有史大法，朱秉章，王宝山等名将。作风勇猛顽强，经过数年努力之后，终于第一次获得联赛冠军。

十一、与伪满国家队比赛

一九三五年前后，伪满洲国成立了足球协会，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担任了会长。同时，也组建了伪满国家足球队，准备访问日本。当时隆华队是东北实力最强的球队，伪满国家队为了检验自己的实力，特来大连约战隆华队。伪满队员大部分是大连人，与隆华队也比较熟悉。因此，隆华队对伪满队也很客气，在比赛中，领先后就没再扩大战果，很轻松地就击败了对手。

伪满队回长春后，深感力量不强，为了增加实力，特派日本人友纳来大连找我商议，支援他们几个队员。那时我在海关工作，稍有地位。为了解决一部分队员生活和工作的困难，曾请海关人事科长兴盛长荣先生帮助安排六、七个队员到海关当小职员。但还有一些队员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困难。这次友纳找我，我从队员生活方面考虑，以每人每月工资七十元、任命委任官为条件答应放人。他们同意后，隆华队先后送走了蔡宝珠，王国璋等七、八队员。对于这件事，今天回忆起来，总还是感到内疚。

一九三八年春，我也从大连调到长春工作，离开了隆华足球队。因此，对隆华队以后的情况就不十分了解了。总之，隆华足球队对旅大地区早期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它和其它各队以及足球运动的爱好者，为解放后大连足球能得以继续发展并成为有影响的足球城确有开拓之功的。

（大连市体委文史办供稿、方字略有删节）

一个当铺伙计的见闻

姜樵林

一九三六年五月，为生活所迫，我离开了山东黄县老家，来到大连谋生。当时，大连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从龙口乘船至大连，必须先到日本人设立的大东公司的岗卡办理入境证明，方能上船，在船上还要受大连水上警察和便衣刑事的查问和审讯，稍有差失，就会被当成嫌疑犯而抓进水上警察署的监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因我年纪小，幸未遭遇麻烦，虽经磨难，总算到了大连。

到达大连后，先寄居在西岗尾上町“同成合”杂货店。当时大连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下，工作非常难找，多亏在“同成合”杂货店当二掌柜的亲戚王鸿翔到处为我奔波。三个月后，总算在香炉礁顺记油坊找了个学徒的活，但因油坊尚未开业，故又让我在他的联号“仁义”当铺帮忙，从此我接触了当铺这一行。

根据当铺的规定，王鸿翔还为我找了两个商号的保人作保，并与当铺签订了契约。契约是印制的，上面填有我的名字，盖着当铺章和负责人的私章，还有承保商号和连贷商号的印章。其内容大意是：今保到姜樵林在本号学徒三年，不得中途不干，不得营私舞弊，如有经济损失，由承保商负责赔偿。这纸名为学徒契约，实际上是个三年卖身契约。工资低得可怜，第一年是每月二元（朝鲜银行金票），第二年是三元，第三年四元。如以日计，第一年每天工资只有六分六厘，第二年才长为一角，第三年长为一角三分三厘。每年除三个节日外没有节假日，更谈不上福利待遇了。当时当铺贷款，每当一元钱就获月息八分。像这样早五点开业，晚十一点闭店，一天干十八个小时活，工资还抵不

上老板一元钱所得的月利息。可见这种剥削是多么惊人！

初进当铺，对每个地方都感到陌生和奇怪。进门四壁中间约有十平方米的地方，是营业用的；对着门口有一紧闭的暗门，左连是两米高的栏柜，上边还有铜制的栏杆，中间留有小门，是交收典当物品的地方，栏杆边有踏脚高凳，用来接待顾主，栏柜下放当天典当进来的物品，旁边设有办公帐桌等；室内有保险铁柜，存放贵重物品；另有三间屋是存放典当衣物的仓库，满满的拴着纸飞子。我在这里帮了六个月的忙，看到来典当的人，大部分是些穷苦人和无家可归的工人；也有不少是吸鸦片，扎吗啡的落魄人。有些人在数九隆冬，北风呼啸的寒天，一进门现脱衣服典当……见此情景，不禁使人发自内心感到凄惨，眼圈为之湿润，联想到山东生活之苦，深感大连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农村有地主剥削，城市则是资本家剥削。人世间如此不平，常常使我为之肠断。

不久，顺记油坊开业了，我数次要求不干当铺这一行，都没有得到准许，原因是我干得比较好，东家不放。当时我由山东来时，家里老人再三嘱咐：出外找到工作，一定要好好干，千万别失业流落在外。我正是这样好好干的，不过我很想到油坊去干活。为这事我曾多次找王鸿翔帮忙，但他也很为难，说找职业实在不易哪，都是人托人脸托脸的，找两家铺保已是很不容易，何况油坊那边名额已满，不能让你去了，干什么都一样，你就安下心来在这里干吧，习惯了就好了。就这样，我在“仁义当”干了六年，后来又的金州西街“兴元当”干了三年。

“当铺”是中国人的称呼，日本人叫“质屋业”。开当铺要持一种特许经营执照，没有权势是领不到许可证的。领取许可证时得经警察署保安课和辖区派出所的严格审查，门窗要按铁栏杆，建筑要坚固，防盗防火要合格等，许可以后还要按“质屋业”规定条例到警方领取质物台帐。台帐统一由官方印刷，硬质帐皮，盖有警察署公章，页数编号，每页可记十人号。所记当进的物品必须同当票记载的数量、品名、规格、颜色等规定符合；入当者的姓名、住址、年龄等，都要填写清楚，只要社会上发生刑事盗窃案件时，便衣刑事或警察就会来检查台帐，如有疑窦，就得取出实物接受检查。这样若没有官方势力的靠

山，就会经常受到欺压。即便有势力，每逢年节也还得送礼到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察和巡捕家里，直辖警察署刑事也得送到，不然他们就要经常找茬子，添麻烦。刑事手下有许多联络员（腿子），平时经常上门来“本份子”（即赶人情）。他们口称某爷（对刑事的称呼）家里烧香或办丧事喜事，就借机敛钱。平日盗窃破案，刑事就开着“欧斗败”（即摩托车）来了，听到哒哒响声在门外一停，刑事腿子绑着犯人进门查帐，只要犯人供出某日来当过，找出台帐就标明为赃物，当时不拿走，第二天得写出“始末书”（日文的认罪书），连同赃物一起送到警察署刑事课，赃物就被没收。这在当铺的帐目上叫“损失”。至于请客、送礼、随份子花的钱，在帐上叫“交际费”。记得一九三八年的一天，沙河口警察署特高刑事康炳仁和两个腿子来到“仁义”当铺，气冲冲地用脚踢开门进来，我忙欠身相迎，他那长满横丝肉的面孔和转不过脖子的脑袋，一言不发地坐到椅子上，气哼哼地问掌柜在哪里？我告诉他外出有事。这时他拿出一张当票问我：“这个东西哪里去了？”我一看是一张过期作废的当票，便告诉他已经过期：“出号”了（即东西已被变卖处理了）。他听后不容分说，给我两个耳光，打得我脑子嗡嗡作响。打完后又厉声说道：“东西没有是不行的，明天叫掌柜的到大衙门去一趟！”说完就走了。掌柜回来听说此事心中害怕，托一个名叫孙历堂的去说项，送去金票一百元，才算了事。当铺这样的受欺压、受讹诈、受侮辱，为什么资本家还要争着干呢？这是因为他们干这个买卖着实有利可图。他们在幕后，找代理人经营，廉价雇佣工人为他们卖力，受侮辱受欺压的不是他们自己，“损失”也好，“交际费”也好，比起他们所得的利润来，可说是九牛一毛。我在大连“仁义当”和金州“兴元当”，都是担任记帐（会计）的，每年结算时，清楚地看到，他们出资金五千元，每年可得纯利三千元。香炉礁贫民窟分四个区，经营这行业的就有十户，相隔不远就有一户，一般都开设在巷内僻静地方，胡同口毛坯有“当”安招牌，画

一只手指向胡同里，门旁立一高杆，上有横木挂有斗大的黑底金字的“当”字招牌，下有红布飘带。

“仁义当”东家林华堂是个大烟鬼，同时又是大连八大家之一的福顺义油坊的老板。他与大汉奸张本政还有联系。其余开当铺的如陈宪章、郑安礼、石玉印、朱长荣、朱乐春等人，他们的亲属有的是日本宪兵队翻译，有的是高等刑事，还有当巡捕、当区长的，如果遇着重大事件，有他们露面就可以平息。

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日本人叫战争非常时期，金州龙王庙有大批劳工被抓去建筑陆军医院，金州机械厂也改为军用，大房身造船厂和内外棉（即现在的金纺）都有大批劳工拥入。这时的金州西街有一处大烟馆，西门外有一座妓院，赌博盛行。城内当铺就有三家，除了“兴元当”以外，还有一个东家董廷兰，是西门外屯长。吴润田则是代东家顶名的掌柜。我是由一位姓于的介绍到该号任职的，当时口头协定是，进号吃份子（即不拿资本的干股），说明是五厘，即利润每千元可提五十元。可是在一九四四年末，因要挑我当劳工，便辞职离去。这些东家依仗权势，不给我结算，交涉多次无效，当时劳工挑得很紧，如果触怒他们，他们一句话，就得送我去当劳工，下场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吃亏。

当铺是地道的高利贷行业。当入的物品，有金银首饰、手表、怀表、皮袄、绸缎丝绢等，但大部分是下层穷苦大众的被褥和单、专门从事夹、棉衣等等。当入的价值很低，约为原价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为了促其早日赎回当进新物也要记作旧物。当票是用三十二开一般新闻纸印刷而成，正面上印有商号名，下边印有编号，第二格空白准备记物品名，第三行空白填写金额，第四行空白填写所扣利息金额，第五行印有年月日，背面印有当铺规定，例如规定虫咬鼠伤不负责任；过期（一般限期为四个月）不交利息的，当铺有权变卖等等。交利息栏里还印有规定利率：三元钱以下为月息八分，三元至六元为六分，六元至十元为五分九厘，十元至一百元为四分，百元以上为三分。成交后必须先扣下一个月利息。比如主顾要用两元五角，必须当价两元八角，第月利息应为两角两分四厘，只要有一厘也要升为一分，先扣下一个月利息两角三

分，剩下的只有两元五角七分，一个月内赎回就要交两元八角，可是一天赎回也须交两元八角。如果过月一天去赎，就要交三元零三分；五个月内不赎回，就要按月交利息，过月不交，当铺就有变卖权。当时大连流通的纸币是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币值较高，大部分当入物品，都在三元以下。赌场子上输赢是经常性的，赌徒往往是当天当，当天赎，或两日赎、三天赎等等不一，真正按月赎的极少。这样一来，规定是月厘八分，实则有的是日息八分或是几天息八分。过期变卖叫“出号”，大连露天市场有专门贩卖“出号”衣物的估衣商，他们每月到当铺收购，变卖后的利润，比赎出衣物所付出的利息，还要高得多。

异乡招来的劳工，或被日本侵略当局划分为寄留户的贫苦大众，有了病灾事遇到困难，借贷无门，便只好把衣物送进当铺了。至于少部分吸毒者，唯一的借货方式也是进当铺。他们虽知道当铺利息过高，但因为熬不过烟瘾，也只好自作自受。由此可见，当铺的东家们，都是些重利盘剥劳动人民血汗和大发不义之财的吸血鬼。

（本文作者现在金州区味食品厂工作）

大连历史大事年表（古代）

孙蔚

- 距今约一万年
距今约六千多年
- 采集有两件人工打击的石英岩石片。
长海广鹿岛吴家村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存，是大连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人们已过定居生活，经济以渔猎为主，已有原始农业、纺织等。
- 距今约五千多年
- 小珠山中层文化遗存，出现采购，家畜，经济仍然以渔猎为主
- 距今约四千多年
- 小珠山上层文化遗存，陶器以夹砂黑褐陶和泥质磨光黑陶为主：与山东龙山文化有一定联系。
- 公元前 21 世纪
- 夏朝建立
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双砣子一期文化层出土有红白、黄色绘成几何图案的彩陶。
- 公元前 16 世纪
约三千五百年前
- 商朝建立。
双砣子二期，陶器以轮制居多，间有少量手制，多饰弦、划和乳点纹。与山东岳石文化有一定联系。
- 约三千年前
- 双砣子三期，出土石器均为磨制。旅顺铁山镇于家村遗址上层和于家砣头积石墓地出土有铜器。此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 前 11 世纪
- 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封召公奭之子于燕，其势力已达辽东。
瓦房店市长兴市横山、三堂乡发现几处遗址，

- 出土有肩小石铲等。
- 前 841 年 共和元年
辽东地区属于东夷族文化系统的积石墓、石棺墓中常出土有青铜短剑。
- 前 770 年 周平王元年，东周始。
- 前 679 年 周庄王十二年
齐桓公始霸诸侯。他曾一度伸展势力至辽东。
- 前 475 年 周元王元年
旅顺尹家村、燕将秦开击退东胡，扩地至辽东，从此，大连地区属燕辽东郡南部（一说前 300 年建辽东部）
- 前 284 年 周赧王三十一年
燕昭王时，燕将秦开击退东胡，扩地至辽东，从此，大连地区属燕辽东郡南部（一说前 300 年建辽东郡）
- 前 256 年 周赧王五十九年
新金元台乡后元台出土“启封戈”，为魏安厘王廿一年造。
- 前 241 年 秦王政六年
庄河桂云花乡岭西九炉出土“春平侯剑”，为赵悼襄王四年造。旅顺铁山镇严家村南河发现战国直刃有柄铜剑二件。大连各县区出土了大量货币窖藏，如金县董家沟鹿圈子出土明刀钱；瓦房店市西阳乡谭家村出土布币，以襄平

	(今辽阳)布为最多;新金县徐大屯乡刘西村和北岚村曾出土“一化”圆钱。
前 226 年	秦王政二十一年 秦将王翦破燕,燕王喜迁都辽东襄平。
前 222 年	秦王政二十五年 秦将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复置辽郡,大连属秦。
前 221 年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贲自燕南下攻齐,齐亡。废分封诸侯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前 209 年	秦二世元年
九月	韩广于辽东自立为燕王,领大连地区。
前 206 年	汉王刘邦元年
二月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韩广为辽东王,以臧荼为燕王。
八月	臧荼杀韩广并其地,领大连地区。
前 204 年	汉王刘邦三年 臧荼降汉,大连地区自此属刘邦。
前 202 年	汉高祖五年
九月	汉虏臧荼,封卢绾为燕王,大连属之。
前 195 年	汉高祖十二年
二月	燕王卢绾反,遣樊噲击绾。绾败逃入匈奴,立于建为燕王,统辖大连地区。
前 140 年	汉武帝建元元年 汉武帝时,为开发辽东,从山东、河北移民到大连地区开垦农田。旅顺南山里是通往山东水路的交通要枢,牧羊城是一座重要海防

- 城堡。
- 前 107 年 元封四年
辽东郡设十八县，其中沓氏，汶县辖今大连大部分地区。
- 3年 汉元始三年
北海逢萌为避王莽之祸，渡海来辽东，在沓氏县（今金州区）境内登岸。
旅顺江西乡鲁家村发现一处汉代窑藏，出土有铜提梁壶，铜镜、铜马车县、半两钱等。
- 25年 汉建武元年
东汉将辽东郡所辖十八县并为十一县。沓氏、汶县仍被保留。
- 109年 永初四年
张伯路起义，攻滨海九郡。到 111 年，败走长山岛，被杀。
- 121年 建光元年
高句丽攻辽东。同年复与鲜卑、~~浞~~貊攻辽东，太守蔡讽战死。
- 126年 永建元年
辽东太守庞参改任度辽将军。
- 146年 本初元年
高句丽复犯辽东西安平（今九连城一带，辖庄河）。

187年	中平四年 渔阳张纯、张举起兵反，杀辽东太守杨终，自称天子。
188年	中平五年 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190年	初平元年 辽东太守公孙度东西扩地，分辽东郡为辽西、辽东三郡，各置太守。经沓诸（旅顺）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
191年	初平二年 董卓之乱时，北海朱虚人管宁与同县邴原及平原王烈等，到辽东，公东度设馆以侯，厚遇之。
204年	建安九年 邴原欲归乡里，止于三山（今大连青泥洼，一说三山岛）后返还。
205年	汉建安十年 公孙康自称平州牧。大连属平州辽东郡沓氏县和汶县。
220年 十年 冬	魏黄初元年 曹丕代汉称帝，东汉亡。 魏臣 弘奉命出使辽东，公孙康遂称臣附于魏。
232年 三月	魏太和六年 孙权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军于沓渚（旅

- 顺) 登陆。
- 十月 公孙渊遣使称藩于吴，从此，沓渚便成了公孙氏政权与孙吴海上联络的重要港口。
- 233年 魏太和七年
- 三月 孙权遣张弥、许晏将兵万人在旅顺登岸，到襄平(辽阳)册封渊为燕王。
- 十二月 公孙渊斩张弥、许晏，函首献于魏。魏假授渊大司马、乐浪公。
- 237年 魏景初元年
- 七月 魏遣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兵屯辽东南界，征公孙渊入朝。渊迎战，俭不利而还。渊复自立为燕王。
- 238年 魏景初二年
- 八月 司马懿率军围公孙渊于襄平，大破之。大连居民为避战祸，多由旅顺逃回山东。废平州，还合为幽州，大连地区为幽州辽东郡辖地。
- 239年 魏景初三年
- 六月 辽东郡东沓县(沓氏县改)吏民自旅顺渡海居山东齐郡界，次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迁民。
- 240年 魏正始元年
- 二月 辽东郡汶县、北丰县(原为丰城，今瓦房店)，自旅顺渡海，居山东之西安、临、昌国县界

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

265年 晋泰始元年
十二月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大连地区为晋地。

274年 泰始十年

277年 咸宁三年
大连地区隶平州辽东国汶县、北丰县。

285年 太康六年
慕容删为其部下所杀，鲜卑国人迎慕容魔而立之，大连地区归其管辖。

292年 元康二年
辽东地震，涉及大连地区。

307年 永嘉元年
慕容魔讨鲜卑大单于，据辽东。

309年 永嘉三年
改辽东东国为辽东郡。

311年 永嘉五年
慕容魔讨鲜卑别部降之，复立辽东郡。晋封魔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

317年 晋建武元年
司马愨在建康即晋王位，是为东晋之始。翌年，愨称帝。慕容 受封称臣。

321年 大兴四年
十二月 授慕容魔都督平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工郡公。

333年 咸和八年
慕容魔卒，子**皝**继位。**皝**弟仁叛据平郭（熊岳城）

- 334年 咸和九年
三月 慕容仁尽得辽东地，自称平州刺史、辽东公，大连地区归仁管辖。
八月 晋遣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慕容 为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船下马石津（旅顺），北上途中被慕容仁扣留。
十一月 慕容 攻慕容仁，取襄平，分迁辽东大姓至棘城。置武次县（凤凰城），辖今庄河。
- 337年 咸康三年 前燕元年
十月 慕容 自立为燕王，史称前燕。大连属前燕地。
- 341年 咸康七年 前燕五年
十月 燕王 命慕容恪镇守平郭，辖大连地区。
- 352年 晋永和八年 前燕元玺元年
十一月 慕容俊称皇帝，国号燕。
大连地区属前燕。
- 370年 晋太元五年 前秦建元十六年
十一月 前秦复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
- 384年 晋太元九年 后燕元年
前秦乱，慕容垂称燕王，史称后燕。
- 385年 晋太元十年 后燕二年
二月 后燕得平州，至是辽东地复入燕。

六月	高句丽侵辽东，慕容垂派慕容佐救之，败，辽东遂陷。
十一月	后燕慕容农伐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燕迁平州刺史慕容佐镇平郭，以龙渊为辽东太守。
386年	晋太元十一年 后燕建兴元年
正月	后燕主慕容垂称帝，改元。
400年	晋隆安四年 后燕长乐二年
二月	慕容盛统兵三万击高句丽，拔新城，南苏二内城，开境七百里，徙五千余户而还。
404年	晋元兴三年 后燕光始四年
十二月	高句丽侵燕，占辽东郡，大连地区从此陷入高句丽统治。
405年	晋义熙元年 后燕光始五年
正月	后燕王慕容熙伐高句丽，攻辽东城，不克而还。
407年	晋义熙三年 后燕光始五年
七月	将军冯跋等拥高云（慕容云）为主，杀慕容熙，改元正始，史称北燕。
408年	晋义熙五年 北燕太平元年
九月	离班等杀高元，冯跋杀离班等，自立为天孤王，仍称燕，改元太平
420年	宋永初元年
六月	刘裕代晋，是为宋武帝。大连地区仍在高句丽统治之下。
436年	宋元嘉十三年
	魏大举攻北燕，冯弘奔高句丽，居于平郭，寻

- 迁北丰。
- 437年 宋元嘉十五年
三月 北燕主冯弘为高句丽所杀，北燕亡。
- 519年 梁天监十八年
高丽文咨王死，子兴安为辽东郡公高句丽王，
大连为其辖地。
- 581年 隋开皇元年
二月 北周相国杨坚受周禅，建立隋朝，改元开皇，
北周亡。
- 598年 开皇十八年
命汉王谅等率三十万人攻高丽，大败而归。
- 612年 大业八年
炀帝亲率水陆大军征高丽，凡一百一十三万
余人，水军由东莱（山东掖县）出发，大
连、旅顺、长山列岛为隋军进攻路线之一。
隋军损失甚重而还。
- 613年 大业九年
炀帝渡辽水再击高丽，攻辽东城不克。
- 614年 大业十年
隋将来护儿由登莱渡海于旅顺登陆，攻卑沙
城（金县大黑山）破高丽军。斩首千余级。
另一路水军途径长山列岛的广鹿岛直逼平
壤。高丽王请降，乃罢兵。
- 618年 唐武德元年

五年	李渊追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废郡设州，以太守为刺史。
624年	武德七年
二月	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
643年	贞观十七年
闰六月	高丽王建武弟子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
644年	贞观十八年
七月	命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州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
645年	贞观十九年
五月	张亮率水师自山东东莱（掖县）渡海袭卑沙城（大和尚山），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大度先登，克卑沙城，高丽军大败，获男女八千口。帝亲率铁骑与李世勣会师围攻克辽东城。从此，高丽军退出大连地区。
648年	贞观二十二年
	诏陕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今大连）、乌胡岛。
668年	唐总章元年
九月	李世勣破高丽，拔平壤城，境内尽降。
十二月	以辽东故地为州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薛仁贵为都护，统兵二万镇之。大连地区隶安东都护府。
676年	唐上元三年 仪凤元年
二月	迁安东都护府到辽东故城（辽阳）
677年	仪凤二年
	高宗授高臧孙宝元为都督、朝鲜郡王，还辽

- 东以安余。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抚顺市北）。
- 698年 周武则天圣历元年
六月三十日 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封高臧孙宝元为都督、朝鲜郡王，不行。明年以德武为都督。
- 705年 唐神龙元年
六月三十日 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封高臧孙宝元为都督、朝鲜郡王，不行。明年以德武为都督。
- 705年 唐神龙元年
二月四日 复以安东都督为安东都护府。
- 713年 开元元年
遣郎将崔忻（从旅顺登陆）册拜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震国从此称渤海。
- 714年 唐开元二年
宣劳渤海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凿井两口子马石山（旅顺老铁山）下，碑文：“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 719年 开元七年
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
- 725年 开元十三年

	封契丹李吐干为辽阳郡王。
761年	上元二年 废安东都护府，平卢节度使引兵保青州，遂废淄沂节度，号淄青平卢节度。
909年	后梁开平三年 辽太祖三年
正月	契丹耶律阿保机攻占辽东。
916年	后梁贞明二年 辽神册元年
二月	契丹耶律阿保机称皇帝，是为太祖，辽东之地尽入辽。
919年	后梁贞明五年 辽神册四年
二月	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大连地区隶东平郡。
春	移置女真部人于辽阳南、名曰“曷苏馆”。
926年	后唐同光四年 辽天显元年
正月	契丹军抵忽汗城（黑龙江宁安），来渤海。
二月	改渤海国为东丹，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建元甘露。
928年	后唐天成三年 辽天显三年
十二月	迁东丹于东平，升东平郡为南京，大连地区隶南京。
930年	后唐天成五年 辽天显三年
	辽在大连地区设苏州（金县）、复州（治复州城）。苏州领来苏、怀化三县；复州领来苏、怀化二县；复州领永宁、德胜二县。
938年	后晋天福三年 辽会同元年
十一月	改南京（辽阳）为东京，置辽阳府，大连

- 地区隶辽阳府。
- 952年 后周广顺二年 辽应历二年
十一月 辽东地震，波及大连地区。
- 960年 宋建隆元年
赵匡胤建立宋朝，朝汴梁（今开封）。
- 991年 宋淳化二年 辽统和九年
辽设“哈斯罕关”（即由木栅筑起的关寨）于金州湾至大连湾之间的金州地峡，即今南关岭一带。
- 1051年 宋皇 三年 辽重熙二十年
六月 辽俘虏大批西复军民，将其中一部分迁徙到苏州（金县）。
- 1054年 宋皇 六年 辽重熙二十三年
十二月 遣复州刺史耶律新赴平壤贺高丽国王生辰
- 1055年 宋至和二年 辽重熙二十四年
七月 高丽致书东京留守，请以鸭绿江为国界
- 1058年 宋嘉 三年 辽清宁四年
春 为萧太后死，遣复州怀德军节度使萧满延赴宋都汴梁（开封）告哀。
- 1115年 宋政和五年 金收国元年
正月 遣复州节度萧湜曷等击女真，败还。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金。
- 1116年 宋政和六年 金收国二年
正月 辽将渤海人高永昌举兵据辽阳，杀留守萧

	保先，自称大渤海国皇帝。
四月	金陷辽沈州、东京，高永昌败走复州，在长松岛被俘。
1117年	宋政和七年 金天辅元年 苏州（金州）、复州和婆速路居民反金，金派卯阿里率军镇压。经过王家岛（长海县）一战，金获胜。 苏州、复州编民百余户渡海至山东登州岸避乱。
1118年	宋政和八年 金天辅二年 女真破东京、苏州、复州等五十余城，大连地区从此属金。
1125年	宋宣和七年 金天会三年 金灭辽
1126年	宋靖康二年 建炎元年 金灭北宋。赵构即位，南宋始。
1140年	宋绍兴十年 金天眷三年
十二年	辽东地震。
1143年	宋绍兴十三年 金皇统三年 金并来苏、怀化二县为化成县（金州），隶东京路复州。
1174年	宋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八月	中京副留守王寂游辽东觉华岛。
1177年	宋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四月	复州、曷速馆富家余粟以振东京三路。
1182年	宋淳熙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九月	以同知东京留守完颜裔埒授复州刺史。

- 1190年 宋绍熙元年 金明昌元年
东京路辽阳府有户 40604，其中复州，化成有户 13950。
- 正月 始置府试场于辽阳。
- 1191年 宋绍熙二年 金明昌二年
三月 辽东提刑使王寂视宽辽南，行复州道中。
丙子自永康（复县）次顺化营（普兰店），丁巳次新市（庄河）。
- 1193年 宋绍熙四年 金明昌四年
盖州、秀^产县本大宁镇。罢“曷苏馆”（统辖猛安户女真），建辰州（盖县）辽海军节度使。
- 1212年 宋嘉定五年 金崇庆元年 蒙古成吉思汗七年
十二月 蒙古攻占金的东京（辽阳）。
- 1215年 宋嘉定八年 金贞 三年
十月 辽东蒲鲜万奴据东京，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建元天泰。
- 1216年 宋嘉定九年 金贞 四年
五月 化成县升为金州，金州名称始此。
- 1217年 宋嘉定十一年 金兴定二年
金州升为金州防御，镇一：归胜。
- 八月 蒙古拔金州、复州，斩金、盖州守将完颜

众家奴。

1233年 宋绍定六年 金天兴二年 蒙古窝阔台汗五年

九月 蒙古灭东真国，擒蒲鲜万奴，辽东之地平定。

1234年 宋端平元年 金天兴三年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金亡，大连地归蒙古。

1271年 宋咸淳七年 元至元八年

十一月 蒙古建国号曰大元。都大都（今北京）。

1281年 至元十八年

有户 13, 200, 000、口 58, 830, 000。

辽阳行省辽阳路有户 3708，口 13, 231。

张成从征日本志贺岛，以功授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1293 年招领所统军并为金复州新附军，当时信今新金大谭镇双山屯等地）。

1284年 至元二十一年

五月 发新附军 1281 户于忻都察，置立屯田。（忻都察即金复州万户府，府治金州城），立屯 3, 600 户，田 2, 500 顷。又拨新附军 1800，屯田于金州哈思罕关（今金州南关岭）东荒地。

1287年 至元二十四年

十月 置辽阳等处行省，治辽阳路。金复州万户府来辽阳行省。

1293年 至元三十年

- 1294年 以玉龙帜木儿、塔失海牙两万新附军并入金、复州，立屯耕作，为户3641，为田2523顷。
至元三十一年
金、复二州虫害庄稼。
张成卒，年69岁（《元张百户墓碑》为其重孙所立，后人移碑至金州城北门外岱寺之菜地内，解放前被岩间德也发现，著有《元张百户墓碑考》一文。碑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 1295年 元贞二年
三月 赐辽阳行省粮三万石。
八月 金、复州降霜受灾。
- 1296年 大德元年
金、复州水旱。
- 1297年 大德二年
救济金、复州屯田军粮二个月。
- 1301年 大德五年
辽德、开源、盖州路（包括金、复州）地震。
- 1308年 至大元年
秃坚不花为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达鲁花赤
- 1315年 延祐二年

五月	立海面、辽东鹰坊万户府，隶中政院。
1326年	泰定二年
十一月	金、复州水灾、民饥；救济钞五万锭。
1351年	至正十一年
	红巾军大起义，刘福通部将陈 自登州渡海攻陷金州，后返回山东。
1359年	至正十九年
	红巾军三路北伐，中路军在关先生，破头潘、董太岁、沙刘儿率领下转战辽东，先后攻占金、复、海、盖四州。
1368年	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
正月	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建都南京。大连地区仍在控制下。
八月	元辽阳行省丞相纳哈出，拥有重兵占据辽阳。
1369年	洪武二年
四月	洪武帝派使者下书，劝降纳哈出归明。
1370年	洪武三年
九月	诏渝辽阳等处官民。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闻之，集兵老鸦山，而平章刘益亦集兵屯盖州之得利羸城，二兵相为声援，以保金、复等州。
是年	建定辽都卫指挥使司。
1371年	洪武四年
二月	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明置辽东卫于得利羸城（今瓦房店市得利寺

- 五月 镇)。以刘益为指挥同知。
故元平章洪保保，马彦 谋杀刘益于得利羸城。其部下前元侍郎房暉、右杀之。洪保保投靠纳哈出。
- 六月 吴立驻防金州。房暉、张良佐率众迎吴立掌管辽东卫事。明诏以房、张二将为辽东卫指挥僉事。
- 七月 明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王德为僉事，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防守边疆。
马云等由山东登莱渡海，驻兵金州，招降元参政叶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率十万大军进军辽东，修金州城、旅顺口北城，完城缮兵，一方遂安。
- 1372年 洪武五年
正月 命靖海侯吴祯率舟师由山东运粮辽东从旅顺口登陆，以给军饷。
- 六月 置辽东金、复、盖三州。
- 十二月 以吴祯为定辽都卫指挥使。
- 1373年 洪武六年
辽东金州、复州旱，诏免去年夏秋税粮。

六月

1374年

正月

定辽都卫请设辽阳府县治，从之。

洪武七年

定辽都卫奏并卫所。官军以左千户青州土军五千六百人属定辽左卫。以右千户所莱州土军五千人并本卫军七百九十四人属定辽右卫。余军分为八千户，内调千户。余机领中后二年往金州守御，俱隶都卫。

设辽东镇守总兵。

1375年

四月

洪武八年

置金州卫指挥使司，隶定辽都卫。命袁州卫指挥同知韦福，赣州卫指挥佾事王胜领兵屯守金州卫。

十月

定辽都卫改名辽东都指挥使司，改辽东卫为定辽后卫（设今得利寺），俱隶大都督府。

十二月

前元纳哈出越盖州城，奔金州，当时金州城垣未完，指挥韦福、王胜督厉士卒分守诸城门，选精兵守城。纳哈出裨将乃刺吾率数骑至金州城下挑战，城上发箭击伤闷绝，韦福乘胜出击，纳哈出引兵退走，叶旺设伏于青石山大败其众，纳哈出夜逃，仅以身免。

1376年

正月

洪武九年

以在金州、庄河青石山纳哈出之功，升马云、叶旺为都督佾事。

- 1376年
五月
定辽后卫自得利寺迁辽阳城北。
洪武十年
命靖海侯吴祜督浙江诸卫舟师运粮给辽东军士，在旅顺口登陆。
金州卫指挥韦福将金州土城包砖，方六里，高三丈三尺，门四：东春和，西宁海，南承恩，北永安。
- 1377年
二月
洪武十一年
调湖广都指挥使潘敬为辽东都指挥使。
- 1379年
正月
洪武十二年
辽东都司遣使赴高丽，索被虏辽阳官司民男妇千余人（洪武三年十一月虏）
- 1380年
正月
洪武十三年
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辽东都司隶属左军都督府。
- 1381年
三月
洪武十四年
置辽东税课司，隶辽东都司。
- 九月
置复州卫指挥使司于复州城，领四千户所。
- 1382年
洪武十五年
复州卫城，因旧修筑。
- 1383年
七月
洪武十六年
升武德卫指挥使梅义辽东指挥使。
- 1384年
洪武十七年

闰十月	置辽东都司儒学，设学授一员，训导四员。金，复，海，盖设儒学学正各一员，训导各四员。各州皆立孔子庙。
1387年	洪武二十年
七月	命左军都督府自山海关至辽东（辽阳）设马驿十四站。每站给官马三十匹，以赎罪犯为驿夫，每站百二十人，并令田其旁近地以自给。调金州卫中左所于旅顺。
1388年	洪武二十一年
二月	诏自山海关至辽东置马驿。
三月	镇守辽东后军都督金事叶旺卒。旺在辽东十七年，抚辑军民，功绩甚著。
七月	增置山海关至辽东松亭关、大宁凡十七驿。
八月	诏指挥何浩等统金、复、盖三卫军马往河西十三山屯种守御。
1393年	洪武二十六年
二月	辽东军士马名广上言：辽东二十一卫，定辽等七卫已有都司儒学，金复海盖四州已有州学，宜建学立师。上命礼部行为。
十月	朝鲜国海寇百余人入金州、新市（庄河）劫掠。倭寇犯金州。
1395年	洪武二十八年

- 四月
废辽东金、复、海、盖四州，专行卫制。改四州儒学为卫儒学，各设教授一员，训导各四员。
- 1396年
十月
倭寇犯金州
洪武二十九年
改置天下按察分司四十一道，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卫隶辽海东宁道。治东宁。
- 1403年
七月
七月
永乐元年
修辽东铁岭、复州二卫城墙。
辽东都司报告报告金州卫受蝗虫灾，命户部遣人弛往捕之。
在旅顺设都司官司备御
- 1406年
永乐四年
复州卫指挥蔡真以砖瓦砌复州城，方四里三百步，高二丈五尺。门三：东通明，南迎恩，北镇海。
- 1407年
九月
永乐五年
置辽东苑马寺于辽阳。永宁监（复州）属之。
- 1408年
八月
永乐六年
增设辽东苑寺属监。以复州、龙潭、滦河、清河四苑隶永宁监。监设监正一人、名苑设圉长一人。

1412年	<p>永乐十年</p> <p>金州卫指挥徐刚，将旅顺北城砌砖，城周围一里一百八十步。城门二：南靖海北威武。旅顺南城，徐刚包筑，周围一里三百步，门二：南通津、北仁和。</p>
<p>1414年</p> <p>二月</p> <p>九月</p>	<p>永乐十二年</p> <p>命镇守辽东都督刘江为前锋率军北征。</p> <p>命刘江为总兵官镇守辽东，节制辽东都司飞行员卫军马。金州卫指挥钱真、徐刚属之。</p>
<p>1415年</p> <p>五月</p>	<p>永乐十三年</p> <p>命辽东都司筑沿边烟墩，务令高厚，积粮草可足五月之用，仍置药弩于上，以严守备，遣都指挥同知胡俊前去督办。大连地区烽火台以新金赞子河乡新台子“永安台”保存最为完整。</p>
七月	金州卫蚕伤稼禾。
1416年	<p>永乐十四年</p> <p>辽东驿站旅顺至辽阳线，在大连地区设有旅顺、木场、金州、石河、栾古关、复州，五十里寨驿。每驿置驿递百户一人，负责飞报军务，运输物资等。</p> <p>在大连地区设归服堡（新金城子</p>

- 1418年
八月
- 坦)、黄骨岛堡(庄河)、望海
蜗堡(金州亮甲店赵王屯)、红
嘴堡(皮口镇西城)等处设九十
五座墩架、了望哨(台),防倭
寇哨兵1,646名。
- 永乐十六年
辽东总兵官刘江巡视金州卫望海蜗
堡,(凡有寇至必先过此,实为
滨海咽喉之地)以石垒堡筑城,
置烟墩瞭望。
- 1419年
六月十五日
- 永乐十七年
辽东总兵官刘江大破倭寇于金州望
海蜗。俘倭百三十人,斩首千余
级。封刘江为广宁伯。自是倭寇
不敢复犯辽东,倭患中衰。
- 1420年
四月
- 永乐十八年
广宁伯刘荣(初冒父名刘江,受
封始复其初名)卒,封广宁侯,
谥忠武。当地居民修祠立碑于望
海蜗附近的金顶山上以为纪念。
- 五月
1428年
- 命左都督朱荣为辽东总兵官。
宣德三年
辽东苑马寺卿方圆在任。
- 正月
命辽东都指挥使康旺前去奴儿干建

	都司。
1436年 五年	<p>正统元年</p> <p>起复山东按察司副使王宪，分巡辽东，置辽海东宁道按察分司，金州卫、复州卫属之。鲁勋为金州卫都指挥僉事。</p>
1437年	<p>正统二年</p> <p>左壤为金州卫指挥同知，</p>
1438年 十月	<p>正统三年</p> <p>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谓“禁辽东军士带家属潜入登州府运船及旅顺口等渡船越海逃回原籍”。</p>
1440年 五月	<p>正统五年</p> <p>石河驿改隶金州卫前千户所（石河驿）原隶复州卫，因道远故改</p>
1440年 八月	<p>正统六年</p> <p>升辽东都司经历黄琰为辽东苑马寺少卿。</p>
1443年	<p>正统八年</p> <p>金州卫占金辽东人口总数 16.9%，占耕地总数的 21.2%（60 余万亩）大连地区在明代已发展成为辽东最繁荣的区域之一。</p>
1444年 十月	<p>正统九年</p> <p>命辽东金州、海州二卫春秋择日祀天妃庙，命守备官行事。</p>
1446年	<p>正统十一年</p>

- 五月 设辽东苑马寺永宁监复州、龙潭二苑。
- 置圉长各一人。复州一百八十二顷三十一亩；龙潭苑二百七十顷。
- 1451年 景泰二年
二月 修辽东永宁监城堡（今瓦房店市辖地）
- 1454年 景泰五年
正月 革辽东苑马寺复州、龙潭二苑。
- 1457年 天顺元年
张项为金州卫指挥。
- 1466年 成化二年
十一月 罢辽东按察使司分巡司（罢山东官分巡辽东）。
- 十二月 添筑金州、建州，小盐池等地墩台。
- 1476年 成化十二年
九月 辽东地震波及大连地区
- 1479年 成化十五年
二月 金州卫、复州卫遭水灾，减免租税。
- 1482年 成化十八年
正月 免复州、金州等二十五卫去年屯田子粒九万一千一百石。

1488年	弘治元年
正月	复州、金州、海州三卫地震。
1493年	弘治六年
	金州地震
1501年	弘治十四年
十一年	金州卫大雪，压军民房屋，塞道路，冻死人畜甚多。
1502年	弘治十六年
七月	复修辽东复州苑马寺。
1506年	正德元年
三月	登州卫海船十八只，运登、莱、青三府布、花钞锭，于旅顺口等陆，往辽东驻军。
1507年	正德三年
六月	据永乐十七年统计，辽东金、复、海、盖等二十五卫，原额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二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奉敕会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今军八万有余，皆靠供给，下户部覆奏，乞将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1512年	正德七年
五月	复设辽东永宁监录事。
1514年	正德九年
	管升为金州卫指挥。

1518年 七月二十日	正德十三年 迁辽东苑马寺于辽阳。
1520年	正德十五年 李钺、俞俊为金州卫备御指挥同知；贾崔、徐经为州卫指挥；张演为金州卫千户。
1523年 八月	嘉靖二年 金州、复州大暴雨。赈恤。
1524年	嘉靖三年 马士廉为金州卫都指挥僉事，福廷锡为金州卫掌印指挥同知，张政为金州卫军政指挥使，杨深为金州卫经历。
1525年 七月二日	嘉靖四年 辽东金、复等州地临海岛，流移逃捕潜藏日久，恐结夷为患，宜令镇巡等官招抚为籍。
1526年 十月四日	嘉靖五年 因地震灾伤减免金州、复州军卫所租粮。
1631年 十月	嘉靖十年 辽东应试生儒旧起赴山东布政司，嘉靖初生员徐潮等屡请就近，礼部同意甲午（1534年）科始

	改应试顺天府。
1532年	嘉靖十一年
十二月七日	以旱灾免金州、复州等二十五所屯粮各有差。
1535年	嘉靖十四年
八月八日	命南京后军都督马永充总兵总，镇守辽东。刘淮因辽东兵变被罢免。
1536年	嘉靖十五年
十月十八日	以灾伤减免辽东金州等卫屯粮有差。
1540年	嘉靖十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	添设辽东金复海盖等处兵务，由山东按察司佥事兼任。
十月	辽东苑马寺卿王世爵在任。
1541年	嘉靖二十年
五月二十九日	以辽东饥，命发太仓库银五万两救济。
1543年	嘉靖二十二年
九月	移辽东金州兵备于开原。
1548年	嘉靖二十七年
十二月	辽东苑马寺卿由复州移驻金州城。寺卿兼管金复海盖四州兵备及海运、边防。金州成为辽南军政中心。
1552年	嘉靖三十一年
正月十三日	辽东苑马寺卿张思移驻本苑（距辽阳三百里），兼辖金复盖三卫

- 是年
军民。
金州卫居民达六万人，成为辽东重镇。
- 1556年
嘉靖三十五年
刘登任金州卫守备。
- 1557年
嘉靖三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以水灾减免复州、金州等卫所税粮。
- 1558年
嘉靖三十七年
三月十日
辽东大饥，人相食。诏发太仓库银五万两，补给三十六年以后军饷。
- 六月三日
山东辽东旧为一省，近来金州、登莱南北两岸间，渔贩往来，动以千计，官吏不能止，总督蓟辽侍郎王忬奏：明开海禁，使山东之米运往辽东，可以救荒。
- 六月二十九日
更命辽东苑马寺卿驻扎金州，给放各岛商船不得抽税，从都御史王忬疏也。
- 1561年
嘉庆四十年
都御史王之浩，把金州城添设角台四。
- 1562年
嘉庆四十一年
十一月四日
督视辽东军情侍郎葛缙条陈：“请开山东登州至金州商民贩易之禁，但不得私通夹带违禁货物。”
- 1563年
嘉庆四十二年
四月十一日
发太仓银六千两，赈济金、复、盖三卫之

	民。
五月十五日	薊辽总督杨选奏：辽东苑马寺卿政事甚简，而金、复、盖三卫南濒大海，为丑虏垂涎之地，宜令苑马寺卿兼佥事衔，带理兵备事，官不加设，而事可兼济甚便。
五月八日	先是四十一年十二月，虏拥众犯辽东金州等处，大掠七百余里，杀掳近二万人。总兵吴瑛畏虏不敢出击，被撤职。
是年	巡抚王之浩，添设复州城门禁，敌台三，门外护门台各一。
1565 年	嘉靖四十四年
五月	兵部右侍郎王之浩条陈辽东驿传事宜，金、复、海、盖等卫军夫应协助高平、杏山等极冲驿递。从之。
十二月	改定辽右卫于凤凰城堡，添设左右中所，以金州卫所辖黄骨岛（庄河）堡割隶右卫。
1568 年	隆庆二年
十一月	辽东巡抚魏学曾奏：金、复、盖三卫，各清出屯田共二千余顷，粮五万石有余。
1571 年	隆庆五年
九月	户部给事中宋良佐等奏请，令辽镇重禁金州等处人，不得渡海居山东。从之。
1574 年	万历二年
二月	辽东苑马寺卿刘世昌兼管金复海盖兵备道。
1577 年	万历五年
四月	金复海盖兵备道为张崇伦。
1579 年	万历七年

八月	金复海盖兵备道为吴道明
1582年	万历十年 金复海盖兵备道为洪济远。
1584年	万历十二年
正月	金复海盖兵备道为曹子朝。
1585年	万历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金复海盖兵备道为郝杰。
1586年	万历十四年
九月	修养正任复州参将（二十年调宽甸）
九月	兵部题，辽东一镇，三面滨夷，苦于防守，而兵寡，在南卫设兵防守在金州营堡，支粮赏头目七十名外，支丰粮丰赏军士一千六百四十五名。
1588年	万历十六年 金州地震
1589年	万历十七年
八月	升山西副使郭性之为山东右参政，管辽东苑马寺事兼金复海盖兵备。
1591年	万历十九年
十一月	杨绍勋为镇守辽东总兵官。

1595年 二月	万历二十三年 山东右布政张思管辽东苑马寺马政，兼金复海盖兵备。
1596年 九月	万历二十四年 岫岩设一备御，增五百士兵，九连故址新筑一城，名曰镇江，以为备。
1597年 五月	万历二十五年 张中鸿管辽东苑马寺兼金复海盖兵备。 户部言：行山东发三万金，购米至登、莱口，淮船运至旅顺，辽船运至朝鲜。
1598年 二月	万历二十六年 兵部言：登、莱、旅顺乃津门外户，自旅顺至登、莱皆其重要防地。生物电州地属辽镇，有原设参将，协同金州守备，及新设镇江（九连城）游击，联络声援，以固旅顺陆地之防。
1599年 五月	万历二十七年 太监以开矿店税来金州卫，苛虐征敛，市民缚之，不给饮食，饥渴而死。
九月	罢孙守廉镇守辽东总兵官，马林继任。

- 十一月
徐准为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因在辽东开垦屯田有功，升徐准为山东按察史，照旧管理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
- 1601年
二月
万历二十九年
罢辽东总兵官马林，以李成梁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
- 1602年
十二月
万历三十年
辽东巡抚赵楫言：金复海盖乃全辽腹心，金、复尤为海防要地，复州营现有马兵一千，步兵一千，金州营有马兵六百七十、步兵七百五十，黄骨岛、旅顺二所海口，各原设兵百余，难以防御。又查，山东登州游击一员统领水兵一千余名，驻扎旅顺。添千总一员驻扎黄骨岛，统兵四百名。
- 1605年
万历三十三年
海盖道杨位在任（三十七年退）。
- 1606年
万历三十四年
韩宗功次辽东副总管复州参

	十一月	将。 裁旅顺游击，改设防守备员一员，汰官兵六百二十员，饷三千七百六十两，择兵五百人仍守旅顺，属辽东抚按道臣节制。山东兵船哨至隍城岛，旅顺之兵距四百里，亦常哨探。
1609年		万历三十七年 辽东地震波及大连地区。
1610年		万历三十八年 戚家堡游击胡国臣升复州参将。
1616年	九月	万历四十四年 加升海盖金复道靳于中为山西左布政史。
	1618年	万历四十六年 沈大坊任复州参将。
	1619年	万历四十七年 努尔哈赤冲破明辽东防线。
	十月	薛国用任辽东金复道兵备参政。
	1620年	万历四十八年
	六月	胡嘉栋任金复道。
	七月	柴国柱为镇守辽东总兵官。
	八月	以新设金复道，海运督饷佥事胡嘉栋改驻镇江（九连

	城)。金州设道臣驻辖，调辽阳水兵二千七百及浙、直兵共万人，驻近岛防守、金复道之添设为防建州人侵南卫，夺明海运。福将任金州守备。
1621年	天启元年
五月	毛文龙（参将）距海岛牵制后金。
六月	胡嘉任金复道，自镇江移金州城。
七月二十日	镇江中军陈良策，与民私通于大明岛中将毛文龙，捉城守游击佟养真，叛投毛文龙。其汤站、险山二堡民，亦执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以叛。帝命大王，三王领兵二千，移金州民于复州。
八月	游击毛文龙复镇江，并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时时袭后金有获。
1622年	天启二年 后金天命七年
五月	授毛文龙总兵。 张盘任金州都司守旅顺，程鸿

1623 年 七月	鸣为金州守备，陈大韶为旅顺守备。后金攻占金、复二州。
七月三日	天启三年后 金天命八年 后金发兵三万围复州，执复州总兵刘爰塔，屠复州，空其城，并驱永宁人民北去。
十月	麻羊岛守备张盘因哨探金州城内有建州兵五六百，于二日统领该部岛兵并带壮兵三十余队，黑夜上岸，于初三夜三更时分，齐至金州南门城下呐喊放炮，建州兵从北门逃出，天明进城，安抚居民。
十月	守备张盘侦复州满丁，以兵夜半入复州，遂克永宁堡，因城空粮尽，退屯旅顺三山海口。
1625 年 二月	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 兵部疏：金州游击张盘以孤军据其地，退保旅顺。拟挑断南关岭以南地，引海水以阻敌南下。因挑沟之费无所出，未行。张盘驻旅顺、朱国昌驻长行岛、曾有功驻三山岛，皆毛文龙所布。曾有

- 功不奉毛命，擅约张盘、朱国昌至南关岭破土兴工。及二将至，而有功违约不来，即有建人骑兵包围我师，张力战被虏，朱骂贼阵亡。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口，葺城驻兵，乃于正十四日，命三王领兵六千克之，尽杀其兵，而回。
- 三月 加都司张攀游击将军衔，令守旅顺。
- 三月四日 后金迁都沈阳，后名盛京。
- 1626年 天启六年 后金天命十一年
- 三月 命袁崇焕巡抚辽东、山海关等处。
- 八月 金帝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嗣，九月即位。
- 1629年 崇祯二年
- 三月 袁崇焕奏设东江饷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船入海。毛文龙累奏其不便，崇焕不听，又请自往旅顺议之。
- 六月 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督都

1630年	毛文龙于旅顺双岛。
正月	崇祯三年
六月	以宋伟为镇守辽东总兵官。
	任辽元化为登莱巡抚，黄龙为皮岛总兵官，领旅顺。
1631年	崇祯四年
十月	升黄龙为都督佥事，镇守东江。
1633年	崇祯六年
四月	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由盖州降于后金，
七月七日	孔有德等引清兵袭旅顺，总兵官黄龙自杀。惟鸾及诸将项祚临、张大禄、尚可义俱战死。
	沈世魁继任总兵官（十年移师皮岛，在石城岛战役阵亡）。
1634年	崇祯七年
二月	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金
1635年	崇祯八年
二月	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
	张时杰为镇守辽东总兵官。
1636年	崇祯九年 清崇德元年
四月	后金改国中与大清，改元崇德。
1637年	崇祯十年 清崇德二年

- 四月
清兵自云从岛入皮岛，副总兵白登庸先逃，提督陈洪范西走。戊寅皮岛陷，孔有德陆攻；耿仲明、尚可喜水攻。副总兵金日观死之，沈世魁即焚仓，走石城岛，陈洪范亦自广鹿岛至。
- 1640年
崇祯十三年 崇德五年
三月
遣户部参政硕詹往朝鲜国安州，督催领运水师五千名，解米一万包。又命洪尼喀库礼三十人，与朝鲜水师将领，同舟引导而行旅顺口。
- 1643年
崇祯十六年 清崇德八年
八月
皇太极死，子福临嗣，是为清世祖，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
- 1644年
崇祯十七年 清顺治元年
3月19日
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死。
- 9月2日
清帝将迁都北京，命何洛会等统兵镇守盛京（沈阳）等处。海州、盖州各设满、汉章京各一员，率兵驻防。

12月5日	<p>10月19日帝至北京。</p> <p>故明石城岛（长海县石城乡）总兵马登洪以 谕招抚，上表投城。谕令所部听候安置。</p> <p>清初连年战争，人户逃亡，辽南地区州县俱废。</p>
1645年	<p>顺治二年</p>
4月7日	<p>以叶克书为盛总管。</p>
8月3日	<p>镇守雄耀（熊岳城）、凤凰城（凤城县）各城总管官统辖金、复州、庄河一带旗军。</p>
1653年	<p>顺治十年</p>
12月23日	<p>以辽东为辽阳府，领海城县，大连地区初隶海城县。是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奖励条例》，大连地区多由山东登、莱西府移民于此。</p> <p>大连地区多由山东登、莱西府移民于此。</p>
1654年	<p>顺治十一年</p>
5月19日	<p>建辽阳府儒学。</p> <p>始建辽阳府知府，张尚贤主任。</p>
1655年	<p>顺治十二年</p>
10月5日	<p>张尚贤招辽东旧民寄居登州者甚众。广鹿、长山等岛民七百余回金州原籍。尚贤奏请于金州立县治。</p>

- | | |
|-------------------------|---|
| 1657年
6月7日 | 顺治十四年
罢辽阳府，改置奉天府于盛京、
设府尹（正三品）、大连地区
隶奉天府。 |
| 1660年
2月25日
3月27日 | 顺治十七年
盛京昂邦章京敦拜卒。
以吴库礼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 |
| 1661年
6月6日 | 顺治十八年
奉天府尹张尚贤疏奏盛京形势。
论及金、复、旅顺等地应加
强海防。 |
| 11月27日 | 始设田赋升科为金州、复州巡
检司，隶海城县。赵浚为金
州首任州巡检。 |
| 1662年 | 康熙元年
奉天昂邦章京，改镇守奉天等
处将军，改总管乌库理为将
军。 |
| 1663年
2月20日 | 康熙二年
盖州、熊岳地方安插新民，并
令海城县督勤垦之。 |
| 1664年
2月13日
7月 | 康熙三年
升光禄寺卿佟宏器为奉天府尹。
置盖平县，辖金州、复州巡检。 |

1665 年 5 月	康熙四年 吴库礼卒，升辽东副都统达都为辽东将军。
1680 年 8 月 11 日	康熙十九年 奉天将军安株护疏言：招来居住金州百姓 576 丁，内编五十副甲，令五丁帮一甲，各设马一匹给与弓箭。再编五十副甲，令四丁帮一甲，设立标枪、鸟枪、不给月粮，但免其输纳钱粮。其金州巡检，应行裁去，改为金州营，设立守备、千总等官，从之。
1681 年 3 月 29	康熙二十年 许盛京地方汉人煎盐。是年，金州编民人入旗（汉三旗）。置金州城守章京。
1684 年 6 月	康熙二十三年 诏修《盛京通志》
1687 年	康熙二十六年 复州、金州始设城守尉。奇臣任金州城守尉。
1689 年	康熙二十八年 辽东地震波及大连地区。
1692 年	康熙三十一年 金州满八旗外复设蒙古巴尔薪一旗，设佐领一员领之。

- 1693年
2月16日
康熙三十二年
盛京地方歉收，奉旨运山东米以济军民。由金州海岸经过，请将所运粮米酌量裁留，减价发卖。
- 1696年
9月
康熙三十五年
复州城守尉舒述升宁古塔副都统。
- 1711年
4月6日
康熙五十年
奉天将军嵩祝疏言：奉天所属金州铁山（旅顺），距山东隍城岛仅半日程，请令山东防海水师官兵巡哨兼及金州铁山，使海盗无所容身。
- 1713年
7月13日
康熙五十二年
兵部题，在盛京金州旅顺地方设立水师营。山东水师总兵李雄奏请裁标下水师营战船十只，分往金州看守地方，巡防海洋。
- 11月17日
遵旨议覆：盛京金州地方设立水师营。拨兵五百名，设协领一员，佐领一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均属奉

1714 年 12 月 10 日	天将军统辖。 康熙五十三年 定盛京、山东海洋巡查界限。 兵部议覆：自旅顺铁山起至 隍城岛九十里之内由盛京官 兵巡哨。
1715 年	康熙五十四年 旅顺水师营建成，初驻旅顺 北城，（几年后移于水师营 镇），有官兵五百人，置协 领。
1726 年 9 月 18 日	雍正四年 奉天将军噶尔弼疏言，旅顺 口至凤凰城，水程几及千 里，只有旅顺水师一营，请 添设水师营三处，每营兵丁 三百名，各设佐领一员，防 御二员，以固海疆，从之。
1727 年 5 月 1 日	雍正五年 停止盛京添设水师营，以旅 顺口、天津俱有水师营，尽 可轮班巡察故也。
8 月 2 日	增设熊岳城副都统，统领复 州、金州、凤凰城城守尉和 熊岳、旅顺协领，以及盖 州、岫岩防守尉所辖旗兵。 是年分盖平地置复州通判，

- 1728年
5月5日
- 12月
- 1729年
10月4日
- 1731年
8月24日
- 下辖金州巡检。白琮首任复州理民粮捕海防通判。
- 雍正六年
- 奉天将军伊礼布奏：奉天所属十四城，旧设城守尉十员、协领二员，防御二员，请照在京八旗正副参领、佐领之例，增设副城守尉，副协领，令共同办理。从之。
- 奉天府尹王朝恩疏报，复州，长宁等三州县开垦，去年分田地九十六顷。
- 雍正七年
- 著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于千总内拣选数员，于兵丁内拣选数名，令赴盛京交与该将军，令其教习旅顺水师官兵。
- 雍正九年
- 吏部议覆：裁复州通判缺，改设复州知州一员，学正一员，吏目一员。金州改为县，裁原设巡检缺，添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

1734年
是年

雍正十二年

金州巡检升宁海县，蔡昌炽为首任知县。复州通判升复州，白琮为首任知州。刘钺为宁海县训导。

6月29日

礼总议覆：复州设学正一员，业经准行。今请照直隶省小学之例，复州文武童生各取进八名，设立禀生、增各五名，三年出贡一次。金州新设之宁海县，准予添设教谕一员，取进文武童生各四名，设立禀、增各二名，五年出贡一次。

7月28日

吏部议覆：奉天地方旗民杂处，人命案件州县俱会同旗员办理，旗员自城守尉而下，土著者多，州县号令常不遵奉。请添设理事通判一员，驻盖平县，分管海城、盖平、复州、宁海四州县。从之。

1735年
1月2日

雍正十三年

移奉天府驻盖平县之理事通判驻熊岳。时金州实有人口一千三百零二人。仍属地荒人稀地区。

- 1736年
1月26日
乾隆元年
户部议准奉天府府尹宋筠疏称，复州属复盛、复宁、复古等三社并宁海县之积金一社，附别社，完粮地亩，均请照银地额数，改征银两。从之。
- 8月18日
奉天府属复州、宁海县建文庙。
- 1737年
9月11日
乾隆二年
奉天将军博第奏称，天津商船前往奉天贩运米谷令其呈报到县，将前往人数及到锦州、复州等处填注照票，登记出海日期，对票查明。
- 1738年
12月15日
乾隆三年
复州、宁海等州县虫伤田稼，本年应征钱粮，分别减免。贫民赏给口粮。
- 12月23日
奉天州县现存米数缺额二十三万三千五百六十余石，宜捐收足额，义州、宁海等州县各捐收米一万石。
金州城守尉浙库。

1739 年 5 月 13 日	乾隆四年 承德、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宁海、开原、铁岭八州县去年开垦荒地共八千四百五十九亩。
1740 年	乾隆五年 金州城守尉何达色在任。
1741 年 2 月 6 日	乾隆六年 从户部议派盛亦五部司员于复州、宁海、凤凰城、岫岩四处，共派四员，会同城守尉等征收一年，著作定额。
3 月 25 日	复州等十一州县，乾隆四年开垦旱地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九亩。
1742 年 7 月 15 日	乾隆七年 宁海、盖平等六州县，去年开垦荒地五千一百零七亩。
是年	复州知胡振伟。宁海县知县黄永耀、崇伦永。
1743 年 3 月 7 日	乾隆八年 增设奉天属辽阳、复州、宁海等一府十三州县佐杂等官。
11 月 16 日	复州、金州等十五处旗地应纳本年豆米、草束免征一半。

1744 年
4 月 10 日

乾隆九年

奉天将军达勒当阿奏：去年五、六月间，冒出朝鲜采猎，令金州水师各官，加紧巡防，凡登莱进口船只，取检船票，遇违例人员，即拿解盛京刑部。

1745 年
7 月 22 日

乾隆十年

工部议覆，熊岳副都统所属旅顺海口，设水师营官兵，为奉天南面保障，日久废弛，并不勤加操练，军装器材，半皆朽坏，应行稽查。从之。

12 月 15 日

兵部议：南金州陆路汉军披甲三百名，雍正十二年定，每年令该佐领轮流率往旅顺水师营操演。查南金州距旅顺往返二百四十里，兵至旅顺并无住处，且水师营操演俱驾三板船，在海内演放枪炮，若不随船出洋巡哨，水师阵势仍未熟悉。令各派十名随同出洋巡哨操演。从

- 12月27日 之。
兵部议覆，奉天将军达勒当阿奏称，令熊岳副都统每年二月初旬，往旅顺操演水师官兵一次。令奉天将军三年考察一次。
- 1746年 乾隆十一年
2月11日 奉天府尹苏昌奏：辽阳、复州、宁海等六州县报称，六月间阴雨连绵，河水涨发，田禾被淹。请先给一月口粮。
- 11月26日 奉属海疆岛屿最易藏奸，请于每年五、六月内，派旅顺水师营官兵乘风浪平顺时，西至天桥厂巡查其船到日期，令金州海口守汛放卡各官详报。
- 1747年 乾隆十二年
复州知州马翼在任。
- 1753年 乾隆，十八年
赖光表任宁海县知县兼重修孔庙监修官，贾见龙任教谕。
- 8月 金州文庙（孔庙）于城东南隅建成，占地约十五亩。
- 1755年 乾隆二十年

- 1756年
1月31日
永亮任宁海县知县。
乾隆二十一年
萨哈任金州城守尉。孟罗查任旅顺水师营协领，周期佐任金州汉军佐邻。
- 1762年
乾隆二十七年
常贵任宁海县知县（蒙古正白旗人，乾隆甲戌进士）。
- 1763年
是年
乾隆二十八年
满州镶黄旗人噶尔弼善任复州知州。
王文中任金州城守尉。
- 8月29日
盛京将军舍图肯奏：盛京兵共收一万七千九百余名。每年春、秋季操演各两月。
- 1764年
11月8日
乾隆二十九年
熊岳通判分管界址以凤凰城、岫岩适中之哨子河为界。熊岳城界于盖平、复州之间，岫岩城亦与盖平、复州、宁海等州县连界，定通判审讯。从之。
- 1765年
8月19日
乾隆三十年
添建熊岳、金州、凤凰城、

	开原、牛庄五处仓库（粮仓）。
	满州镶红旗人奇山任宁海县知县。
1767年	乾隆三十二年
3月28日	奉天府尹雅德条奏賑恤事宜： 复州一处歉收，其丁银应予一体缓征。从之。 满州镶红旗人图尔炳阿任宁海县知县。
1768年	乾隆三十三年
	满州正蓝旗人岱起任复州知州。
1770年	乾隆三十五年
	满州镶红旗人那行任复州知州。
1771年	乾隆三十六年
11月4日	礼部议：准奉天府丞吴绶诏奏称，复州学额八名，额多人少，请将复州定为五名。从之。
1772年	乾隆三十七年
4月18日	设岫岩通判兼凤凰城。岫岩通判辖庄河。
7月17日	蒙古镶黄旗人雅尔善任宁海县知县。 六十任金州城守尉。

- 1774年
4月14日
1776年
11月22日
是年
1777年
9月26日
是年
1778年
- 乾隆三十九年
满州正黄旗人觉罗鄂山任复州知州。
复州等城距窑数百里，运输艰难，查复州属五虎嘴，均属产煤地方，应招募旗人，自行出资开采，报地方官，照例征税。
乾隆四十一年
满州正蓝旗人瑞林任宁海县知县。
添设盖州、复州二处粮仓。
满州正黄旗人额尔登布任复州知州。
追封黄龙，谥忠烈，在旅顺建“显忠祠”，殉难诸将俱供奉祭祀。
乾隆四十二年
封闭复州五虎嘴、元台子（今新金元台镇）等处煤窑。
觉罗镶蓝旗人恒令任宁海县知县。
乾隆四十三年

	顺天府大兴人陈铨任复州知州。
	金州城守尉巴彦泰兼营重修金州城承修宫。
1779 年	乾隆四十四年
2 月 7 日	遵旨议定重修复州、宁海县城。
12 月	复州城守尉文庆被革职。
1780 年	乾隆四十五年
5 月 27 日	许复州、金州山蚕税仍试收二年，再为定额。
	舒元丰任宁海县知县。
9 月	修复州城工竣。
1783 年	乾隆四十八年
10 月	复州、金州等处旗地（指满族人）本年应纳米豆、草束亦著免征一年。
1786 年	乾隆五十一年
	锡尔塔任复州知州。
1791 年	乾隆五十六年
4 月 3 日	以水灾，减免熊岳、金州等旗民租旗。
7 月	金州等海口流寓闽人，除愿领票回籍外，尚有千四百余口，虽编入甲社，仍应于闽人中添派保长。
1792 年	乾隆五十七年

- 8月 蒙古镶黄旗人温都逊任复州知州。建修先农坛及节孝祠。
- 1793年 金州城守尉惠宁。
7月 乾隆五十八年 满州镶白旗人伊诚任宁海县知县。
- 1795年 乾隆六十年
11月2日 上谕：金州、熊岳、锦州等三城界内四百余屯亩，因旱欠收旗民等生计拮据，盛京将军琳宁先行动支仓米借给一月口粮，未足资济。琳宁奏闻，妥协办理，毋致一夫失所，以副朕轸恤旗民之意。
- 12月23日 赈奉天金州、熊岳、锦州三城，宁海等县旱灾旗民，缓征租银。
- 1800年 嘉庆五年
7月 耀昌任复州知州，
1801年 嘉庆六年
10月4日 《复县志略》云：知州耀昌建金星楼碑，城守尉弘康首捐

<p>1803 年 10 月 17 日</p>	<p>施，九日十五日竣工。 嘉庆八年 旅顺水师营防御骁骑校蒋世魁，奉文到獐子岛缉拿“贼匪”刘青山，被捕。 调拨旅顺水师及岫岩县兵役掩捕高丽沟、獐子岛等地聚“贼匪”（实为渔民反抗官民），拿其首领四名，唯刘文喜、顾学产二人未捉到。</p>
<p>1805 年 9 月 10 月 18 日</p>	<p>嘉庆十年 定奉天属辽阳、宁远、复州、海城、盖平、宁海六州县专用汉员（前用满人）。 免复州、金州等十五处旗地应纳本年米豆、草束十分之五。</p>
<p>1806 年 7 月 12 月</p>	<p>嘉庆十一年 湖南安乡人张国泰任宁海县知县。 金州城守尉惠宁，以年老开缺，留京。</p>
<p>1807 年 9 月</p>	<p>嘉庆十二年 以獐子岛（长海县）朝鲜潜商事移比北京礼部。</p>
<p>1808 年 1 月 4 日</p>	<p>嘉庆十三年 工部议覆，富俊奏请造送水师</p>

- 1809年
12月
战船十只，来年迅速解送金州水师营应用。
嘉庆十四年
四川荣昌人拨贡敖时忭任复州知州。十六年十二月，以秋禾被灾，不准乡约呈诉，革职拿问。
- 1810年
12月
嘉庆十五年
派侍郎崇祿巡查旅顺等处与山东登莱海口偷运人参，分派协领于海口巡查。
- 1811年
12月
嘉庆十六年
直隶清苑人胡绍祖署宁海县知县，因秋禾突被风灾，未据实具报，府尹查办。
- 6月11日
贷金州、复州各城兵丁旗仓米。
复州等处歉收，见逃荒民人。
- 1812年
7月
嘉庆十七年
许作屏任宁海县知县。
- 12月
浙江山阴人何钟任复州知州
- 1813年
嘉庆十八年
窦心传任宁海县知县，东明任金州城守尉兼孔庙监修

	官。
1818 年	嘉庆二十三年
10 月	金州城守尉东明升锦州副都统。
	盛京副都统和福，降金州城守尉。
是年	头侍卫国祥升金州城守尉（道光四年署正蓝旗蒙古副都统）。
10 月 5 日	免奉天属复州、金州、岫岩（辖今庄河）等十五处旗地，本年应纳米豆，草束十分之五，并免二十二年以前积欠。
1821 年	道光元年
7 月 5 日	谕奉天省旗民事件仍归复州、宁海等州县审理。城守尉不得干预。
1822 年	道光二年
8 月 24 日	盛京将军晋昌奏报，砍运黄松树事宜。明岁春融，上紧运至岫岩大孤山（今庄河县）海口，请照例仍由直隶拨般载运。
1823 年	道光三年
5 月 24 日	拨复州、宁海县仓谷一万五千石，解赶承德府以济民

9月3日

食。

谕内阁：金州旅顺海口从前设立水师，兵丁舵工水手六百名，每名给予官房二间共一千二百间，遇有坍塌渗漏，均系该兵等捐饷修补，现携眷居住之兵，仅有一百八名，余皆只身合伙居住，只占用官房三百八十间。官兵办事公用二十间。此外八百俱属损坏，闲无用，拆毁估价变卖，银两解交盛京户部银重查收存贮。

1826年

道光六年

7月11日

盛京将军晋昌奏请，请奉天属岫岩理事通判改为海防同知。部议请定为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从之。

1827年

道光七年

9月8日

金州、盖平等处拿获言语不通之远人解刑部审办。

1828年

道光八年

1月14日

以回疆凯撤官兵过境，免盖平、宁海县等七州县地丁银

- 十分之四。是年，常喜任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辖庄河县。
- 6 月 李武增任复州知州。
- 7 月 谕盛京将军派员履勘复州、金州等处蚕厂。商人应纳之税责之蚕户，而每年仍以商税完全具报，蚕树应补植者，令其补植，田亩应升科者，查报升科。
- 7 月 25 日 复州民人许润堂等呈控知州加增荷派等情。复州知州李武曾征收地丁银听民以钱交纳，官为采买，但究有不合，错谬之处，实无可辞。李武曾交部议处。
- 10 月 直隶清苑人胡绍祖补复州知州。
- 1829 年 道光九年
- 5 月 17 日 拨复州仓米七千石移贮新民厅。
- 9 月 16 日 上奉皇太后后銮，东巡盛京，茶谒祖陵、免复州、宁海等九厅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五。
- 10 月 15 日 帝谒福、昭二陵至盛京、复州、金州等十五处旗地应纳

- 11月4日 本年米豆、草束十分之五，并道光八年以前积欠及各壮丁应完本年丁米。
金州城守尉福敬升阿勤楚喀副都统。
- 1830年 道光十年
8月 复州、金州蚕厂间有开垦瘠薄，不堪升科者，请著定蚕税章程。蚕千个输制钱五十文，如有伐桑为薪者必究。
- 12月5日 贷宁海等县被灾旗民一月口粮，缓征欠收民地额赋。
- 1832年 道光十二年
5月 山西太谷人温维祺任宁海县知县。
- 1833年 道光十三年
江苏溧阳人进士强上林任复州知州。
-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2月 江西新建人军功曹坚任复州知州。
- 1835年 道光十五年
3月 山东沂水人进士袁振瀛任宁海县知县。

- 12月6日 金州水师营战船遭风击碎并沉军失械，从盛京将军奕经请。
- 1836年 道光十六年
- 1月10日 金州等处旗丁前赴黑龙江双城堡耕作章程颁布。
- 6月 金州城守尉成凯升镶蓝旗蒙古副都统。
- 12月 湖北麻城人鲍颢堂任复州知州。
- 1838年 道光十八年
- 6月2日 谕盛京将军晓谕居民禁吸鸦片。吸食鸦片烟者，限一年内各断绝烟瘾，如一年后仍吸食，是即不法之乱民，俱罪以死论。
- 11月 复州城守尉耆瑞，尝头等待卫。
- 1839年 道光十九年
- 1月1日 谕军机大臣：前因琦善奏，闽广洋船因天津查拿鸦片严禁，不能卸货，已有一百二十三只，虑其前赴奉天另谋销售。咨明该将军一体访捕。金州之皮子窝、和尚岛（今大连湾）、岫岩之大孤山（今庄河）等处海口，为

9 月 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之所，明易货物，暗销烟土。倘敢意存讳饰，朕唯该将军等是问。

1840 年 湖南宁乡人，进士成章瓚任宁海县知县
道光二十年
大连地区设“旗衙门”（专管满人）与“民衙门（专管民人）。同设一地，各管其民。
盛京将军下辖熊岳副都统（二十三年改金州副都统）。熊岳副都统领复州城守尉、金州城守尉、岫岩城守尉专管本地旗人。盛京五部侍郎下辖奉天府。复州、宁海县（二十三年升金州厅）隶奉天府府尹，专管本地民人（除满族以外）。

6 月 28 日 鸦片战争爆发。

说 明

一、本年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一八四〇年。编写时力求纵不断线，

横不漏事。通过浏览本表，略知大连历史概况。

二、大事依年代顺序排列，但有的大事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有助于看清史事的脉络线索。

三、由于阴阳历差而产生的年份出入问题，明代以前以封建纪年为主。清代以后以公元纪年为主，月份一律改用阳历。

四、古地名酌注今地。

本表挂一漏十，错漏在所难免，恳请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本文作者系沙河口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